



YAN HUANG CHUN QIU

# 炎黄春秋

1993/5 (总第14期)



## 是否宣传雷锋 曾有一场争议



### 蒋介石高参“通共”纪实

### 一本英雄书 一场生死劫

### 我参与“丁陈反党集团”案处理始末

### 中缅军队联合攻打金三角

### 叶利钦、海部、贝克……

### 和香格里拉的公关小姐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镔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 洪 炉  
副总编辑: 刘家驹 社卫东  
总经理: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码: 100802  
封面设计: 李科平 刘少波

· 专稿 ·  
毛泽东与科学规划 / 于光远 ..... 2

· 春秋笔 ·

我参与“丁、陈反党集团”案  
处理始末

/ 李之珪 ..... 10

中国海军  
泣血远东

/ 周宏冰 ..... 18



· 英杰谱 ·

世界屋脊上有一群军人

/ 窦孝鹏 ..... 32

蒋介石高参“通共”纪实

/ 毕永畅 ..... 43

报界宗师张季鸾 / 高向明 ..... 68

· 殒星篇 ·

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  
——巴玉藻

/ 王忠瑜 王钟灵 ..... 87

侯宝林的  
最后一幕

/ 郑晋 王恂 ..... 94



· 时代风 ·

京城大学生打工潮

/刘一达..... 82

叶利钦、海部、贝克...和  
香格里拉的公关小姐

/东平..... 52

李政道名述

(书法)/张瑞龄..... 77

· 轶闻录 ·

是否宣传雷锋曾有  
一场争议

/舒云..... 4

中缅军队  
联合攻打  
金三角

/万元 万红艳... 56



· 神州光 ·

当代武松何广位

/徐凤桐..... 25

蓝天上的一家人

/宿聚生..... 78

分界截肢与不截肢的

报告/王浩然..... 59

· 人海浪 ·

“小家族”冤案 20 年

/杜高..... 62

共患难的二 YU 夫妇

/罗网..... 92

一本英雄书

一场生死劫

/许国荣..... 73

· 九州景 ·

三峡绝景

备忘录

/闻宇..... 48

抢救秦文的  
人们

武勤英..... 24



· 古今谈 ·

鸳鸯蝴蝶派的江南三作家

/俞小红..... 80

· 访谈记 ·

当代女高僧——隆莲

/赵世富..... 70

· 赤子心 ·

骆明先生的战略眼光

/黄浪华..... 90

我同毛泽东建国前在延安、建国后在北京有过几次接触，但每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都有值得回忆写下来告诉读者的东西。

1956年1月，是我国科学界“大喜”的日子，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要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当代科学进军”。这个会议是在毛泽东的指示和关怀下召开的。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北京市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的大会，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接受喜报时，让一千多位知识分子会议的参加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由于这个会议着眼于解决知识分子的许多具体问题，强调要“抓紧时间”，“一年的时间是很容易在空谈和拖延不决中间浪费了”，并要求在1956年4月确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会后不久，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水平。”在那一个时期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确是欢欣鼓舞，积极投入到发展我国的科学工作的事业中去。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前，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指示有关部门进行科学研究计划的讨论，我是作为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出席过这样的会议的。

最高国务会议之后，李富春向各部门负责人和参加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一千多人做了制定科学技术的远景规划的动员报告。在报告中提到，国务院成立一个10人小组主持这项工作（我是10人中的一个），规划工作就按照周总理的要求积极进行。

3月，国务院成立了以陈毅为

# 毛泽东与科学规划

●于光远

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和季四光为副主任，张劲夫为秘书长的18人组成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范长江等12人是不在委员名单中的副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之一）。

规划已有初步结果，这时陈毅主任召开了这个委员会的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落实规划实施的方针办法。

接着，毛泽东在中南海一个会议室里听取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汇报。他对规划工作很满意。在那天会上，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他也是委员会的成员），向毛泽东呼吁纠正“重理轻文”的倾

向。毛答复说，理还是要重，但不应轻文，应该重理又重文。还有一件事是，在这个会议上对我国科学体制中国科学院和高等学校的地位如何，当时，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杨主张，我国应该仿效英美，把科学工作主要放在高等学校中去，郭则主张采取苏联（它是向法国学习来的）的做法，在科学院内集中很大的力量，以便使科学院成为推动我国科学前进的火车头，迅速提高我国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科学家中间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郭、杨两人各不相让，语言很尖锐。他们正好坐在一张长条会议桌的对面（毛泽东坐在这张桌子的一头），两个人耳朵都聋，生怕自己讲的话对方听不清楚，因此声音很大。争论得很激动的时候，两个人都站了起来，面对面地大声说话。毛泽东一直在一边微笑，在他们两人争论的一个间隙，他才请两人息争，说“就在这里划个三八线吧”。他要求与会者发表意见。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我国要在一些尖端科学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是要在人力和物力上特别加强科学院的力量，同时高等学校也要抓紧科学研究，特别要注重发展基础学科，毛泽东同意这种意见。以后几十年中，我国的科学工作体制就是按照这样的思想形成和一直保持了下来。

8月底，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同后来我出席或者列席的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不一样，全体大会举行的次数比较多，开得也比较长。代表们除了在分组会上能够不受时间限制地发言外，还有一些代表有准备地在全体大会上发言。在这次大会旁听的人中还有世界各国兄弟党的领导人。大会发言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我在发言时，讲台上的显示器就发出“你的发言时间使用完了”的信号）。而且所有发言在第二天《人民日报》

上全文发表。在这个会上，刘少奇作报告，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要讲给党内同志听的话，是在大会正式开始前举行的一个没有外国人和党外人士参加的、八大全体代表参加的“预备会”上讲的。后来收入《毛选》五卷上的那篇《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就是这次讲话的摘要。全文要长些，还讲了些不准备公开发表的话。我对那次讲话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我记得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把八大报告同七大他自己做的报告相比，对八大报告作了肯定的、比较高的评价。还有一个内容，那就是他强调经济建设任务，指出要建设就要靠科学，因此全党要特别重视科学。他甚至把科学的重要性提高到这样一个程度，讲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工作的重点是抓政治，因此是一个抓政治的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中央委员会工作的重点是抓科学，因此是一个抓科学的中央委员会。当时我对他的这种表述发生很大的兴趣。我的理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后，全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抓科学，把建设搞上去。这是我听到的把科学的地位提得如此高度的一次言论。不过以后我没有再听到他发挥这个思想。

1958年夏天，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聂荣臻带了张劲夫和我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的卧室接见了我们。一见面毛就说：“现在钢指标上得这么高，我怎么压也压不下来。”显得有些发愁的样子。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他不认为指标越高越好，而是发愁提得太高。引起我注意的是，这间卧室的墙上张贴了好几张关于水压机增长计划的示意图。聂抓紧时间向他作汇报，既讲科学研究机关中的工作，也讲群众性的科学试验活动。聂讲完，张劲夫补充中科院的情况，我补充群众中的科学实验的情况。在我的补充中，讲了山东省委给

中央写的一个报告：某个村的农民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把正在成长的苹果连枝从树上摘下来，插在正在生长的南瓜里，随着南瓜的长大，苹果也长得比普通的苹果大。那次我竟把浮夸到可笑地步的事当作真实情况向毛汇报。我是个学自然科学出身的人，而且是在党的科学工作中负有很高责任的人，做这样的事情，后来想起来，觉得自己不但失职，而且实在丢脸。当时我头脑中“相信党、相信群众”的观念太强了，竟然忘记了维护科学。根据阳光辐射的数量计算得到的粮食可以大大增长的那篇《人民日报》的文章，就是在那天汇报时毛对我们说起的。我在毛处汇报中失职这件事从来没有人提起，也不会有人记得，但是我多次反省。这些年我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就是为了维护科学性而必须坚持的严肃态度。

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前五年，到1962年基本完成。在聂总提出制定1963年到1967年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1962年在广州举行规划会议，这就是有名的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都聚集在广州。会后又进行了一个时期工作之后，在1963年11月16日，聂荣臻同志带领一些人到中南海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那一天，罗荣桓去世，我们去中南海的时间是晚上。毛泽东一到会场，就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并讲了一篇以罗荣桓为榜样，注意维护党内团结的话，接着讲工业部门要学解放军，各省、各军区应该很好地协作互助。讲完，聂总才开始汇报。在聂总汇报到苏联撤退专家之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反而更快时，毛泽东讲，这等于何应钦当时不给我们八路军发饷，各根据地生产出来的比何发给我们的要多得多。这时毛主席想起了社会科学，

说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我们也要投一点资。在听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在科学规划目标的问题上，要有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在聂总讲科学家的稿费低时，毛泽东讲：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些。在听完聂总汇报后毛泽东讲：“我们要打好科学这一仗。过去我们打的仗，是为了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建立上层建筑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就要搞科学技术，否则无从提高。科学技术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一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他又谈到军事技术，讲要有小批人吃了饭不作别的事，专搞尖端科学，一时没有成绩不要紧。他还讲，在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还要注意加强防御问题的研究。以后在作战中我们主要是防。比原子弹我们比不赢人家。要有攻有守——要筑城搞工事。

这次汇报的时间不短。毛泽东在听汇报的插话中还讲了一些别的事。比如他讲，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英国人研究出一种感冒药，并且讲他自己一年总要感冒几次，这种药要研究一下。又比如他关心《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个刊物。他知道这个刊物在反右后停了几年，在1963年才复刊，并且知道已经出了第二期。他说，这个刊物复刊了就好。他还问这个刊物是什么单位出的（我告诉他，是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出的）。他还讲了铁道兵的重要性，讲到地下工厂、地下铁道等等。这是我直接听到毛泽东对科学工作讲的话最多的一次。

（责任编辑：方实）

（摘自即将出版的《在毛泽东身边》一书）



## 是否宣传雷锋 曾有一场争议

● 舒 云

1962年9月,《人民日报》的军事记者连云山来到抚顺,住进市委招待所。

市委秘书长来看他,俩人聊了起来。

连云山问抚顺有些什么新鲜事。

市委秘书长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儿出了个人物。”他把刚刚去世才一个月的雷锋作了简单介绍。说这位战士做了很多好事,在抚顺市共青团和少先队做过报告,反映很好。

那时候,凡是部队或地方的先进代表会议连云山都要去参加,接触很多。因此,连云山对这位名叫雷锋的战士并没有过多的注意。

第二天,抚顺市委书记沈越来看连云山,一进门也说起雷锋,这位老农民般的市委书记慢声慢气地说着说着,忽然说:“礼堂正在做报告呢,咱们去听听?”

“行!”连云山点点头。

俩人进到礼堂在后排找了个座位,会场上静悄悄的,报告人和自发

前来的听众全都声泪俱下。

连云山听后,开始觉得这名战士很了不起。和平时期的英雄无非是救人救火,这种好人好事,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产生,而雷锋与成千上万的英雄不一样,他不是靠壮



烈的死来无愧于英雄称号,而是靠短暂一生的每一分一秒的闪光来使他的名字光彩夺目的。好人呵,难怪抚顺的人民从书记到一般百姓全都发自肺腑地尊敬雷锋。这是人民中间的自发的热爱,这是和平时期真正的英雄形象。

连云山与报告人聊了聊。

报告人是名中尉,叫陈广生,任沈阳军区军人俱乐部主任。他从雷锋1960年入伍起就开始注意了他,写过他一些小稿。恰好雷锋当校外辅导员的那个班的班主任是陈广生的恋爱对象,她为陈广生提供了很多生动材料。后来解放军文艺社出版的《雷锋的故事》就是陈广生和别人合作写出来的。那时他正在修改两三万字的关于雷锋的长篇报告文学,还没有修改出来雷锋就去世了。陈广生十分悲痛,他拿着他的笔记本,到处宣讲雷锋,一个月作了42场报告。

这时虽然距雷锋去世才一个月,但雷锋事迹已经在抚顺的家家户户传开了。连云山觉得应该在更

大的范围宣传雷锋。他到雷锋生前的运输连去了一趟，看了雷锋的遗物和厚厚十几本日记，并且找汽车班在家的人座谈。班里每一个人都非常敬重佩服雷锋，谈了不少，只有那位肇事的司机低着头，始终不说一句话，很沉痛。

连云山问连队领导同意不同意对雷锋做好事的思想事迹做宣传？

连队干部说：“出了恶性事故。检查还检查不过来呢，还宣传什么。”

后来的报道说雷锋因公殉职，实际上那是一场恶性事故。雷锋作为班长指挥倒车，雨后路滑，卡车猛然撞倒一根两米五左右的杆子底部，这根平时看起来砸不死人的杆子力量一下子大起来，正好砸在雷锋头部，鲜血顿时湿透了他的军帽。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充满偶然的意外，不能怪那个司机，也不能怪连队。但是，这毕竟是严重忽视安全的恶性事故，沈阳军区工程兵领导机关作了个通报。连队正沉浸在不光彩的气氛当中。

连云山问连队干部：“报告去听了没有？”

连队干部摇摇头，他们对雷锋的先进事迹远不如陈广生了解得多。只有一位排长稍微详细地对连云山讲了雷锋是抚顺市人大代表，忆苦思甜时做了不少场报告，也讲了雷锋做的一些好事。

连云山一层一层地感应下来，更加坚定了雷锋思想和事迹必须宣传的想法。

这时，北京打电话叫连云山赶快回去。临走，他对驻沈阳军区的军事记者佟希文交待了这个宣传设想。佟希文说他们也有打算，但工程兵军务部门不同意，认为，把人大代表砸死了，宣传恶性事故吗？

连云山说：“事故始终是事故，雷锋已经付出了生命代价，不能把一切推给死者。”

连云山叫佟希文不要管其它，

再去细细采访一下，把稿子尽快发出来。连云山说：“我们宣传的东西是雷锋的思想和事迹，不是事故，这个宣传与事故毫无关系。”

雷锋事迹早在沈阳军区《前进报》上发过一些。1960年冬季，《前进报》社从一篇来稿中发现了雷锋这个典型。11月24日，佟希文和李健羽采写关于的雷锋通讯《党的好后备生》送到沈阳军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杜平中将那里审阅，杜平决定将此文印发部队，并将标题改为《毛

主席的好战士》。工程兵授予雷锋模范共青团员的称号，工程兵政治部派人跟随雷锋，拍摄雷锋学习生活的大量照片。这对以后全国范围内宣传雷锋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拍摄数量之多，保存资料之全，是人民解放军的模范人物所仅见的。1962年2月，雷锋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会，他的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佟希文和李健羽在雷锋入伍刚刚10个月时就采访过他，李健羽在1961

誰願當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就應該向雷鋒同志的品德和  
風格學習。

孫小平

审阅，同时作了口头汇报。张潮认为很好，他答应拿出两个版来宣传。副总编辑李庄也顺利通过了。

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放开了版面，同时在一版二版和五版编发了有关雷锋的文章和雷锋日记摘抄。一版头条是“辽宁广大青年热烈学习雷锋事迹受到深刻教育”，大标题为“像雷锋那样忠于革命事业”，并加了编者按，提到辽宁省从去年10月下旬开始，广泛开展了雷锋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第二版刊登了雷锋生前事迹的通讯。第五版刊载了雷锋日记摘抄和雷锋的几张照片。通讯还加了连云港山撰写的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伟大的普通

年5月再次去抚顺采写了《好战士雷锋和红领巾》。一系列的跟踪报道使他们对雷锋很熟悉，因为有些基础，稿子写得很快，佟希文执笔，雷润明补充，甄为民最后定稿。

这篇全面报道雷锋的通讯因为北京催得急，佟希文他们在一面定稿一面用电话传到《人民日报》，最后一段文字由北京方面记录完后，已是1963年春节前夕了。

这时，《辽宁日报》发表了署名霍庆双和波阳的长篇写雷锋的通讯和雷锋日记摘抄。

1963年1月7日，国防部批复了沈阳军区工程兵授予运输连四班“雷锋班”称号的决定。

1963年1月18日，沈阳军区党委做出了关于开展学习雷锋运动的决定。

但是，这些活动还局限在小范围内，就是国防部命名“雷锋班”的决定也只是刊登在196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的二版上，1200多字，并不引人注目。就是说，这时候雷锋还不是全国轰动的人物，他只是红在东北三省。

已经回到北京的连云港山在接到沈阳佟希文的通讯稿后，迅速编完发排，送管版面的总编室主任张潮

向雷鋒同志學習  
憎愛分明的階級  
立場  
言行一致的革命  
精神  
公而忘私的共產  
主義風格  
奮不顧身的無產  
階級鬥爭  
周恩來





△1963年8月1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观看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演出的《雷锋》后接见演员

一兵》,并配有总参谋长罗瑞卿为“雷锋班”命名大会的题词:“雷锋同志永垂不朽”。

两个半版的位置全部慷慨地给于一名普通士兵,长期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沙英讲:“以这么多版面,以这种配套方法宣传一个典型人物,这在《人民日报》尚属首次。”

连云山在处理雷锋的稿件时没有上报总政。总政宣传部某副部长问连云山:“这个报道是你抓的?”

“是我抓的。”

“你看了?”

“我看了。”

“你同意?”

“我同意。”

“你把过程谈谈。”

连云山把过程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你这报道是错的!”

“为什么?”连云山不能接受。

“雷锋的死和黄继光的死能比吗?董存瑞和黄继光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也不过2000字的通讯,

现在这个被砸死的战士,是个忽视安全的恶性事故,你拿出两个半版来宣传,如果再发生战争,再出现董存瑞、黄继光这样的事,你拿出8个版宣传吗?宣传这么个恶性事故,而且他的事迹竟超过董存瑞、黄继光了吗?你本来是把关的,不仅不把关,还支持,你这是失职行为!”这位总政宣传部某副部长说:“总政把《人民日报》军事宣传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怎么这样做法?”

连云山回答说:“董存瑞、黄继光的事迹发生在战争时期,现在全国没有战争,是和平时期,上哪儿去堵枪眼?上哪儿去举炸药包?我认为在和平时期,雷锋的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献身精神,爱护人民的精神,应该是现时期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的发扬,是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人物中间的一种。宣传他们不是错误,不是失职,你这批评我想不通。我没有做错。”

“你回去想想吧。想不通,你今后还这样子搞军事宣传吗?”

连云山不承认错误,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他说:“以后碰到这样的好人好事,我还要宣传,除非我不干这工作!”

按照惯例,凡社论和重大宣传,他都无例外送给有关单位审查。连云山当时认为,雷锋事迹的稿件特殊,一般单位审不了,因他们不了解或不甚了解情况,《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党的舆论阵地,它直接为中央政治局负责的,和总政不是隶属关系,社领导同意就行了。关键问题是《人民日报》拿出那么多版面宣传一名士兵,总政宣传部居然不知道。

后来,连云山听说要给他处分。总政跟《人民日报》商量,《人民日报》毫不考虑,“我们签了字,当然是我们的责任。”张潮平日不怎么说话,这次他的话很多,他对连云山说:“由我们承担责任,我签发的就是我的责任。”李庄也说:“你不要有顾虑,好好工作,一切由我们负责。”

没多久,总政小会议室召开了

一个首都各新闻单位参加的会议。连云山事先不知道内容，一听，原来是总政宣传部认为《人民日报》宣传雷锋有虚夸，总政宣传部某副部长专门派了调查组去雷锋家乡实地调查，以证明《人民日报》宣传内容有错误。他们取回七八条证据，说雷锋在流浪过程中很多事不真实，并附有证词。会上点名批评了《人民日报》和连云山对这个宣传不把关的错误，以致宣传了一个因车祸而死的战士。同时说明这个宣传没经总政审查，新闻单位要接受这个教训，不要发生连云山这样的错误。

连云山面对首都新闻单位的代表，说：“雷锋是流浪孤儿，雷锋日记我看了，雷锋事迹我也都问了，我认为没有一个地方虚夸，都是真实的。至于审查问题，我认为总政没法审，稿子编发后送报社领导，报社领导认可就行了。”

总政为这个小型会议还专门给每人印发一套文件，并向《人民日报》提出要调动连云山。张潮表示，是他签的字，你们没有权利给连云山处分。由于《人民日报》对连云山的坚决保护，撤职和处分没有实行。

连云山明白，这事没完，他把他的办公室抽屉都清理了，准备着。

当时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的郭楠柠得知连云山做得对而受到很大压力后，积极站在连云山一边。她与《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热情同仁们正在总编邢方群的率领下，开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编委扩大会议。他们都从《人民日报》和《辽宁日报》上看到了雷锋的事迹，不约而同地想到应在自己杂志上宣传宣传。这个会就是专门讨论如何宣传雷锋的。他们认为，雷锋是具有时代典型的典型，应该下大力宣传。但是，他们有好几点不利，几家报纸尤其是《人民日报》重点宣传过了，再加上《中国青年》是半月刊，赶不上报纸迅速。如果要后来居上，必须在深入和声势上下功夫，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热烈的七嘴八舌后，他们决定把1963年的第5期和第6期合刊为学雷锋专辑，份量重一些，然后呢？

请周恩来总理题词吧？

请毛主席题词吧？

请毛主席题词？

会场上一下子安静下来。

行吗？

有什么不行？试一试嘛。题了词专号就出奇制胜。

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的《中国青年》杂志，是毛泽东很偏爱的一本杂志，由它推出了一系列的青年样板，牺牲在朝鲜的罗盛教，鞍钢的孟崇伦，河北的邢燕子都是首先由《中国青年》推出来的。

更何况毛泽东曾为年轻的女英雄刘胡兰题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呢。毛泽东一向关心青年，对毛主席写封信！写封信！

散会，他们就连夜起草给毛泽东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现在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向雷锋学习的热潮，《中国青年》准备出学习雷锋专辑，向全国青年推荐这个典型，教育青年在社会主义时期更好地锻炼成长，恳请您老人家为雷锋题词。

然后，请字写得最好的人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在直行红格信笺上。信封上写中南海毛主席收。

说实话，这胆子够大了，一般谁敢？《人民日报》也不敢呵，办青年杂志的青年人胆子就是大。他们过去请过朱德、董必武题词，朱老和董老好请，周恩来更是有求必应。请主席题词可没有敢请，可如今，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让他们办了。

在请毛泽东题词的同时，《中国青年》还向周恩来请求题词，还请总参谋长罗瑞卿写文章，请谢觉哉写文章，还请郭沫若为雷锋写诗。

后来邢方群回忆说，性急的年轻人要催一催，拨通了毛泽东办公室的电话。

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接了这个电话。

林克是这样回忆的。1963年2月中旬，《中国青年》送来请毛主席题词的信。林克看完后觉得很重，应该给主席看。那天，值班警卫打电话告诉林克说毛主席醒了。林克急忙按照习惯，把挑选出来送毛主席批阅的文件送到菊香书屋，其中有《中国青年》这封信。

但是，当他们打电话询问时，毛泽东看了信，还没有表态呢。

没表态？那说明还没有拒绝，还有戏！

毛泽东在阅读《中国青年》的来信前，已经从《人民日报》上读到雷锋的事迹和日记摘抄。他在考虑。

当时，中央的七千人大会刚刚开过，大跃进之后紧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人，党群关系也拉开了距离。国际上呢？中苏论战正激烈，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这一事实使毛泽东一再思考中国的未来。1962年他有个谈话，说美国有个杜勒斯，他在临死前预言，看来要想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身上进行和平演变是不可能的了，今后要把和平演变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泽东要共青团加强对青年一代的培养教育。

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雷锋不是一个绝好的样板吗？毛泽东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他决定为雷锋题词了，题什么呢？毛泽东叫秘书林克拟几个句子让他参考。

林克根据雷锋事迹拟了十多条，每一条是学习雷锋的一个侧面。

这时，《中国青年》杂志又来电话催，一听毛主席答应题词，立即要求说：“《中国青年》杂志3月1日出刊，印刷还要一周，务请主席在2月25日前写好。”

2月22日，林克去毛泽东那里，发现他已经写好了。

“你看行吗？”毛泽东一边递给林克一边问。

潇洒的毛笔行草和谐地布局在

一张普通信纸上。林克说：“很好，非常概括。”

毛泽东没有用林克拟的句子，他只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大字，然后签名。他对林克说：“学雷锋不是学他那一两件事迹，也不只是学他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求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雷锋，才能形成好风气。”

毛泽东题词题好了，中南海叫《中国青年》去西单取。那是下午3点钟，《中国青年》编辑部年轻的摄影记者刘全聚骑摩托车十几分钟就取回来了。

《中国青年》杂志社一片沸腾。

连云山回忆说，他是最先得知毛主席题词的，十分欣喜。

邢方群说，毛主席题词像宝贝一样当时就挂到墙上的镜框里去了，这份真迹后来被中央档案馆收藏。

《中国青年》把毛主席题词的事汇报给团中央书记处，经请示中央有关领导决定，毛主席题词由新华社制版发通稿给各新闻单位。

因为毛主席题词是给《中国青年》的，《中国青年》又是3月1日出刊，所以决定3月2日发通稿。罗瑞卿那时是总参谋长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指示，《人民日报》要发很长的中苏论战的九评，再推两天。于是，新华社3月4日发通稿，各报均在3月5日头版头条刊出了毛泽东为雷锋的题词。从此，3月5日成了雷锋纪念日。

大概是由于新华社统一制版的，《中国青年》杂志没来得及把毛泽东题词装订在专辑上，而是搞了一个插页。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都在雷锋专辑上，周恩来给雷

锋有两个题词。

周恩来的题词是很快送来的，题词为：“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

《解放军报》得知后，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分别发信请求题词。这时候，毛泽东题词已送到《中国青年》杂志，周恩来说听后，叫秘书打电话问了内容，决定给《解放军报》再题一词。据邓大姐后来回忆，那天夜里，周恩来又一次翻看了《人民日报》关于雷锋的报道和雷锋日记摘抄，然后踱来踱去沉思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提笔书写。

周恩来为《解放军报》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写好后，周恩来又请秘书打电话请《解放军报》帮助修改一下，前三句中憎爱、言行、公私全是一对矛盾，而最后一句的斗志是否也能改成矛盾的一对？

《解放军报》考虑了好久，再也找不出合适的词，就按周恩来的原样刊出。

同时刊登的还有刘少奇、朱德等的题词。

毛泽东的题词发在头版头条。

还是在《人民日报》登出雷锋日记摘抄不久，《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给沈阳的新华分社社长鲁蛮打了一个电话，询问雷锋日记。鲁蛮让佟希文回答。

原来，周恩来和邓颖超读了雷锋日记后很感动，认为雷锋是青年人的好榜样，日记写得也好，周恩来要求《人民日报》社核实一下，搞清哪些是雷锋自己写的，哪些是摘记别人的，要注明出处。周恩来说：“‘唱支山歌给党听’，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沈阳军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专门对雷锋日记进行了整理，由《解放



军文艺》出版社出了书。

2月24日，仅仅用6天时间就赶写出来的话剧《雷锋》由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演出首场，立即轰动。8月1日，毛泽东打破历来不看话剧的惯例，在周恩来和罗瑞卿陪同下，在中南海礼堂观看了《雷锋》话剧。他说他是基本肯定这出戏。演出后他高兴地与演员合影。

周恩来与演员握手时说戏不错，这样的事能写成戏很不容易，你们写成了。本子不错，戏也演得好，演得好。

毛泽东题词见报后，一个学习雷锋的高潮席卷全国，并且影响到全世界。

可以说，毛主席题词是学雷锋的转折点。发一千篇社论，或许不如这个号召有力。但是，30年来学雷锋的宣传几起几落，又常常被罩上各个时期的政治光环，逐渐使雷锋神化起来。这与最初宣传雷锋的本意是不尽相同的。1993年又是宣传雷锋的高潮年，但愿雷锋能以他平凡的本来面目走进千家万户。

（责任编辑：刘家驹）

编者按：本文以真实的材料、鲜明的观点，详尽地展示了50年代“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冤案的内情。

作者李之珪同志，任中宣部秘书长时，是处理这一案件的负责人之一。可贵的是，作者将自己摆进去，作了诚恳的反思；可悲的是，由于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同当时的领导人发生分歧，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出现了一个案中案。20多年后，这两个冤案终于平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丁玲在家中处理信函

在50年代，中国文艺界出了一个“丁、陈反党集团”，当时曾经大肆宣传，几乎家喻户晓。这个案子在1955年——1957年间有过三次大的起落，即：批判、定性——重新审理、改写结论——加温、加码、再定性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过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作为处理这个案子的参与者、冤案的知情人，有责任将内情公之于众，留之后世，吸取教训。

### 为什么批判丁、陈？

批判丁玲、陈企霞开始于1955年8月。从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党组扩大会议，对丁、陈批判斗争，参加者约70人。9月30日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

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党中央。

我是1954年12月由中央组织部调中央宣传部工作的，任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不久三位秘书长（胡绳、熊复、石西民）先后调走，我改任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批判丁、陈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的。党组书记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兼任，作家协会的一切活动，也都由周扬直接掌握。为什么要批判丁、陈，当初我并不清楚。我同丁玲过去只有一面之识，同陈企霞则从未见过面。他们在文艺界的活动情况和影响我也不了解。机关工作繁忙，我未能去参加对丁、陈的批判会。不过我陆续听到一些反映，使我产生了许多想法。

想法之一：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为什么作协党组却把重点放在批丁陈上呢？众所周知，肃反和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这不是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混在一起了吗？想法之二：丁玲1933年遭国民党逮捕，经过一些折磨，三年后投奔陕北根据地。人们对她虽有种种议论，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她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参加抗战；在解放战争期间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潜心创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国解放后，党对她委以重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并多次被派出国访问。这说明从延安整



周扬

“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作家的“反党活动”，到底因为什么呢？

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结束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的题为《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由周扬主持起草，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的，我是这个部务会议的参加者。报告中说，批判丁玲旨在“整顿文艺队伍”、“克服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

我读了作协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后，有一个很深的印

▽五十年代的张际春、罗屏夫妇（罗屏在文革被迫害致死）



风以来，她在创作上工作上可以说大有建树，是当时有重大影响的一位作家。为什么作协党组要这样地批判她呢？想法之三：周扬长时期从事文艺领导工作，他对丁玲的情况，无论是长处还是弱点，都是了解的。对丁玲的作品，周扬曾誉为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描写农民的。他还称赞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中优秀的作品。”不料，时隔一年多，却由他主持批判这个曾被她颂扬为创作了

象，报告题目和内容不符。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表现。报告还说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并说在周扬“帮助丁玲准备检讨发言稿时……她承认了自首的事实。”

报告中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党的“托派嫌疑”，说“党组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当时这二人已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对丁

玲的处理，报告中则说要“审查她被捕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并作出结论；对她的错误，如何处理，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

这个报告引起我的一些疑问。第一，“丁、陈反党小集团”既是反党的，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既然是“丁、陈反党小集团”，为什么报告中罗列的事实主要指丁玲，而对陈企霞只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丁玲是反党小集团的为首者，为什么只决定开除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是看她以后的态度？……这些疑问，从报告本身得不到解答。

第二，开除党员的党籍不应由党组作出决定。党章上并没有规定党组有这种职权，而应该按照党章规定的手续去办，允许本人有申述的机会，不应该把人关起来后，不让本人知道就宣布开除其党籍。

但当时我对丁玲、陈企霞的情况并不了解，又是在这样的场合讨论，我当然无法多说什么意见。但是，作为机关党委书记，对所属两个党员开除党籍，我应该坚持按组织

▽陈企霞 80年代在家中



手续办理。我讲了我的看法,我说:“关于报告中‘决定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一点,应把‘决定’改为‘建议’。因为所揭发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核查后处理。也避免向中央反映不准确的情况。”

在结束这一问题的讨论时,陆定一部长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对报告的“批语”就这样通过了。

## 陈企霞、李又然问题的曲折

这次中宣部部务会议开过不久,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受命写出了“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送机关党委审批。我和机关党委的同志认为,在肃反运动高潮中,对于在政治上还没有弄清楚的党员急于开除党籍,会对运动的正常开展产生不利影响。虽然部务会同意了,但还应听听多方面的意见,提议同机关肃反五人小组联合起来,共同讨论这个决定。中宣部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兼任。他同意我们的建议。于是,由他主持五人小组成员和党委成员开联席会议,讨论作协党总支起草的开除陈、李二人党籍的决定。决定中对开除陈企霞党籍的根据有两条:一是他是“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二是,他历史上有托派嫌疑。对开除李又然党籍的根据是:他在历史上有托派嫌疑,还说他在思想上腐朽得不成样子等等。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作为托派嫌疑而开除他们的党籍不妥,因嫌疑是不肯定的。如果作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那么“小集团”的为首者丁玲尚未处理,先开除陈企霞也不适当。因为在党组的上述报告中,对陈企霞反党的事实写得很不具体,“反党小集团”成员,本来是三个人。另一人由于承认了错误并站在主持人一边揭发了丁玲、陈企霞,领导就豁免了他,而变成揭发小集团的

积极分子。这说明,“反党”或“不反党”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很不严肃。而李又然又并不属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况且这两个人在作协党组的要求下,已由中央肃反三人小组批准实行了“隔离审查”,他们已不能参加任何党的活动,开除只是一个手续问题了。联席会议最后确定:作协党总支起草的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根据不充分,要他们回去再研究重写。

改写的“决定”没有送来。到1955年12月15日,中央批发了作协党组的报告。报告中有“我们决定,根据会议的提议开除(陈企霞、李又然)二人的党籍”的话,因而开除党籍也就随着对整个报告的批准而成既成事实。

接到中央的批示后,部长立即召开中央各部门的骨干大会,传达了“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报告。

1956年5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经作协肃反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共同审查和审理予以否定。5月22日他们恢复了自由。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对这两个人的党籍如何处理?是释放后立即告知其已被开除,还是另向他们作出交代?由张际春副部长主持讨论后,认为:“丁、陈反党小集团整个案件尚未处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问题作为其中的问题之一,仍可作为还在处理过程中,不必立即宣布他们已被开除。”

陈企霞被释放后,要求同党委谈话,申诉作协党组对他所进行的批判与实际不符。5月24日,由我主持机关党委的专职副书记崔毅和作协党组的代表参加,一起听了陈企霞的申诉。他把他和周扬之间的分歧作了全面的陈述。其中有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和相互关系问题。陈企霞认为,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没有根据,是捏造事实对他的“政治迫害”。谈话以后,陈企霞

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机关党委。这些材料照例也都印发给各领导和有关同志参阅(包括周扬本人)。

李又然被释放后,也要求同机关党委谈话。是崔毅主持谈的。他从头叙述了他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据崔毅同志向我反映,在他听来,李又然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见得李是错的。这种谈话,当时机关党委也只是听听,向领导反映反映而已。对反映周扬这样的领导人的任何意见,机关党委无权处理。

但对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问题如何处理,这关系到如何对待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宣部部务会已通过的决议和中央的批准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又提到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讨论。

1956年6月28日,由部长主持的部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关于陈企霞等问题)今后的作法,确定由张际春同志主持,由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党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将事实查清楚,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再提出处理意见。”此外,并同意陈企霞(等)继续参加党的生活。

会后,张际春为此事向中央总书记请示报告。小平同志同意。

机关党委为了进一步落实上述决定,“由杨雨民、郭小川、阮章竞、张僖、严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负责……要求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汇报时由际春同志主持,并吸收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林不在时由苏一萍代)、李之珪、崔毅、张海等同志参加。”

根据查对事实的结果,作协党组起草了《关于陈企霞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是这样写的:“……根据上述查对结果,对陈企霞同志的错误结论如下:

“一、陈企霞同志,主要在他主持‘文艺报’工作的期间,作了不少

工作,在有一段时间内,工作也比较积极,同时由于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文艺报’的工作获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陈企霞同志却因此骄傲自满,因而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严重错误。

“二、陈企霞同志和丁玲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两人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他们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作为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结论(草稿)由邵荃麟等送部长审阅同意后,找陈企霞谈话征求意见。陈企霞根本不接受,而要求“彻底平反”。

## 对丁玲是非的调查

丁玲在1955年被批判后,安排她到颐和园独自“闭门思过”。

1956年夏,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这个任务。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我,还有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共五人组成专门小组负责进行。

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或者说被绑架后,有叛变或自首、

变节、投敌、反共的证据。调查材料和丁玲自己的交代是一致的:1933年5月,她在上海被捕后被送往南京。敌人没有把她关进监狱,有意安排她同先已被捕、叛变的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借以争取她为敌人办刊物。丁玲表示,以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愿回家养母,拒绝为敌人服务。后来敌人看到她的消极态度,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她利用各种线索,先到北平找李达,未能解决,又经曹靖华写信到上海……同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在冯雪峰等同志的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从南京接出,转送到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专门小组根据当时党关于处理党员被捕、自首等类错误问题的文件精神,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对丁玲被捕的问题认为:有变节性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她从南京回到陕北根据地,结论为: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

这个结论是专门小组内部妥协的产物。因为在审查过程中,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坚持定为“自首、叛变”,张际春和我、张海等则认为这没有根据,不能成立。争论不休,后即改为“犯有政治错误”。这样修改,才得以最后通过。结论文件共讨论修改了七稿,是逐字逐句修改通过的。

我同张海受命将通过的结论同丁玲见面时,她对否定了“自首”一点感到满意,但对结论定为“有变节性行为”不能接受。于是她又写了声明。我们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和结论一起报送中央审批。在我们和丁玲谈她的历史问题后,她要求谈她的(反党)错误。她说: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表示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

但我同张海只是代表专门小组和她谈历史问题,没有要我们谈反党错误,我就告诉她:“我们没有这个任务,有意见可以找陆定一、张际春同志去谈。”

丁玲表示为难,认为找他们很不容易,于是她哭了起来……

我说:“你觉得找他们困难,写出意见来交他们看也可以。”

专门小组对丁玲的历史审查结论报送中央以后,中宣部又组成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专门小组的成员有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林默涵和我共五人,在小组以下建立了工作组,由干部处长张海负责,刘白羽、杨雨民参加,并抽调中宣部干部处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干部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

小组该如何进行工作,在小组内部争论很大。有的同志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应以这个报告中的事实为基础定案作出组织处理。我和张海则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的上述报告,只是从政治上作了结论,如果作为组织处理的根据,还需要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件作调查核实;也还需要听听本人的意见。这是一切定案工作所必须的步骤。

这两种意见向张际春报告后,他同意我和张海的意见。他认为,核实一下,处分的根据更确实,被处分者也较容易接受。

于是张海负责的工作组就根据这种精神,按照作协党组上述报告中揭发的丁玲反党问题的事实,逐项作了调查(有的人由我直接谈话调查),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材料,印发各有关的人参阅。

丁玲本人写了一批申辩材料,提出对她批判的许多问题不符合事实;她还写了对周扬的意见。

丁玲在送交这些材料时,附有一信给我。丁玲的这些材料同其他调查材料一样,印发给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

周扬对于把丁玲写的材料里有

对他的意见印发给有关人员看，十分恼火。他找部长出来制止此事。有一次在部长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部长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我：“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

对周扬这种指责，部长并不表示异议；我作为下级，只能看作是领导的决定来执行。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就只好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

对丁玲等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到1956年冬季才结束。这件事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引起了震动。原先人们以为丁玲问题早已定案，现在又来调查必然还有问题。人们又看到，作为托派嫌疑而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的陈企霞和李又然，也已无条件释放。现在，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又不是以周扬为领导，而是由张际春任组长……这一切变化，在人们的思想中就产生一个疑问：周扬在作协所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正确？……

这种情况，同1955年“反胡风”、“批丁、陈”和肃反初期形成周扬是“绝对权威”已大不相同了。于是，有些人在1955年批判丁玲时作为积极分子揭发问题的，现在被调查时却声明：他过去对丁玲的揭发、批判是某某叫他那样说的，要求更正他过去所讲的情况。于是，我们又一个一个的找人谈话、对证过去的揭发是否属实。

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于虚乌有。比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

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

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等等。

调查落实的情况和原来报告所罗列的事实既不相符，就必然牵涉到原来的定性是否正确也值得考虑。那么究竟应该根据原来的报告定性，还是应该根据落实的问题定性呢？以张际春为首的专门小组不能决定，只好又向中宣部部务会议报告。

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务会议，由部长主持，专门工作小组张海等作了调查结果的汇报，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求明确指示。”

部长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部长说：“也

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我对于周扬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为什么不和有关组织共同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批判结束后为什么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作这样的报告？……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又是什么意思？特别是现在在这个会上来说明这一点又是什么目的？

这一切归纳起来，使我不得不怀疑周扬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机关党委的同志们心中也都有这样的疑问。

这次部务会以后，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作的不足。从此（1957年1月）对丁玲“反党”问题的处理工作在他亲自主持下积极进行。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和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开了若干次会，由郭小川根据周扬等同志的意见，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丁玲和陈企霞是“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写出了几稿都说“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最后是依照对陈企霞结论（草稿）的模式定稿的。

作协党组起草的《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是这样写的：“……根据以上查对结果，对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结论如下：

“一、丁玲同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和文学界的组织工作方面，都作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丁玲同志却因此滋长骄傲自满



情绪,犯了不少违反组织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损害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

“丁玲同志与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但是,这个由周扬主持修改的结论稿,还没有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1957年5月《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了。这个结论没有公布,也没有同本人见面。但有些人却知道已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

## 整风中的变化

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向领导提意见。

向中宣部领导提意见,最集中的是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因为,这是几年来反复几次还没有得到处理的大事。

这种情况,引起了部长的重视。他认为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陈既有这么多意见,而这个批判和向中央的报告及代中央拟的“批语”都是作协党组主持的。因此,他决定再把这一问题交回作协党组,再讨论如何处理。

1957年6月6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部长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

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有这样的话:“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作是很不应该的……”

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

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示承担责任等等。

周扬为什么在这时候率先这样表态?从他原来的态度来说,已有了根本的转变,这比他主持修改的结论(草稿)又有很大的变化。但从组织上来说,“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中央宣传部讨论同意的了,中央批准的,现在作协党组的几位同志这样宣布是否请示了中央?……我对这种转变感到高兴,但对这种做法则有怀疑。于是,我向张际春作了汇报,问他事先知不知道他们这种作法?他说:“谁知道怎么搞的哟!他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嘛!”

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

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批评意见的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次,再也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

## 在“反右”中加码

中共中央于6月8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当天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整风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由部长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我完全不了解此事的酝酿过程。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丁、陈问题上有两种不

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珪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

彭真听了部长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

部长没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辞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

向中央书记处这样汇报情况是很片面的。部长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丁玲问题调查结果同当时向中央报告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他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决定等等重要事实。

我当时考虑,如果我发言说明这种种经过,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我并想到,部长既然认为张际春和我同他意见不一,为什么不让我张际春来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而单独要我来?……这种复杂情况,使我犹豫了。我想,那就只有让事实来证明吧,好在有大量的调查材料,于是我未发言。

这正是我的怯懦和失误。

邓小平同志最后只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去讨论好了。”他态度冷静,语调平和,对谁似乎也没有批评。但我已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没有把情况弄清楚就又将此事的处理全权交部长了。这使我感到忧虑。

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也参加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因在这以前,我曾向他反映过我对周扬和丁玲之间问题的情况和看法。他听了部长在会议上的汇报后,感到不解,而我又未发言,因而产生了怀疑。会后,他把我找到中组部去问明情况。我向安子文又介绍了分歧所在和发展经过;说明张际春和我认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陈所揭发的事实同1956年处理时调查的结果事实不符,不应按原来的定性

处理,这是部长了解并同意的了,现在他又不承认了。

安子文听后告诉我说:对丁玲问题的处理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表示,他将再向彭真去反映。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部长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部长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文件从中央撤回,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部长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中宣部部务会的参加者们,除张际春、周扬、张海和我以外,其他人都不了解对丁玲历史审查的经过和实际情况。周扬虽了解,但他又否定了自己同意过的结论。因此,对部长的意见没有人提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赞成。但部长这样定了,专门小组通过的、字斟句酌修改多次、一致通过的结论,就此被否定。而这个新结论,并没有向本人宣布。

周扬对这种支持,自然很满意。他还不顾事实,在会上又提出:丁玲等在作协党组整风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闹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对1955年的批判不满,则是替丁玲翻案;而这种翻案活动都是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了丁玲问题时所鼓动起来的,等等。

周扬这些说法当然是有意颠倒是非。怎能把群众对丁、陈问题处理的不满说成是机关党委挑起来的?周扬自己曾主持修改否定了丁玲等“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表示歉意,这时却又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呢?

于是,我问他:“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理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说:“那是你们逼的!”

这时,张际春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指着周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你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根据?那时按你的意见修改的,现在你又不同意了!由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张际春很气愤。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周扬不再吭气。

在担任处理丁玲等问题专门小组组长期间,张际春深感问题的复杂性,处理问题十分慎重;特别是对于周扬的意见十分尊重。他的原则是:凡开会,周扬不到不开;讨论问题,周扬不同意不定。对丁玲的历史结论,本来是周扬等坚持,才在结论上加了“有变节性行为”几个字。料不到半年以后他又反悔,并找部长出来纠正。这当然是出尔反尔,是无原则的,也是对原主持人的不信任。所以张际春很感不平。

这次会议后,有些参加会议的处长们认为我太软弱,应争的未争,说我“涵养性大,能忍事”。对他们这种批评我理解。这也正是我的弱点。如果我能像张际春那样揭露周扬,结果也许会不一样。我只是从组织上考虑到我当时的地位,注意了上下级的关系,而没有从政治原则上力争是非,揭露这种无理反复。

1957年7月,对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反击的斗争全面开展。中宣部又进一步研究作协党组如何继续讨论丁玲等问题。

部长首先提出,作协党组讨论丁玲等问题的扩大会议要很快复会。他仍主张由周扬主持,(这时作协党组书记已由邵荃麟担任)并要他在党组扩大会上再讲一次话。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会一个多月后复会。周扬讲话的内

容同6月6日的讲话根本不同,他首先按照陆定一的指示,肯定了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并表明这个批判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因此,周扬的讲话,就给人一种暗示,他不仅是代表党的,也是绝对正确的。

周扬的讲话,为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定了新的调子,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原来是讨论对丁、陈问题如何处理的讨论会,现在变成对丁、陈进一步“反击”的斗争会。会议范围也扩大了,成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这样丁玲等在前一段时间趁整风之机追问1955年批判她的原因,成了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于是就把她同陈企霞等人的个人联系和意见的一致性等等一系列行为都说成反党活动。并且把一些同丁玲有联系或有相同见解的党员作家或文艺工作者,都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如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七人。

作协党组“反击丁、陈”大会从7月25日开始,至9月17日结束,周扬在16日的会上讲了话。周扬先说了他一贯忠于党,一贯坚持斗争的光荣事迹,然后指名“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几位著名新老作家,戴上了多种政治帽子……其中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对党不忠的人。”……这个讲话,会后加以“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是的,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历史就这样打了一个句号,周扬成为文艺界正确领导和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开始了为期22年的流放,受尽了屈辱、苦难,尝遍了人间的苦辛。

## 拨乱反正总澄清

当党从“左”的阴影走出来，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回顾历史，重新审理千千万万件冤案时，阳光终于照到丁玲、陈企霞头上。河清了，天蓝了，历史终于按事实写了。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同志被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改正结论，并于1980年1月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同意，恢复丁玲同志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但有些问题解决的不够彻底，且没有在适当范围清除影响。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1955年、1959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1955年12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应予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他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四、……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

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中央组织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中国作家协会《关于陈企霞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中这样写：

“一、关于‘污蔑肃反运动，否定肃反成绩’问题。

“陈企霞在作协召开的总结肃反工作和提意见的会上，以及向中宣部党委和作协党组部分负责同志陈述意见时，确曾讲过一些意见，是针对1955年至1956年作协肃反工作而言，并非攻击肃反运动，不属于右派言论。

“二、关于‘反党集团’问题。

……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陈虽曾与人谈论过文艺界一些问题（包括丁、陈事件），但不属反党性质。

……

“综上所述，陈企霞同志的问题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把他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10级），适当安排工作。”

同丁、陈一起错定为右派的其他五人，也都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和名誉。

有人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人们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工作的。错批、错斗、错划、错定等等都是左倾思想的必然产物；也有人说，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多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群众一发动起来，必然产生过火的批、过火的斗和过火的处

理。还有人说，过去每次群众运动都规定运动对象的数字，然后分配到各部门去寻找，数字不够就把批判对象升格，拼凑数字，必然造成错误。等等。

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这些说法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一切错误处理的案件造成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左倾思想往往说不清具体是非。比如，对揭发的问题无限上纲是“左”；无中生有的，捏造事实的，颠倒是非的就不仅是“左”了。因为处理每个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对错误事实的认定，对处理人的方式方法，对当事人的各种要求等等都是由主持人规定的。这个主持人的思想作风，他对人、对事、对党的政策的态度，政治和思想水平的高低等等如何都有重要的关系。这个主持人如果经常说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无定见，或以个人好恶来认定是非，或感情冲动、看风使舵、随风倒，……他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人的是非曲直。这个主持人如果只是思想认识上“左”，但能听取群众意见，尊重多数，也不致错得出格，黑白不分。这个主持人如果实事求是精神很强，能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也能够避免夸大和捏造就能作到防“左”；这个主持人如果不存成见，能客观地对人对事，不媚上，不压下，不个人决定一切，也能作到公正处理。

往事已矣！但愿我们能从以往的失误中吸取教训，清醒起来，别再干这种既害同志又削弱党的战斗力的蠢事。

（责任编辑：白雪）

# 中国海军泣血远东

周宏冰



△海军大臣载洵



庙街炮舰交涉(又名尼港炮舰交涉),是本世纪20年代初,中俄、中日间发生的一起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外交争端。也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本事件在我国报刊书籍中绝少涉及。本文作者接触该项史料近15年,现特整理出来,一补史料空白。

码头上满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根据日本西伯利亚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大井的命令,这四艘炮舰,已被日军扣留,庙街的中国领事馆,业已被日军捣毁并占领。

围绕这四艘炮舰,中日双方展开了长期的交涉。直到六七个月后,以中方接受日方屈辱条款而告结束。

日军为什么要扣押中国炮舰?中国炮舰怎么会远离祖国,跑到苦寒不堪的黑龙河口去?这场交涉的性质是什么?交涉的结局又如何?中国方面真的理亏吗?

请看笔者的调查——

## 大井陆军大将的命令

1920年6月10日。

地处外黑龙江入海口北岸的庙街,战火刚刚停下,还是一片废墟。

伸向江中的突堤式码头上,停泊着四艘飘着五色旗的中国炮舰,

▽水师鱼雷艇官兵

## 王崇文少将的调查

俄国十月革命后,旧沙俄将军们纷纷拥兵割据,反对革命。在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称雄称霸,经常随意侵入中国境内拉夫征粮,甚至抢劫村镇城乡、马帮船队。

白俄的炮舰不仅在数千公里的黑龙江、乌苏里江上任意窜犯中国江岸,而且沿松花江、嫩江一直上溯到东北腹地,劫掠中国商船。吉林、黑龙江优良的水道,中国商船几乎没有航行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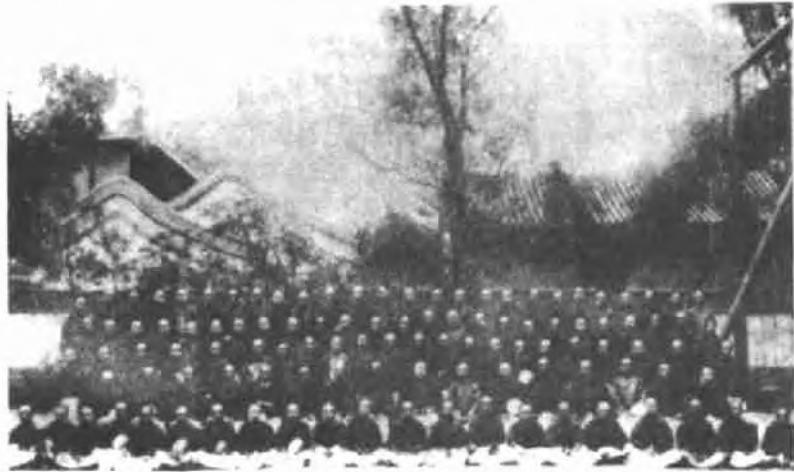
海军部决定成立吉黑江防筹办处,任命王崇文为处长。王系福建闽侯人,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曾任中



△海军提督萨镇冰



水师鱼雷艇官兵



宣统年间之海军部官员

国留英海军学生监督。

海军部通知上海海军总司令部，立即物色浅水炮舰，入江南造船所检修，准备开赴黑龙江。

总司令蓝建枢立即选定四条舰入厂待命。这四条舰是：

江亨航海炮舰：日本川崎造船所建造，1908年下水，排水量550吨，大小舰炮10门，为中国海军主力舰型。

利川浅水炮舰：江南造船所数年前建造的港湾拖船，排水量370吨。这次受命北调后，进厂改装成炮舰。

利捷舰、利绥舰：排水量均为200吨左右，原为长江舰队的巡逻艇。是1918年段琪瑞政府对德“宣战”后，中国海军缴收编入序列的。

这样一些江河舰船，为什么要横渡东海、黄海，穿朝鲜海峡而日本海，再穿鞑靼海峡而黑龙江呢？

由于《中俄璦琿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黑龙江下游1600里长的河道，已经成了俄国的内河，舰队进入又主要是对付他们。俄国人会答应吗？国务大员们翻箱倒柜，居然找出了依据：《中俄璦琿条约》第1条，《中俄圣彼得堡条约》第28条均明白记载：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至海，此后只准大清国、俄罗斯国行船。

于是，1919年7月21日下午3

点钟，江亨、利川、利捷、利绥，离开了上海高昌庙码头，驶上了一条特殊的调防道路。

### “破渡黄河冰塞川”

这支小舰队在海上颠簸到7月末方到达海参崴。

当时的海参崴，驻有英、法、美、日各协约国军队和捷克军团。中国北京政府，也派有一支象征性的军队：拥有数千人的一个混成旅和一条排水量三千吨的轻巡洋舰。节制这支部队的海军代将林建章，在巡洋舰上宴请了远道而来的江亨等舰的军官们，并对数艘小舰的远涉重洋，表示了高度的嘉奖。

由于北平寄来的江亨等舰粮、煤款项没有收到，诸位舰长决定在崴埠停留几日。

这一停，节外生枝的事情来了。

海参崴最高统治者霍尔瓦特，对于中国舰队的到来，表示了“理解”的姿态，同意中国舰队借路一举。霍氏的友善，是日后留路——他的看家老底中东铁路都在中国，倘红俄越乌拉尔山东来，他只能回中东路。不管怎样，霍氏同意，这便是俄国的官方态度。

然而，接中国政府“借路”声明后沉默多日的鄂木斯克政府，突然在这时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方面“实

行炮舰外交”，“违背中俄条约”，表示不许中国炮舰借路。

霍尔瓦特致电鄂木斯克，说明了中国舰队真实动机，表明了他的态度：请中国舰队先开赴庙街。

但是，鄂木斯克方面沉默了，或者说不愿理睬。

中国方面猜测起来。

有人曰：沉默便是默许。

有人曰：沉默是想延宕我们——延宕之中，鞑靼海峡和黑龙江便都到了封冻期。

中国舰长们则致电已在哈尔滨的王崇文少将：查俄人遇有交涉无理之时，惯用狡诈手段，作为对付我国之唯一办法，拟请通电中央，务请坚持到底，勿稍让步，盖此机一失，则松、黑两江航权，永无恢复之望。继而作出军人的抉择，于8月21日离崴北上。

此后，王崇文电告北京政府和海军部：

“以秋风渐高，该舰迫于不可抗力，势难久候，故已自崴进驶。且现在免使俄方为难，令径直驶至松花江。若此当以假道通过，为国际河流间常有之事。况值中国参列联军，协助俄国困难时期，情况又当别论，俄国尤应示以随顺。……”

此时，海参崴最高执政易人：鄂木斯克派陆军中将罗萨诺夫接替了霍尔瓦特。当时中国报章称罗萨诺

夫则为“凶狠暴戾之铁腕”。罗氏上台伊始，便推翻霍氏“请中国舰队入庙街听候”的承诺，发出“不许中国舰队驶入庙街”的死命令，又指使庙街俄军，破坏了黑龙江口的航标，以炮舰把中国舰队拦阻在黑龙江口外。

中国舰队被迫停泊鞑靼岛——库页岛上的小海湾中。

库页岛俄名萨哈林岛，日本名桦太岛，原是中国第一大岛，也是《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被攫入俄国版图的。俄人把它作为“罗马式的荒岛流放”的理想地，因此岛上地旷人稀。中国舰队停泊的小海湾中，“只有土屋数间，系鞑靼人所住，亦有俄人数个杂居其间”。所谓鞑靼人，即土著的、中国血统的费雅喀人或赫哲人。这样几户人，怎能供应四艘中国军舰数百名官兵饮食？于是没有几天，中国舰队便“电告绝粮”，陷入困境。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时期。作为战胜国、中国充满了“伸我公理，屈彼强权”的颂歌。中国方面原认为，此事协约国一定会大帮其忙。因而中国外交官一面同鄂木斯克政权直接交涉，一面与协约国家接洽。鉴于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庞大驻军和对鄂木斯克政权的巨大影响，中国驻西伯利亚高等委员刘镜人首先拜会了日本驻西伯利亚高等委员松平。松平答应帮忙。但几天后却回答：已经请示东京。东京的意思是：俄人举动，颇合法理，日本方面，只能代转双方旨意。

英国外交官这样答复：英国政府因西藏交涉，对贵国大失所望，未必肯为贵国效力。

与美国外交官的接洽，没有结果。

与法国外交官的接洽，没有结果。

拜见高尔察克本人的中国驻鄂木斯克公使范其光，等于受了高尔

察克一顿臭骂！

这时的中国舰队，已经处于“风浪日高，潮水日低，绝粮已经多日，员兵死亡相继”的绝境。坐镇哈尔滨的王崇文焦虑如煮，又不详知外交交涉情况，便以被困舰长的口气，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庚电”：局势到了这般田地，“外交部岂能坐视不救？”

外交部无可奈何地辩解：本部办理此案，没有丝毫懈怠，实在竭尽了全力。本部有关官员暨刘公使（刘镜人已改任驻日公使），已到唇焦舌敝的程度。然迄今没有明显效果，外则因日本想垄断黑龙江航权，暗中支持鄂木斯克作为；内则因我国国力薄弱，时令艰危。王处长庚电，对本部颇为责难之语，这是实在不明瞭了本部的困窘。

王崇文只有一哭而已！

王崇文又向“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求援：

“外交棘手……各舰受厄鞑靼岛，数百员兵已经绝粮。中央交涉久无效果，日人阴谋狡计百出……江防一举，不独关系海军成败。若不能协力争回，而轻易让第三国擅作主人翁，如海之主权何？如国体何？文身败名裂不足惜。我公身任疆寄，北门锁钥，责无旁贷！拟乞钧座念国家边防、国权，与夫东省成败存亡，关系至为重大……”

张作霖被感动了。他禁止粮食出口，“藉以致俄死命”。

东北王这一着堪称厉害。多年以来，俄国东部地区的粮食棉布，都是从中国东北进口的；而现在秋高风紧，又正是俄军采购粮食备冬的时候。白俄将军们只好做出一点让步。

9月25日，中国舰队得到俄方通知：可以开赴庙街“过冻”。

第二天上午10点半，中国舰队进入庙街。

从此，中国舰队进入了第二个困难期——

## 庙街，只得暂住

庙街，位于黑龙江入海口北岸，当时有居民16000余众，其中华侨就有几千人。他们多是由山东来此经商的。听说中国炮舰来到这里——这是中国炮舰第一次来到这姓了外姓的故城——不约而同地来到码头上看望。看到中国海军官兵那瘦削、黝黑的脸庞，不知有多少华商泪水盈眶。

华侨商会孙会长登舰拜会江亨舰长、编队司令陈世英中校，并告诉陈世英：他早就受王崇文委托，寻找舰队踪迹。倘若中国强大，何至于斯！

舰长们了解了庙街的港口情况。

俄国当局却要中国炮舰在这里过冬！

中国驻鄂木斯克公使范其光，再次同鄂木斯克政府交涉：炮舰钢板既薄，舰员又多属南方人，耐不得庙街严寒，请允许上驶松花江；这些年来，俄军屡入中国境内，从来不通告中国政府；中国炮舰此行，既有条约于前，又声明借路于后，情理尽到。贵国如此坚决，则情理尽输。兹代表中国政府申明：如果仍坚持不允，中国只有电促舰队溯江。

鄂木斯克态度一如既往：如逢行，必击沉。

礼仪既到，北京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便于10月11日致电王崇文：按国际公法之自保主义原则（注：应为强行寄港，指军舰在遇到不可抗拒的灾难时，有不经他国批准进入他国港口的权利），应准滞庙街炮舰相机办理……此系死里逃生，不得不然。

同日，王崇文电告各方：

“与俄国交涉，只有抗议，已表明无法抵抗。现日人已宣布局外。经苦口交涉，几成哀求，始进庙街。又声音须候交涉，实为变相之扣留。此

种对待方式，毫无敦睦之诚意，直同邦交之决裂。军务有进无退。既经声明原因，犹予扣留，是辱中国军旗。查万国公法，凡因自保主义发生一切行为，均认为合法。特命参谋毛钟才前往宣慰舰队，并以（自保主义）合法权利令其相机办理。总以舰船及士兵可以保全，军旗尊严可以维持……”

毛钟才和舰长们商定：舰队逆行松花江。

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是有原因的。一是没有了日本为对手之忧；二是越乌拉尔山东进的俄国红军，已经兵临鄂木斯克城下，高尔察克集团已朝不保夕；三是俄军可以阻拦中国舰队的要塞，只有伯力，而伯力又有中国奉军一混成营，一旦发生冲突，我国集合（驻西伯利亚）海陆兵力，自卫尚属不难（王崇文10月26日电）。因此虽然舰队临行前，已得到哥萨克武装正向伯力运兵的情报，但还是由一位精通航路的佟姓华人引领下，溯江而上了。

七天之后的午后，舰队行至伯力下游，能够望见中国人所谓“黄沙大铁桥”的地方，离祖国已近在咫尺。只须再航行个把小时，这数千里航行就可以画上句号。水兵们的情绪是激动的，但是同时也紧张：这正是俄人声明拦阻的地方。他们是空话吓人呢？还是要来真格的？舰队一边航行，一边保持着高度的戒备。

这时，空中传来炮弹的响声；一组炮弹老鸱般飞过来，在江面上竖起一片水柱。俄军开始拦阻了。江亨舰上当即有三名水兵受伤。

江亨舰长兼编队司令陈世英立即打出旗语：我们是中国炮舰，请不要误会。

俄方要塞炮台回答：没有误会。速回庙街，否则将集中炮火击沉。

中国舰队反复说明原委，语调几乎近于恳求；我们奉北京政府命令行事，不明处可向北京政府询问。我们只是借条路走，请允许进入伯

力，上岸交涉。

俄国炮台仍是一句话：无论如何，必须先回庙街。贵舰队可以栖身之处，除庙街外只有江底。

炮弹如黑鸱群朝中国舰队飞来。

中国海军官兵忍无可忍。但既不知敌方详情，又不敢使事态扩大，只好狠狠地还击了三群炮弹，便掉头回航。在一个名叫乌洛列夫斯基卡娅的小村靠岸，派佟领航上岸打探消息。

佟领航带回的情报是：桥头山坡上把守的有俄国兵，也有日本兵，桥下还布了水雷。

舰长们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返回庙街想办法过冬。

四舰回到庙街，使我国侨民震惊。他们立刻帮炮舰寻找土坞，帮官兵寻找宿舍，并自发为官兵筹集过冬的粮食菜蔬。庙街粮、菜历来紧张，过冬粮、菜更须提前几个月筹备。华侨们的帮助，自然使海军官兵感到温暖。但在这温暖中，他们迎来的却是——

## 庙街，透骨的严寒

炮击中国舰队的，原以为是“某国兵”即不好明指之日本兵。但事后查明，是白俄少将高梅科夫的部队。高梅科夫后被红军战败逃入中国境内，被中国边防部队解除武装并处决。

中国朝野震怒。

11月1日，东北王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政府果能严重交涉，三省必定合力协助，以为后盾。

11月6日，北京政府致电鄂木斯克政府：一、所有炮舰未抵黑龙江之前，应用之粮秣、煤炭等须由鄂政府供给；二、封江在即，各炮舰不能驶至预定地点，舰底如有冻损，应由鄂政府负责。

都没有用。鄂木斯克政府怕连抗议照会都没有人看了——中国炮

舰撤回庙街的第三天，高尔察克政权就开始向伊尔库次克溃撤。

1920年1月，俄国远东局势开始剧变。

1月28日，“过激军”占领庙街地纳罗老炮台；2月5日，炮击庙街日军无线电台。为了舰队安全，舰队司令陈世英便与庙街日俄政权签订了中立条约，并在报纸上刊登，使舰队的中立地位有了法律上的保证。

次日，白俄军队撤退。日军与红军停战，并以“军乐一队”迎接红军入城。红军步兵、骑兵、滑雪队、工兵共约两千余众。其中中国人颇多。均是山东等地来俄的华工。市街秩序安定，商店照常营业。

第二天早上，陈世英等人准备去拜谒红军将领，刚要动身，红军将领二人却先一步来到。其中一为男性，年约四五十岁，名叫特列彼耶金，为司令；一为女性，年约20几岁，名叫尼娜，为副司令。特列彼耶金只有一条胳膊，人称一臂司令；尼娜美丽伶俐，善骑射，人传为特列彼耶金的女友。陈世英向对方介绍了舰队的遭遇。特氏颇表同情，也向中方介绍了苏俄的政策，以及俄国远东的革命形势。

自此之后，苏俄红军官兵便常到中国水兵宿舍中闲谈串访。中国海军官兵这才知道，世界上还有社会主义这样一番道理。多出身于贫寒家庭的中国水兵，对红军产生了友好的情感。

日、俄、华三军这种和睦局面，持续了一个月。

其实，对于日军和红军，这是阴谋和算计的一个月。

3月12日凌晨2时，庙街突然枪声大作。

熟睡中的庙街市民被惊醒，窗外已是满天火光。

不论谁先起衅，中国炮舰是置身战火中了。

为了保护炮舰，中国水兵立刻奔上炮舰，严密监视周围战况。两个

小时后,突然发现数目不详的武装人员,正迅速向炮舰运动,似要进攻炮舰模样。炮舰以灯语询问,得不到任何回答,便立即向空中发枪警告,对方却依然我行我素。

这真给中国海军出了难题:陈世英略一沉思,立即命令火力拦截。炮舰上多挺机关枪一齐开火,很快把不明背景的偷袭者击退了。他们有“华舰中立条约”的依据。

天亮才知道,那偷袭者是日本军队。他们在冰河上留下了三具尸体。

为了避免引起国际交涉,他们立即在冰上凿窟,把三具日军尸体扔了进去。

第二天,只有两个中队的日军,终于被俄国红军战败。除了数百人战死外,还有130余人被俘。战死者中,有自杀的庙街日军司令三宅少佐和领事石田。被战胜者以残酷手段虐杀的,还有数百名日本侨民。

无辜的华侨和俄国平民,也有500余人死于战火。

战后的庙街满目疮痍,由于华侨接济的粮食几乎告罄,中国炮舰官兵开始节食;每人每天仅三个窝头,佐餐的甚至只有糖开水。

忍着饥寒,中国官兵却没有疏忽自己的中立责任。

他们派代表到庙街狱中看望日军俘虏,要求施之以人道主义。他们派出一支小部队深入到庙街郊外矿山,集中并护送分散在那里的英、美、丹麦等国侨民到庙街,保护起来;他们在距庙街几十里的马街设立“万国公民居留地”,收容不堪其苦的各国侨民乃至俄国平民。

转眼到了五月,黑龙江开冻了。

日军“北部沿海州派遣军”编成,声明要反攻庙街报一箭之仇;三岛、三笠两艘重巡洋舰也开抵黑龙江外,封锁了任何船只出口。

6月2日,中国水兵陈国治四人,督护44名民工,乘一条大木船到玉童山运柴。回归的路上,听到上

游炮声隆隆,估计是日、俄的反攻大军到了。便把木船拢靠江边,并在桅顶升起两面中国国旗。不大工夫,果然是满载日军的船团。船团鱼贯而过。但几艘俄国炮舰却徘徊不走。其中一艘舰朝大木船驶来,在一华里的距离上又忽然开了炮。中国水兵和民工急忙挥舞国旗,以示非他。但那炮舰却视而不见,或者说故意地向中国帆船开了炮。中国水兵急忙跳入水中,雇工伤亡30人。

这正是在白俄配合下,从伯力水运反攻庙街的日本“北部沿海州派遣军”。

击毁并以火焚烧了中国运柴船之后,悬挂着旭日旗的白俄舰继续向庙街下行,在马街遇到了保护“万国公民居留地”的中国炮舰。又一阵恫吓性的炮击之后,便把中国炮舰团团围住,以灯语宣布戒严。

于是,刚刚脱离炮火硝烟的中国炮舰,又被卷入了一场——

## 没有枪炮轰鸣的战事

庙街炮舰交涉中俄矛盾转为中日矛盾。

庙街日军的全军覆没和日侨的惨遭屠杀,西伯利亚日军总部惊愤之余,开始寻找导致庙街日军全部覆灭的其他因素。

5月26日,海参崴报上出现消息:庙街之役,华人、韩人均参战助俄,中国炮舰且供给红俄炮弹。

实际上,在马街“万国侨民居留地”避战乱的,除了华侨、朝侨、日侨和欧美各国侨民外,还有俄国平民尤其是中产阶级分子。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列彼耶金这支红军武装也左得出奇,不但要将庙街“全埠焚毁”,而且对中产阶级实行“以肉体上消灭”的政策。据戴尔佐治回忆:“是役也,俄人除逃往华人组织之万国公民居留地和森林中的少数幸脱浩劫外,其余均遭屠戮。(红军)计所害生命日人834名,俄人四百有

奇”。逃往“万国公民居留地”而幸免的俄人,有的甚至加入了中国国籍,留在中国江防舰队服务。江防舰队俄人医师斯尼斯克,就是其中的一位。1979年,笔者采访担任过江防舰队司令部参谋的范杰老人,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此事乃人。

这样看来,中国舰队是忠实地履行了中立武装的职责的。遗憾的是:特列彼耶金的游击队却食了言。他们在帮中国舰队“大船数十艘”载各国侨民、华人和俄国少数平民赴马街后,却突然焚烧了战俘营,屠杀了全部日军战俘。屠杀手段之残酷,戴尔佐治记载:“不是用枪决,而是用刺刀挑刺,遥望黑龙江上,尸体堆有三大堆之多”。以致俄共滨海省委事后声明:特列彼耶金虽以政府名义行事,却并不代表政府,其行为纯属私人性质,实有害于苏维埃之利益。屠杀许多妇孺之事,或许有之,一俟调查确实,定将特氏送交军事法庭。

反攻庙街的日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但他们却错误地选择了发泄对象。

6月4日,日本“北部沿海州(即滨海省)派遣军”司令津野少将进驻庙街,命令看押中国炮舰;6月10日,日本“西伯利亚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大井宣布,对中国炮舰实行扣留。

同期,中国驻庙街领事馆被捣毁。

理不亏的中国海军官兵,也决不在强力面前低头。他们明确通告日方:倘要夺舰,一定死力抵抗,甚至不惜打开海底门自沉!

或许是惮于此计,或许是驻庙街海军兵力不及中方,日方除了监视中国炮舰,没有敢于收押中国炮舰官兵。

华舰被扣,“万国公民居留地”自然瓦解。各国侨民尤其是华侨流离失所,“陷入绝境”。



受北京政府指令,哈尔滨戊通航业公司派四条客轮,出境接运旅俄华侨。日本方面亦无异议。但是船抵伯力,却再次被俄国当局阻于坚城之下,不得已而折回。

中国驻海参崴陆海军司令林建章——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有着进步色彩的人物——给滞庙街中国海军官兵捎来了一批面粉、白糖、香烟、罐头等物,并派一名副官前来慰问。这副官告诉四舰官兵,北京政府和我驻海参崴外交机构,正全力办理炮舰交涉,请安心静候消息。日本方面已经有所松动。

日本需要北洋军阀的合作。

七月,中日各自的交涉代表团组成,开赴了庙街。

这是一场——

### 貌似平等的平等交涉

25年之后,当干出了策划“满洲国”独立,逼中国签订了“秦土协定”,率大军进犯印度支那和南洋诸国的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成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受审时,曾追随土肥原庙街交涉的铃木贞一,这样提供当年在庙街活动的证词:

……我们的具体任务,就是查清在尼港事件中,中国炮舰从黑龙江上向日本领事馆等地发炮轰击的实际情况,以便根据事实迫使中国承认……

我们组成日中共同调查委员会,先到炮舰进行实地调查。但中国方面坚称当时全舰官兵都已上陆,决无开炮之理。我和土肥原先查看了炮舰的航海日记,未发现当时有在舰上工作的情况。……就在舰上从头到尾一一检查。我去弹药库和厨房等处,一无所获。土肥原到锅炉房去,不多时他大声喊着“有了有了”,喜形于色地跑来找我。

原来,那时的军舰都烧煤。他详细检查了煤炭消耗的情况,并找到了耗煤日记,一天天地计算核对,终

于发现了炮击那天耗煤特别多。毫无疑问,炮舰在那天有过活动,从而证实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全员上陆是假的。

土肥原的“有力证据”,迫使中国方面不得不赔礼道歉,并在承认事实的文件上签字盖章……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关防

这证据“有力”在何处?既非物证,又非间身其事者的人证。耗煤多吗?中国方面只须一句话——为预防外人夺舰,那天我部少数官兵上舰护守——就可以给驳回去。

当年参与此事,任中国利捷炮舰副长的陈拔,任利捷炮舰书记官的方沅二人,50年代末或者60年代初,这样回忆交涉经过:

中国舰队出席共同调查会议的,只有四位舰长。中国方面大多数辩护,由江亨舰长、编队司令陈世英负责。……日本终不能检出我协助红军的真实凭据,并不能揭出我实在短处。日方最后强调说:四舰系有政府国家的军舰,应当帮助有政府的国家帝俄,以肃清红军,就像我日本之协助帝俄一样。我方答以红军事属俄国内政,外人何得干涉!而且我舰乃过路客军,借此过冬,与我中央政府通讯中断已久,无从请示,未敢自属;况我等到此为保护华侨,倘轻举妄动,反害华侨生命财产,也违反我等职责。所以严守中立……

然而,战场上的中立并不能阻止国家的耻辱。

1920年9月9日,日军开始由西伯利亚撤兵。

九天之后,大井大将正式公告:日军从伯力撤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舰队才得以脱除扣押,先后于9月19日、9月21日上溯黑龙江,经伯力驶进松花江。本来一个月即可完成的这次调防,中国舰队走了两个年头,14个月!

日本某大员说得好:弱国无外交。

中国舰队回国了,但外交官司还在继续打。

9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拜会中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惠庆,要求:

一、中国政府应正式向日本政府道歉。

二、前伯尼港之中国炮舰(所属舰队)司令应向尼港之日军司令谢罪。

三、所有有关系之中国海军官兵,俱应受惩罚。

四、(旅居庙街)日人之被害,中俄双方都应负责,中国亦应出抚恤金。

顾惠庆的答复:

一、道歉,北京政府行之。

二、谢罪,吉黑江防舰队行之。

三、惩罚有关海军官兵及为被难日人出抚恤金事,等以后再定。

(责任编辑:刘家驹)

# 抢救秦文的人们

武勤英

耸立在泰山之巅的由丞相李斯篆写的《泰山刻石》，有“天下第一碑”之称。经年风雨剥蚀，国祚变幻，到宋代，223字的《泰山刻石》只剩下150多个字，明代剩29字，清乾隆年间一场大火后，就剩下现存泰安岱庙2块残石上的10个残字了。

24史唯缺秦史，只能从秦代7碑中找到历史的见证，因它记载着秦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丰富资料。然而，这些秦碑除泰山碑残石10字，琅琊台刻石留有13行残字外，其余5碑已荡然无存。

为了抢救国宝，八十年代初，文化部批准了秦文研究所关于“研究恢复秦代七碑”的倡议，所长李文放，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李文放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进城后担任了领导干部，但仍把全部业余时间放在研究篆文上，苦心收集了1000多册篆文资料，她终生与篆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秦碑的考证临写，至关重要，她率领全所同志，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集历代碑帖拓片，到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博物馆查阅典籍，披沙沥金，扶微钩沉。那些不断从地下出土的“秦虎符”、“秦诏版”、“秦瓦当”、“秦砖铭”、“秦权”、“秦量”更是视若至宝。他们对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随葬，和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等资料和碑帖，逐字逐句一笔一划进行排比。

为了校正被石花模糊的字体，李文放和所里同志们六到岱庙。一次，考查途中出了车祸，她右手腕粉碎性骨折，出院不久，又拄着拐，来到岱庙东御座，对着《泰山刻石》10个残字仔细观察，揣摩其神韵。他们也曾为同一篇碑文里出现同一字的



△秦文研究所所长李文放

不同写法费尽神思。但经过反复核对历代碑拓，证明那2块残石确系秦始皇封禅泰山时的原石，10个残字确出自“玉筋体”风格的李斯之手，从而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他们每定一字，总要参照海内外诸家的考证，择善而从。《泰山刻石》在他们手中，由10字增补到53字，146字，152字，165字……完成223字之后，文化部党组委托社会科学院领导，请我国最有权权威的古文字专家共同从严鉴定通过，并有较高评价。

1980年，积40年之功的所长李文放，以她独特的精湛娴熟的秦篆艺术，首先集补重书了《泰山刻石》223字。到1989年11月，秦文研究所的专家们已将秦代7碑1874个字全部考证补齐。其中《泰山刻石》、《碣石刻石》、《芝罘刻石》、《绎石刻石》4碑已通过鉴定。

7块秦碑的艰苦考证，也就是

对中华篆文的考证。篆文或施诸实用，或衍为艺术，皆始于秦代。它是起着承上启下认识古文字的一个关键。篆文，可以说是我中华文明巍然独立于世界的载体，祖国文化珍奇壮丽宝库中一颗明亮奇贵的巨珠。中国的甲骨文、青铜器、石刻文、简牍、玺印等古篆及其铭文丰富名贵，早已为世人所知，何不汇其珍贵于一典，集数千年篆体为一书呢？

更使秦文研究所在专家们感慨的是：古埃及、巴比伦及非洲玛雅各有为之增色的古文字，但到了近代，皆因其文化中断而难以识读。

编纂《中华篆文大字典》，保护好我国的古文字，秦文研究所的专家们感到是义不容辞的。

汉字自原始陶文至楷书，字形演化，音义发展，宗衍中常有变化，欲求贯通，实非易事。好在这些研究中国古字及古典文献的学者们都有几十年的积累，加上近10年来对秦碑的征集临拓，涉猎广博，如同掌握了一把打开2000年汉字嬗变的钥匙。

洋洋大观，始于“一”字。这是首篇第一个案。就这么简单的一划，专家们就考遍了30多处出土文物的铭文。单比用甲骨文还早1000多年的陶文“一”，就有20多个。可在大字典里，人们只看到4个“一”，因为有分歧而尚无定论者概不收入。几乎每一个字都是这样，是从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字形中，汇总、挑选、修定后入典的。

一次，湖北省襄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新出了一些古文物，所长立即带队考查。他们不放过任何一次与实物对证的机会，考查遗址也忘不了到博物馆查证汉中山国文物。

# 当代 武松

## 何广位



○徐凤桐

在现实生活中，究竟能有几个赤手空拳的人敢在虎豹中逞强？

何广位，胆大、力大、饭量大，酒量惊人。一次能吃四、五斤肉，七斤馒头，还能喝好几瓶白酒。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孤胆一人，走遍全国 21 个省的山区，不用枪，不动棒，赤手空拳与虎豹搏斗，共计活捉了七只猛虎，三百余只金钱豹，一千余只野狼。现在，国内不少城市的动物园里有他活捉的大动物。正是这些难以置信的数字，促使我从北京赶到河南的孟县，验证一下我那个“难以置信”。

何广位现年 84 岁，家住孟县武桥村。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今年的 4 月 20 日在孟县的一个宾馆，当时，这里正在举行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作为全县的名人也来此为大会助兴。

终于纠正了材料中关于“铜钟”与“铜釜”相混淆，把“耳杯”误写为“耳环”等错误。

孔夫子墓碑上的篆文全部入典，“包青天”墓志篆文全部入典，还有纪念战国西门豹的碑额，岳飞庙的题款……就连至今留在莫斯科伯力博物馆内的“中俄边界铜柱铭”，由于八国联军的入侵，铜柱被盗，在

何广位身高约 1.75 米。那天他穿着一身灰色西装，精神抖擞。虽然年纪已过八旬，但身体结实硬朗，谈吐声音洪亮，看上去只有 60 多岁的样子。一头闪闪有光的银发和约 30 公分长的银须，在红黑皮肤的映衬下，显得威武飘逸，别有风采。当时他正在向一些与会的人们述说他如何与虎豹搏斗的情形，当说到要用声音激逗那些庞然大物时，他立即两眼圆睁，张口怒眉，大吼一声“噉——”这一声，其共鸣与撞击，把个约 20 平米的房间，震动得门窗作响，随之听者的心也在发颤。

### 广西遇虎，初战告捷

何广位原籍安徽省宿县，生于 1909 年，家境穷，就四处流浪，后来

湮没了一个世纪后，清代大臣、书法家吴大澂的篆文拓片，才由《中华篆文大字典》将它的每个字首次公诸于世。谁捧起这部宏篇巨著般的大字典，谁都会感到它就像那巍巍长城、滔滔黄河一般厚重实在，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上追其源，下探其流，横跨 4000 年悠悠岁月，字字交织着中华

遇到一个以卖艺为生的流浪汉，何广位每天跟着他走街串巷。那位艺人见何广位朴实醇厚，心地善良，发现他力气也比正常人大得多，刻意地教了他许多拳脚棍棒。他不光学了一些拳术，还成了师傅的好帮手。

他们流浪到广西境内时，山区里虎豹经常出没，一次，一只华南虎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师徒拿起家伙，摆出了拼搏的架势。这兽中王是绝不允许有别的生灵在它面前逞强的，它立即大吼一声，张牙舞爪地向他们扑来。

此刻，师徒俩边招架边防卫，靠着一身武艺，左闪右跳。这老虎好象还未曾遇到过扑空的现象，立即又暴跳起来，使足了劲，以更加猛烈的动作，四肢一纵，又向他们扑来。何广位感到这力量速度已非同一般，总觉得自己一身力气无处用，今天

文化的孕育与形成、发展与变革，被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的“天下古今第一奇书”“篆文之渊藪，学界之创举”。全书 20 卷，每卷 10 册，共计 3000 余万字，是《康熙字典》的六倍。（责任编辑：仲文）

该派上用场了。当那只老虎前爪快临近时，何广位先是一闪；同时看准老虎的下腹，狠狠地飞起一脚。就这一脚功夫，将那只华南虎踹出几米远。何广位见老虎倒地滚翻，勇气倍增，他觉得这些庞然大物并没什么可怕的。当这只老虎准备再次扑向他的时，何广位一个虎跃窜过去，把它压在地上。老虎哪尝试过这种滋味，四条腿挣扎着想站起来继续逞威，但何广位像泰山压顶一样，重重地压在老虎身上使它动弹不得。就这样，师傅上来捆绑老虎四肢，这只华南虎成了何广位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俘虏。

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树立起保护稀有动物的意识，捉了个活老虎怎么办，只好宰了卖虎肉、虎骨和虎皮，为他们艰难困苦的流浪生活增添了一笔钱财。不久，抗日战争的爆发，师徒俩各奔东西，何广位又成了流浪汉。

这时何广位自生擒那只拦路虎后，使他萌生了以生擒虎豹为生的念头。他掌握了一套擒虎捉豹的技

巧，找到后三拳两脚将它打倒，捆好扛起来就走。就这样，他成了名传四方的“当代武松”。

## 使酒吞食，一展豪情

何广位的饭量、酒量、力量和乐施善、勤为民的精神在有一些地方开始流传起来。有一次，他听说陕西的一个山区豹子经常进村扰民，弄得老少不宁。他爬山涉水，风尘仆仆地找了几天也没见豹子的影子。一天，他从山里回到村子，有人叫住他。

“老何，你敢和我比赛吗？”

这位叫阵的，是村里的酒星，他的酒量之大，用人们的评语说：他喝遍陕西无敌手。

“请问，你要和我比什么？”

“比喝酒，看谁喝的多。人们说你饭量大，酒量也惊人，今天咱们就比一比，谁输谁拿钱。”

“在哪比？”老何问。

“就在我家，我准备了一坛子



酒，一杯刚好盛一斤，咱们一杯一杯地喝。”

何广位见这位老弟来势汹汹，如果不答应肯定走不了，有来无往非礼也。但是他又一想，几十年来和他比酒的人不少，都败在了他的手下，这次新来此地，以酒会友，比酒次之，于是他说：“可以吧，我只要求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一人为一方，你和你朋友两人为一方，我喝一杯，你们俩人合喝一杯，如果你同意，咱们就比，如果你不同意，我也不和你比了，行不行。”

那位挑战者觉得有些被瞧不起，但不接受这一条件又试不出何广位的酒量，最后还是接受了何广位提出的条件。

何广位来到挑战者家里，一大锅肉正在冒着诱人的香气。他刚坐定，主人立即搬来一坛酒。何广位一看就知道这是30斤一坛的西凤酒。他心里想看来今天真要比一高低了。

三人落坐，能盛一斤的两个大酒杯里倒的满满的，一杯摆在何广位跟前，另一杯摆在主人和他朋友的面前。西凤酒发出的香味和锅里冒出的肉香味把比赛气氛烘托的很浓。主人先端起杯子，对着何广位一举：“请。”然后把酒杯向嘴边送去，酒杯落桌时，半斤酒没了。何广位一看也来了个二分之一杯，待另一位朋友喝了那半杯，他也将杯中酒一



饮而尽。就这样，何广位喝完一杯，那两人就共同喝完一杯。他们边吃肉，边喝酒，边聊天。他们都喝完第十三杯后，何广位发现对方已有些支持不住了，于是他把坛中剩下的四斤酒全包下来。30斤酒喝了个精光，一大锅肉也都消灭干净。此时已到后半夜。何广位17斤酒入肚，上身不晃下身不摇，起身告辞要走，主人拽住他说：

“今天我算领教了，但我不能放你走，你喝了这么多酒出去，一旦碰上豹子你会回不来的。”

何广位心里有数，他知道今天虽然喝了不少酒，一切正常，他还是坚持要走。主人一看实在留不住他，就提出：“你要是能在我这个墙头上走一趟不出事，我就放你走。”何广位一听此话，一下子就跳到墙头上，竟毫不费力的平平安安地走了个来回。下来后，向主人一鞠躬，随口说了声：“谢谢，再见。”

那位挑战者睡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酒劲也过去了。这时，他突然又想起何广位，他走后凶多吉少，放心不下。他立即奔向村外，出村没多远，他就看见何广位向他走来，肩上扛着一只捆绑着的活的大金钱豹，左手还提着一只死狼。他被这情景镇住了：“老何，你真行，你比武松厉害，我服了！我服了！”

有一次，有人想试试何广位的饭量，并要和他打赌，赌的条件是吃煮鸡蛋。八个一斤的鸡蛋何广位如果一次吃10斤，那人便付款，如果吃不了，由老何自掏腰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在众人观看下，赌注开始了。10个，20个，30个何广位剥一个吃一个，显得悠然自在。接下去是40个，50个，60个，观者看着这个打虎英雄吃起鸡蛋来就如同平常人吃小糖豆一样。大家惊讶的开始议论了。何广位继续吃着他的煮鸡蛋，仍是那个速度，不快不慢。

“整八十了。”有人惊呼。

何广位好像没听到一样，还继

续着他的机械动作。有人开始大声数起来。

“九十，九十一……九十九，一百个。”

何广位把嘴一抹，笑着说：“就到此结束吧！”

有一年，他在湖南的一个山区活动，走到一个村子里，见到有一个酒馆，他有些饿了，就走到店老板前问：

“你这里卖的什么肉？”

“酱牛肉。”

“就这么点吗？”

老板一听有些不耐烦了，“你又不拿走，难道这些还不够你吃吗？”

“我看有点少。”“这样吧，我这是9斤多酱牛肉，就算9斤吧，我给你搭白酒，你要是全吃光了，算白吃，我分文不收，要是吃不了，你必须掏双倍的钱。”

何广位听后，说：“好，就按你的办。”

何广位坐定，开始一口酒一块肉的美餐起来，没用多少时间，9斤牛肉和几瓶白酒就如同风卷残云一般扫了个一干二净。然后站起来说：“老板，我虽然胜了，但我不忍心你这小买卖一次赔这么多。”

老板被这个壮士一席话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正要继续说下去，忽听远处有人喊：“快跑哇！山坡上有一只大豹子。”何广位一听说有豹子，马上抖擞精神，他向老板说：

“我去抓豹子，等一会再来结账。”

“你不能去，这里的豹子可凶啦，又吃牲口又伤人，难道你喝醉了去送死吗？”

老何哪听得这些话，撒腿就向喊声的方向跑去。不多久，他回来了，还扛着只活的大花豹放在他的店铺前。

何广位没上过学，没有多少文化，他常对人说：“我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我也要赤条条地离开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要。”

一年冬天，他在太行山的一带活动，发现当地群众不仅常受豹子野狼的侵扰，而且生活也非常贫苦。有一个村，一家几口人只有一床破棉被，人们都身瘦如柴。他心里总不是滋味，他进山抓豹捉狼，把这些活动物送到一些城市的动物园里，把所得报酬买成食品和日用品，然后又长途跋涉返回到那个山村里，一家一份发给大家，当地的百姓正在为过年没年货犯愁，当收到这位英雄好汉送来的年货礼品时，都感动的不知如何才好。

冬天下大雪，他在路上碰见一个穿的非常单薄的老人，正在路边蹲着不停地哆嗦，他一看就知道这是天冷冻成这个样子，他二话没说，随手将自己刚做的一件新棉袄脱下来，给那个人穿上就走了。回家后家里问他的新棉袄哪里去了，他把此事一说，还引来了家里人的不少埋怨，因为那是家里人为他专门选料一针一线新做的。

## 为民除豹，万民欢呼

在山西某县的山区，有一只非常凶残体大如牛的金钱豹，每次下山，附近村里的牛、羊、猪、驴等都要被咬死一头或数头，成为这一地区的公害。豹子性情残忍，如果它到了一个牛圈或羊圈里，并不是咬死一头牛或一只羊，够它餐一顿就可以了，一般是它先咬死一头，放在一边，再观察周围有无异常动静，待它认为一切平安之后，才开始进食。如果它走进的是一个羊圈，它首先扑倒一只羊，其它羊见同类在血泊中挣扎会惊恐万分，狂叫乱窜，豹见状，就再咬死一只，还是扔在一旁，只要一有动静就继续残杀，直到把圈里的羊全部咬死，在它看来确实无异常情况后才开始大吃。

这只猛兽不仅咬伤牲口，还影响生产，当地谈豹变色，人们殷切期

望有人来除去这一公害。有一天，他们终于打听到了正在这一带活动的何广位，他们好像遇到了大救星一样，恳切希望他为民除害。

何广位来到这里之后，听完了关于这只豹的有关情况，向队长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找一只活羊作诱饵。二是他与豹子搏斗时，村里人谁也不要靠前。那位队长满口答应，并立即找来一只羊羔给何广位。何广位二话没说，一手提着羊羔，一手拿着袋子和绳子走了。

天亮以后，何广位空手而归。回到村里等了一天，还是没有豹子的动静。一天夜里，他酒足饭饱后又奔向那个区域。

他熟悉豹的规律，豹是不走重路的，如果在它周围有八条路能通行，它会走完一条，下次走第二条，等八条路全部走完后才开始重复。如果遇到下雨或下雪，它还要把这八条路全部走一遍才回巢。何广位跟踪了几条路也没有碰上，他想这只金钱豹确实不一般，行踪诡秘，是需要小心些。天蒙蒙亮之后，何广位准备回村休息。他正往回走，一抬头，在他正前方20米处，突然发现了它。这只金钱豹正在很悠然自得的坐在那里，前边的两个爪支撑着那有金钱图案的巨大身躯，两耳耸立，两眼圆睁，以唯我独尊的气势蔑视着周围的一切。何广位见此情景，立即停住脚步，他知道这时必须用激将法引逗才行。于是他把随身带的袋子放下，左手抓住羊羔，右手攥紧拳头，左腿弓，右腿蹬，挥起右拳，冲着豹子的方向大吼一声：“嗷——”这只在这一地区横冲直撞，从未遇到过麻烦的“山大王”，看见眼前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不知死活的物种，它哪能有分毫的忍让，一个虎扑，张着大嘴向何广位冲来，说时迟，那时快，20米的距离一下拉近，当豹子快要贴身时，他将左手的羊羔送将过去，豹子一见是活羊，前爪在空中死死一抓，随后用嘴咬住不

放。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何广位的右拳已经伸出，照着豹子头的左侧迅速击去。这重重地一拳，犹如千斤盖顶，立即把豹子打倒在地，随后他的两条腿迅速地往豹子的头部和身子的前半部一齐压上去，使豹子动弹不得。随即解下随身带的绳子，以极熟练的动作把豹子的四条腿捆起来，这只残暴成性的野兽，便乖乖的进了何广位的口袋。这时村里的人们特意找来一个铁笼子，何广位觉得装在笼子里大家都可以见得到它的模样，于是，把豹子抱进笼子后，刚解开捆绳，那位生产队长马上喊了一句：“老何，笼子盖有毛病。”当老何抬头听生产队长喊话时，这只金钱豹好像听明白了那句话意思似的，它大吼一声，四肢一纵，窜出了笼子，观看的人们立时吓得四处逃去，但见这只逃出牢笼欲求一生的金钱豹，跑起来的速度像飞离地面一样，何广位只好看着这只大虫四爪拍起的烟土而望尘莫及了。

这时的老何，有些懊丧，在他与数百只虎豹搏斗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的现象。他知道，经过这场搏斗之后，那只狡猾的豹子不会再轻易出山了，他必须静下心来耐心等待。

几天之后，天下起了小雨，何广位出村散心，不知怎么的，他竟神差鬼使的向山里走去。他慢慢地走在山涧小路上，这时雨已停了，山路显得更加滑陡，不一会他来到一个很陡的小路，他想绕着走，刚走了十几步，只听一声吼，一阵冷风从后边向他扑来，待他反应过来时，那只豹子的大嘴已将他的半个头咬在嘴里，他不顾巨烈的疼痛，举起铁拳向豹头猛击，一拳将豹子打出好几米远。那只豹稍定神后，又一个虎跃向他扑来。这时他已意识到，今天不是我无它，就是有它无我。他顾不得要抓活的了，在豹子跃起向他扑来时，他使足了力气，举起了拳头，向豹子的胸口重重一击，只听那只豹惨叫

了一声就应声倒下了。何广位立即用双腿压上去，准备来人把它捆起来，等了一会没人来，再看那只凶残的豹子，早已双眼紧闭停止呼吸了。

## 天意撮合 孟州 归根

何广位现在住的河南省孟县，古时称孟州。而这个孟州，正是我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曾在景阳岗醉打猛虎的武松，因杀了西门庆等而被发配坐牢的地方。何广位现在住的武桥村，它的全名叫“武松桥村”，因为在村的东边，原有一座桥，名“武松桥”，在离武松桥不远的地方，就是《水浒传》中那位女流——母夜叉孙二娘开黑店卖人肉包子的旧址。传说武松戴刑路过此处时，曾在此桥休息后才去孙二娘的酒店吃酒，然后才又演出了假醉酒，与菜园子张青相识，快活林醉打蒋门神等一幕幕精彩的片断。何广位自1909年在安徽省宿县来到这个地球上之后，过了几十年的流浪生活，他的双足踏遍了20几个省和印度的土地，行程数万里，连他自己作梦也未曾想到，1973年，在他65岁时，竟然落户到孟县武桥村。

七十年代初，何广位从大别山一带，带着家人流浪到山西省的太行山一带。当他们在一个小村子里安顿下来之后，何广位便开始进山寻找那些“山大王”了。他随身带着绳子和布袋，还必须带着一个葫芦，里面装上白酒。一连几天，十几天或更长的时间，他都是空手而归，好像那些不可一世的大虫事先得到消息一样，为防范这位不速之客而隐居起来。

这一带有一个采石场，每天都有不少人在此采石头。他们用铁钎、铁锤把一块块大石头凿成石料，然后再运到河南等地出售。

在这些采石料的人中，有一个孟县武桥村的村干部，叫阎泉先。何

广位进山出山，经常路过这个采石场。阎泉先自第一次见到这位银发白须的老者后，一股亲近感的心绪不由自主的从内心生发出来。一天收工后，他和同事们正在吃饭。这些采石人的饭菜虽然不算丰富，但量足，而且还有白酒，以此来补充因过量劳动而消耗的热量。他们边吃边喝边聊天，话题从当天的劳动和其它新闻转到了何广位身上。

“这个老头真有点怪，一个人不分昼夜的到山里转，也不怕碰上豹子野狼。”

“他好像就是进山捉什么的，捉小动物还可以，要是碰上大家伙他的命就交待了。”

你一句、我一句，大家正高兴地聊着，有人突然大声说：

“你们快看，老头过来了！”

大家顺着喊话人的手势望去，只见何广位扛着一只活的大金钱豹从山坡上下来。人们不约而同的放下手中的碗筷，站起来冲着何广位走去。老何见到有許多人走过来，顺手将扛在肩上的豹放下来。人们都抢着和他说话。问他在哪抓的，怎么抓的，害怕不害怕等。最后都是用“真了不起”一句结束。大家热情地留老何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从此，何广位与孟县武桥村的采石人交上了朋友。从那以后，老何从此路过，只要赶上他们吃饭，这些孟州人，总是把何广位留住一起吃饭喝酒。

孟县地处河南省中部，我国历史上的“八百诸侯会孟州”就发生在这里。由于它处在中原天地的心脏部位，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上，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这里的人民，由于深受河洛文化的长期熏陶，性格豪爽，纯朴善良。他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对于假丑恶的鄙视和厌恶，从来不加任何修饰和造作，尤其是对于英雄人物的崇敬和热爱，更在一般之上。他们的生活虽然还不算富裕，但情操高尚，他们的科学知识虽然还

不丰富，但充满对华夏文化的自豪。

阎泉先，这位崇敬英雄的村干部，想到老何在外已流浪了几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的减弱，再加上还有妻子儿子，他们流浪到何时才算一站呢。他应该有所归宿了。

一天，老何又从采石场路过，准备回他的临时住处，阎泉先上前拦住他说：“老何，今天咱们喝个痛快。”

阎泉先拿出了白酒和简单的酒菜，老何也把酒葫芦摘下来，两人开始对饮起来。

“老何，今天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对哪件事感兴趣就问吧！”

“你打算流浪到何时才算一站呢？”

老何深深地饮了一口酒后慢条斯理地说：“就这事呀！我走过的一些地方也有不少人问起过，我总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了一处说一处。”他一边说着一边开心的一笑。

“你今年都六十多了，虽然还是个壮汉，但总是要老的呀，总得有个归宿才是呀！”阎泉先以关心的口气劝说着。

“我也不是没想过，但想来想去也没看准一个地方。我饭量大、爱吃肉、能喝酒，又不识字，没什么本事。生活不富裕的地方留不住我，生活富的地方又不太欢迎我，所以我一直流浪。”他喝了一大口酒后又说：“这事我也不想它了，最后看老天爷怎么安排吧！”

“老何，你们就在孟县落户好不好？”阎泉先终于把压在心里的话吐出来。

“我现在还没想落户，以后再说吧！”

这次谈话，虽然没有结果，但两人心里谁都有数。

阎泉先为了下次谈话有所进展，他和同事们商量，准备提出一个将本村的一位姑娘，介绍给他儿子作对象为条件，从他的家庭里打开缺口。此招果然有效。老何回去给老

伴一说，老伴马上来神了。她一是盼儿媳心切，二是怕老何常年在外出现闪失。她和儿子组成了同盟军，一齐向何广位进攻。这个在虎豹群中无畏无惧的好汉，在一种儿女情长的感召下，他那铁石心肠也开始软化了。

老何面对要改变生活环境的新问题开始认真地思虑起来。他想的很多，回忆起他与千百只虎、豹、狼打交道的场景，都象演电影一样在他的脑子里一幕幕闪过。这些酸甜苦辣都有的场景，究竟哪一味占的分量更大，他一时也难以摆平，但有些对他感触最深的事情都总是牵动着他的心。

他想起那只大豹子用大嘴咬住了他脑的右半部，鲜红的血不住的从头上流下来。当他扛着那只被他两拳打死的大虫往山下走时，满头的血迹把五官全模糊了。剧烈地疼痛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一挺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伤口被感染而化脓那就麻烦了。但是在这山沟里到哪里去医治呢？他这时想起师傅曾告诉他的一个偏方，有了伤口用人尿洗干净是很好的消毒方法，特别是用男性青年的尿效果更好。可是在这山沟里到那去找小伙子来呢？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正在为此事犯愁时，只见对面走来两个打柴的。老何就像见了救星一样，拦住了这两个人，请求说：“请二位老弟站下，行个好，帮个忙。”

那两个打柴人一看，眼前几乎是一个血人站在前边挡住路，在不远处还放着一只打死的豹子。就这副模样差点把他两吓昏了。

“你、你……你要干什么？”

“我刚才不小心被豹子咬伤了，想请你们二位撒泡尿，给我洗伤口。”

那两人一听就觉得有些蹊跷，那有用尿洗头的，这不是开玩笑吗？

“请你们二位帮个忙吧，如果时间一长我的伤口会化脓的。”老何一

边恳求着，一边弯下腰把头低下去，准备着迎接那“圣水”。但是，那两个人仍是呆若木鸡似的站在那里不动。

老何低下头待了一会，仍未感到有“热尿”冲来，他有些不耐烦了，于是大声一喊：

“快点儿尿哇！”

就这一声，在山间引起的共鸣有如雷贯耳之势。那两人一看此人有些不好惹，于是，站在靠前的一个先把裤子解开，使了使劲，一股热尿直奔老何的头部洒去，老何像淋浴一样，一边用两只手来回洗脸和头，嘴里还不停地道：“好，好。”第一个尿完了之后老何又是一嗓子：

“下一个！”

第二个人也照着第一个人的工作程序，完成了规定的动作。

说起来也真够神的，老何被那两只大虫咬伤的血淋淋的头，经这两个人的“圣水”的洗礼，很快就神奇般的好了，不仅伤口愈合的很快，竟然连太明显的伤疤都没留下来。老何现在又想起这些事，心底升起一片感激之情。这时，他对孟州的那位酒友劝自己安家的一片热心，有了更深的理解。于是，他正式告诉阎泉先，同意到武桥村安家落户。从此，何广位一家也从此结束了几十年的流浪生涯。

1982年，在何广位落户武桥村的第四年，在农村改革大潮的推动下，武桥村的人也从种地、采石等简单的行业，开始向多种经济成分发展，他们首先是办酒厂。因为造酒对武桥村来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水浒传》中孙二娘卖的酒，就是一个名叫孙二的人在本村的一个酒厂酿造的，当年武松在桥头休息的传说也发生在这里。二是何广位这位当代武松的在此归根落户，又为办酒厂增添了新活力。三是本村的水源从古以来，就以甘甜质清闻名。酒厂很快就办起来了，并为产品起了一个很响亮的句子——“醉武

松。”这个酒厂的产品一打入市场，就以它神奇的传说和典型的绵甜醇的大曲特色受到饮酒者的青睐，没过几年，不仅产量翻番，成为全县上交利税的大户，而且，在1991年由农业部组织的全国酒类评比中，一举夺得榜首，成为国内有相当名气的白酒。而何广位这位武桥村的新村民，也成了这个村的一笔无法用数字表示的财富。

据了解，何广位一家刚到武桥村落户后，曾答应和何广位儿子结为百年之好的姑娘，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不干了。何广位一听到这消息，就像受了惊一样，立即表示要离开武桥村。但是，好像上帝早已为他安排好了归宿一样，突然有第二位姑娘主动补上去，愿意成为他的儿媳。老何确实有些被感动了，这才又重新在武桥村安定下来。

## 外人来朝，国人感慨

何广位的事迹越出了国界，不少的外国人，像“朝圣”似的，从遥远的地方或乘飞机，或坐轮船，风尘仆仆地赶到孟县，要亲眼看看这位被誉为“当代武松”的“武圣”。

1986年，日本东京的一家电视台，通过他们先进的信息网络，从庞杂的信息库中发现了何广位。他们核对证实后，像获得了一份极重要的战略情报一样，这些以新、奇、快、准为工作标准的日本人，立即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专程来中国进行采访。当这一消息通过正常的渠道传到何广位耳朵后，这位年近八旬的老英雄，并没被这一消息所激动，而那一幕不堪回首的往事又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出来。

那是1943年，当时他已30多岁，已经成家，并有了两个孩子，他们一家四口，当时正在广西省的一个山区流浪。

一天，何广位将打死的一只老

虎在一个县城摆摊出售。这时，在街上突然出现了四个日本兵。当这些日本兵走到何广位的摊前，发现了虎肉、虎皮后立即停住了脚步，并动手抚摸，嘴里还不停的说些什么。何广位对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日本侵略军非常反感，一时也摸不清他们想要干什么。一个日本兵突然瞪着眼对何广位说了几句日本话，其它的日本人就动手拿虎皮、虎肉。何广位马上按住东西，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我的这些东西是卖的，你们要买可以，拿钱来。”

那些干惯了烧、杀、抢的日本兵，哪能容忍何广位如此大胆，其中的一个日本兵，立即端起抢打开刺刀，并对准了何广位的胸口，嘴里喊着“八格牙路……！”何广位一见此景，一股怒不可遏地火气立即冒出来，他牙一咬，眼一瞪，当明晃晃的刺刀快要扎到他的胸口时，他一闪身躲开了刀尖，同时用一只手抓住了刀柄，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另一只手已用力攥紧，像他往常对付虎豹一样，对着那个日本兵的脑袋迅速击去，只这一拳，就把那个不可一世的日本兵打到六、七米之外的地上动弹不得。其它三个日本兵一看，立即一齐向何广位冲来，结果也被何广位的一顿拳脚给收拾了。何广位想，他们肯定会来算账的，于是，他扔下东西，也来不及和家人告别就急忙逃走了。在路上他才发现自己的大腿上也受了伤。他从广西一直逃到贵州。后来，他的患难妻子，来贵州和他相见。妻子告诉何广位，他逃走后，日本兵不知从哪里知道了他们的住处，立即来进行报复，妻子虽然虎口余生，但那两个可怜的孩子，却成了那些日本兵的刀下鬼。

物换星移，经过40多年后的今天，国家强盛了，时代不同了，广位也从一个旧社会的流浪人成为河南省的政协委员了。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老何又要和日本人打交道，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心潮一阵一阵地



快速跳动。他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心态，是感慨，是叹息，还是兴奋。但他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次日本人来找他何广位，朝见也好，采访也罢，是民族的感染力、是国家吸引力，而我何广位，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而已。

专程来采访何广位的这家电视台，为了搞好这次活动，从人员、奖金、机器设备和送给何广位的礼物，都做了认真准备，他们入境后，很快赶到河南的洛阳，后来又乘车赶到孟县武桥村何广位的家乡。

何广位是属于力量型的英雄。日本民族一向有尚武的传统，尤其是对力量型的英雄，普遍抱有一种十分敬仰的心情。日本每年举办六次全国性的相扑比赛，就是崇拜大力士的象征。从东京来的这些日本人，在他们心目中的何广位，是一位比相扑运动员更值得敬仰的偶像，当他们见到何广位后，一个个都是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不动，用一种难以说出来的神奇眼光来打量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向何广位提出了不少问题，并全神贯注的聆听着翻译的传话。拍摄的、记录的、一个个

忙个不停。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有一位先生几乎是一直面对何广位跪着采访。这些东洋人在何广位面前，就好象伊斯兰教徒从遥远的地方不辞辛苦地赶到圣城麦加朝圣一样，那分儿虔诚劲令国人感动。

当这些日本人问到何广位现在的身体如何，是不是仍然有力气时，何广位立即明白了他们的心思，他们是想当场试一试他的力气，以此来证明他们听到的那些故事并非只是传说而已。何广位说：“现在我是快八十岁的人了，力气当然不如年轻的时候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并向一块大水泥板走去。当他走到那块水泥板时，稍停了一下。身子一转，他用两只手臂一抓，一块约800斤的水泥板就贴在了他的后背上，再一运气，说声“起”，扛起来就往前走。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住了，都身不由主的热烈鼓掌为他叫好。

采访结束时，日本客人把专门从日本带来的电视机等礼物赠送给何广位，并从皮包里掏出十万元人民币送给这位老英雄。而我们民族的这位大力士，由华夏文化道德滋

养的英雄，他的那种不为己，不图名，乐施善的情怀，在这些异族人面前又一次显露出来，他用宏厚的声音郑重地说：

“谢谢你们远道而来，谢谢你们的一片好心，我不爱财。”

这些日本客人可能还不了解40多年前，何广位在广西与他们同族的那四个成员所发生的那场遭遇，只是怀着一种对何广位既十分崇敬而又一时难以理解的繁杂心情，结束了这次远程采访。

我最后一次见到何广位，是在武桥酒厂的大门口。我和他握手告别，我的视线又都集中到了他的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上，脑子里也同时迸发出他常说的那两句话：

“我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我也要赤条条的离开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要。”

我一边凝视着他，又突然想《水浒传》中描写的武松。

（责任编辑：刘家驹）

（徐凤桐：山东德州人，54岁，颐和园园长助理、著有《颐和园趣事》等。）

## 《炎黄春秋》七月号

### 要目

△北戴河：毛泽东急召叶飞上将密谈

△首次披露：蒋介石抹去的婚恋日记

△许世友为何在延安被逮捕审判？

△保卫南京，唐生智蒙冤

△一桩历史谜案

——潘汉年会见汪精卫

△湘鄂西肃反

——柳直荀等人魂冲霄九

△贺龙与孙中山

△是谁设计的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

△一个女人的乡村都市梦

△谁是最可恨的人？

△大陆“人蛇”出洞秘录

△活跃在上海滩的地下涉外婚姻介绍

所

# 世界屋脊

# 有一群军人

● 姜孝鹏

亿万年前,地壳裂变隆起特提斯古海的海底,在地球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凸部,这就是位于北纬 26 度至 40 度、东经 70 度至 140 度的面积达 250 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

啊,旷古而荒凉的青藏高原!

它高寒缺氧,寥无人烟;地理学家称这里为“地球第三极”,生物学家称这里为“生命禁区”;藏学家称这里为“魔域”、“死城”。1930 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他著的《亚洲腹地探险记》里,曾形容这里景况是:“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

## 闯进“魔域”、“死城”和“生命禁区”

然而,38 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12 万名官兵,牵着 4000 里青藏公路穿过浩瀚的柴达木盆地,翻过莽莽昆仑山,跨越长江源头沱沱河,跃上接天摸云的唐古拉,直到西藏首府拉萨。这条被各族人民称为“天路”和“世界屋脊上的苏伊士运河”的青藏公路,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带来了繁荣,给西南边防带来

了安全,带来了永固,连起了祖国西南的半壁河山,连起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友谊。

为了完成共和国赋予的使命,



多少人忠骨埋雪山，英灵驻高原；多少人在这里献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演出了一幕幕千古流芳的活剧；是他们改写了这里的历史，向世界展现了一个面貌全新的青藏高原。

为此，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1990年7月7日签署命令，授予总后勤部青藏兵站部以“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的荣誉称号。

为了寻觅青藏高原变化的轨迹，我又一次来到了昆仑山下的新城格尔木。

35年前我作为一名高原汽车兵，全排开着东德产的15台大依发车，从西宁到格尔木，796公里整整跑了5天。曾记得，当车刚一停稳，我就高兴地跳了下去，只听“扑”一声，沙子一下埋到了脚弯。放眼望去，偌大的荒滩上，到处支着一顶顶军用帐篷，这就是我们的军营。

当天晚上，我们喝了一顿沙子与米粒同在的稀饭，啃了几个像黄泥巴一亲的馒头，疲乏地躺进了帐

篷。高原气候给我们这些初来者来了个下马威：大风卷着黄沙挤进帐篷，一把把地扬到我们的头上、脸上、被子上，不一会便是厚厚的一层。尽管我们困得要死，但不得不经常爬起来，抠掉钻进耳窟、鼻孔及嘴巴里的沙子。有的人用手抠不干净，就拿来擦拭机器的小毛刷打扫起来。天快亮时，我刚迷迷糊糊入睡，忽听“呼喇喇”一声怪响，睁眼一看，天哪，帐篷已被大风连根拔起，向天空飞去。只听班长大喊：“快，快拽住它，拽住它！”

我们十个小伙子像打秋千似的，使劲拽着帐篷不放，大风鼓着劲把我们带出三十多米，才“腾”一声摔在了地下……

我打开招待所的丝绒窗帘，向外望去，就在我们支帐篷的那片沙滩上，已盖起了一幢幢式样新颖的大楼。楼下是一个个长满各种花卉的花坛，还有一片片绿茵似的草坪。

王根成大校，青藏兵站部部长，他刚从拉萨回到格尔木便匆匆来看

我。我们是同年同地同一个车皮拉到部队的战友，当年也同在一个汽车团当驾驶员。我们这批来自关中平原、渭河岸边的480名同乡战友，一直在青藏高原的只他一个了。青藏线每一步变化他都经历过。我们一同回忆起初到格尔木时的情景：那时，在格尔木市有限的建筑物的墙壁上，用磨盘大的字写着一句句激动人心的口号：“大干十五年，共产主义早实现！”那时，我们面对这醒目的大标语想：哎哟，15年，那得等多长时间！

可是，一年一年过去，墙上的标语被风雨冲刷得无影无踪，荒凉的格尔木却面貌依旧。

“格尔木发生大的变化，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根成说，“现在格尔木称为小上海了。战士们从昆仑山，从唐古拉跑几百里、上千里逛一趟格尔木，那简直是天大的享受了。如今的格尔木已变成青海第二大城市了。北京、上海有的东西，这里几乎都有，什么歌舞厅、粤菜馆、鲁菜馆、川菜馆，比比皆是。你要是到市中心昆仑路的集贸市场去一下，全国各地的东西都可以买到。东海的水产品，南方的水果，新疆的哈密瓜，敦煌的甜葡萄，安西的黄河蜜都三四毛钱一斤，置身此地，你也许会忘了这是在戈壁滩上……”王根成讲到这里，总结似地一挥手表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公路，有了铁路！”

我们在绿树掩映的院子里边走边聊，自然提起了慕生忠将军。这位青藏公路之父，格尔木的几代人，4000里青藏线上的男男女女，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

慕生忠，这位1930年就跟着刘志丹闹革命的陕北老红军，解放战争期间曾担任第一野战军的民运部长。1951年，慕生忠调任天(水)兰(州)铁路副总指挥，没过三个月，又任命他为西北进藏部队政治委员，司令员是他的同事、原一野的联络





△慕生忠将军于1954年青藏线正式通车时留影

部长范明。他们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8月上旬率领千军万马踏勘进藏的道路。

这是一支奇特的部队——牲口比人多。全队计有马三千，骡子三千，骆驼三千，牦牛一万。要知道他们所经过的几千里路，是一个无人烟、无后方、无供应的荒漠之地，一应物品全靠自带。

这次进藏，他们走的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时的唐蕃古道，途中由于罡风瘴气、急流雪崩的袭扰，人马遭受严重创伤。当他们经过113天的跋涉到达拉萨时，减员过半，牲口死掉三分之二。

早在西北部队进藏之前，西南以张国华、谭冠三将军为首的十八军等进藏部队，于1950年4月就开始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战斗。但由于康藏地形复杂，修路进展速度受限，一时难以通车。供应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当时一斤盐要八个银元，作为主要燃料的牛粪一个银元才能买八斤；面粉从内地辗转运来后，一斤面等于一斤银子的价格。昂贵的物价，匮乏的物资，使三万多进藏人员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四两粮食。饥饿、浮肿等严重威胁着驻藏人

员。为此，1953年春，中央责成西北局组成了西藏运输大队，担任西藏工委组织部长

的慕生忠又被任命为运输大队政委。他们征集了28000峰骆驼，在陕甘宁青各地雇请了部分民工，往西藏紧急运送粮食和给养物资。谁知一趟运输任务下来，骆驼损失了十分之八九！慕生忠再也不忍心这样下去了，他下决心要在青藏高原修一条路。1954年春节一过，慕生忠就上北京找到国家交通部，提出了修路的要求。

接待他的一位负责人很为他的积极性所感动，但却不同意修路。他说，一条康藏路已投进去多少个亿，目前还八字没见一撇。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未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怕也排不上。慕生忠和他吵了一顿，也没有结果。没办法，只好去找老首长彭德怀。曾任一野司令员的彭老总1950年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率军赴朝作战。现在朝鲜已停战，他卸任回国，暂住北京。

听了慕生忠的汇报，彭老总走到地图前，察看着青藏高原的地形图，然后手一挥说：“从长远看非有一条大动脉不可！好，你写个报告吧，我负责去向周总理汇报。”

周总理很快批准了他们的报告，并拨给三十万元经费。天哪！这点钱，按最低标准也只能修五公里

斗别弘  
的能揚  
革耐特  
命耐特  
精特能  
神能吃  
戰苦特

江澤民  
一九九〇年七月  
十六日于青島  
兵站部

△1990年7月18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格尔木为青藏兵站部题辞

格尔木是蒙古语，意思是河流交汇的地方。1953年6月上旬，慕生忠派16人，牵着十几峰骆驼，带着6顶帐篷，从香日德出发西行，几天后走到昆仑山下的一片开阔地上。他们看到这里有小草生出，有几条溪流汇集，便在一条河边支起帐篷，安下了家——这便是格尔木最



△刨冰化水  
公路沿线已建起8个地面接收站▷  
◁在世界屋脊上筑路



△唐古拉兵站

路！但慕生忠满足了。彭老总又批给他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0辆大卡车。

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手一挥，青藏公路在大本营格尔木正式破土动工。1220人，编成6个工程队，没有一台机器，没有一个工程师，每人一锹一镐，向高原开了战。



△昆仑山营区



△汽车兵在唐古拉山上学传统

早的住房和第一代人。有人问慕生忠：“你怎么知道这里就是格尔木？”慕生忠回答：“我说它是它就是。青藏线上的许多地名都要靠我们给起呢！”的确，在修筑青藏公路的过程中，慕生忠给沿线18个地方起了名字，其中“开心岭”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呢！

## 第一代人的第一难点、第一桥和第一车

慕生忠修青藏公路遇到的第一个工程难点是位于格尔木以南70公里处的“天涯桥”。这里是达布增河和疏嘎果勒河汇合的出口处，河并不宽，只有9米左右，但却深不可测。当时整修队器材奇缺，除了从兰州运来的9根9米长的松木和20几根短木外，连一个螺钉、夹板都没有，水泥、石灰等更谈不上。9米宽的河面，9米长的木头，桥该怎么搭？慕生忠把行李搬到河边，日夜和大家一起想着办法。他给刚从兰州赶来的工程师邓郁清下了死命令：必须三天完成搭桥任务。邓工召集

工兵组的王鸿恩、杜光辉等同志开诸葛亮会，有人提出：河沟上宽下窄，可在河岸潜水的石坡上打上白窝，白窝里并排栽上木桩，木桩上架起横梁，横梁上再摆上9根原木，这桥也许就成了。这个办法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炸石、凿眼、栽桩、架梁，河边摆起了木匠摊，架起了铁匠炉。邓工和工兵组的同志三天三夜没合眼，终于架起了青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桥。邓工诚恳谨慎，不知这桥能否经得住车压。慕生忠一挥手：“试车！”

第一辆平安过来了，第二辆车也过来了，第三辆、第四辆……所有的车全都顺利过桥。慕生忠当即命名这座桥为“天涯桥”。第二年，陈毅副总理去西藏路过此地时，感到“天涯”二字欠确，不如叫“昆仑桥”好，于是，人们又称它为“昆仑桥”了。

公路延伸过昆仑山后，施工队的伙食供应发生了极大困难，不要说蔬菜，作为主食的面粉也几乎断了顿。同志们每天干十二三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却没有粮食进肚子。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不少人把作为

马料的黑豆拿来充饥，有限的黑豆吃完了，就捉地老鼠烧来吃。地老鼠又大又肥，常在人跟前跑来跑去，一下脚就可踩到一只。

公路修到了长江源头沱沱河，这里的河床宽达千米，水面也有200多米宽，深两米左右，比起“天涯桥”来，其难度更大。路怎么修？不少人在岸边望河兴叹。慕生忠“扑腾”一声跳进水里，走了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爬上岸来，向大家宣布了他的打算：修一条水下桥。材料就是河滩和附近山坡上的石头。

他派人去河的上游进行开渠分流，以减少主河道的水量。等河水降至一米左右时，两岸分头沿着一条线、一个宽度向水里填石头，大石头单个填，小石头装在麻袋里填。经过几个工程队十几天的会战，一条长240米、宽五米、离水面三四十厘米的徒涉场建成了。

公路通过沱沱河，爬上了冰封雪锁的唐古拉。这里海拔5300多米，是整个青藏公路的最高点，山上积雪终年不化，空气异常稀薄，气温在零下40度左右。在这里站着不

动,等于在上海负重 25 公斤在劳动。筑路民工一个个头疼欲裂,胸闷如堵,晚上连憋带冻无法入睡,有的干脆就到工地上去劳动。四个多月前发的新锹,已磨成了月牙铲,二尺多长的十字镐,也磨成了秃头。大家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大战唐古拉 40 天,终于修成了这段世界上最高的公路。这时是 1954 年 10 月中旬。

就这样,慕生忠带领他的千军万马,经过七个多月的苦战,把这条 2280 公里的青藏公路,牵到了拉萨河谷,牵到了布达拉宫下。1954 年 12 月 15 日,慕生忠成了第一个坐着汽车进拉萨的人。12 月 25 日,拉萨举行了康藏、青藏两条公路全线通车的盛大典礼,毛泽东主席题写的锦旗上两行大字分外耀眼:“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慕生忠以 30 万元、1200 多人、7 个多月时间,修成了这条横跨世界屋脊的青藏公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五十年代末,我们汽车团驻在格尔木。一条喜人的消息在我们中间传开:格尔木要修铁路了!青藏铁路的总指挥还是慕生忠。

不久,在我们住地北边的沙滩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帐篷城,住进了一个铁道兵师。我们都很兴奋,铁路一通,可大大减轻汽车兵的担子啊!

那时,慕生忠虽然担任着不少职务,他最看重的还是设在格尔木的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这个职位,他要继续为祖国修路管路。

但不久,我们发现情况有变:驻在格尔木的铁道兵撤走了,格尔木街头上,人们再也看不到慕生忠将军的影子了——原来在党中央 1959 年 8 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据实直言而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而慕生忠作为彭德怀的“亲信”,也被有关方面圈起来反省。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几个铁道师云集青藏高原,青藏铁路工程进展才大大加快。

## 108 将汗洒、血染、魂留昆仑路

在青藏高原修铁路,环境艰苦,地质复杂,给铁道兵官兵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那可真是一场拼死的战斗啊!”不少已脱掉军装的老铁道兵这么说。

用当时的一句话讲,叫“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大家都有一种使命感,就是用身子铺,也要把铁路铺到昆仑山下!

在这条全长 834 公里的铁道线上,有一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关角隧道。这条长 4910 米的隧道,轨面海拔 3700 多米,相当于两个半泰山的高度。这里的地形构造极为复杂,有 11 个断层带;地下水不断上冒,一昼夜最多时可涌出一万多吨。这对施工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铁道兵某师钢八连的同志们,在科研部门的帮助下,严密组织,科学施工,战士们成天泡在泥里水里,冒着洞内缺氧、塌方的危险,昼夜三班倒。经过 5 年 1800 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洞穿了这座恶山,写下了铁道建筑史上的新的一页。

由柴达木的中部转而向南,便踏上了茫茫的万丈盐桥。这里又名察尔汗盐湖,面积达 5800 多平方公里,据说地下的盐层深达 30 多米,可供全世界的人食用两千多年。你随便在路边用手刨一下,就可见到白花花的盐粒。

在这百里盐碱滩上,他们用盐块砌墙,搭起了一间间小屋,摆开了战场。指战员成天泡在盐卤里整修路基,挥锹垫石,皮肤被盐水浸得蜂蜇似的疼痒,不少人的腿脚和手臂发生红肿、溃烂,浑身难受得像火烧。衣服被盐水浸得白花花的,硬邦邦,像身铠甲。住在盐块砌的小屋

里,被褥很快发霉、腐烂,鞋袜上长出了白毛。带咸味的空气烧得鼻孔干疼似火。收工后想洗个澡,没有水。这里用的水,靠汽车从 60 多公里外的格尔木运来,洗漱用水每天只能分到一点点。战士们常是上班一身盐,下班盐一身。

忍耐,再忍耐,忍耐是一种力量。就这样,英雄的铁道兵硬是在万丈盐桥上架起了“铁桥”,把铁轨铺到了昆仑山下。

自从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后,由于川藏线经常发生塌方,交通不畅,所以青藏线在西藏建设和巩固西南边防方面肩负的担子更重了。它那粗糙、简陋的路面已不堪承受千车万车的碾轧。因此,国家决定从 1974 年起,投资 7 亿元巨款,对青藏公路进行全面改建整治,使之由沙石路面变成柏油路面,以提高它的使用效益。

基建工程兵某部(现已改为武警交警第一总队)奉命担负了由格尔木至唐古拉下的千里整治任务。这一段路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环境艰苦,工程量大,投资要占全部 7 亿元中的 4 亿元,是一段难啃的硬骨头。

工程兵指战员踏着当年慕生忠的脚印,进驻雪水河畔,进驻昆仑山上,进驻长江源头,进驻唐古拉山下,支起简陋的小帐篷,架起熬沥青的大铁锅,挥镐舞锹,展开大战。

为了赶进度,每人每天要完成拉运土石方三至四立方米的定额。这里高山缺氧,一锹一镐都要付出比内地多几倍的艰辛。由于这里气压低,水烧不开,饭做不熟,再加上没青菜吃,不少人得了夜盲症、浮肿病、风湿性关节炎病和高原心脏病。

18 岁的战士张广合正挥镐挖土,因缺氧突发心肌梗塞,一头栽倒再也没有起来。

开山炸石的炸药即将爆响,一个新入伍的回族战士正在埋头装车,全然不知。老战士张朝江飞跑过

去，一把把他按倒在车下。“轰隆”一声巨响。新战士安然无恙，张朝江却被飞石击中而血染黄沙。

营长张焕民，昨天还带领战士步行六七十里寻找合适的采石场，今天突感身体不爽，送进医院后他还说：“我要快出院上工地！”说完这话的第二天，他就永远闭上了那疲劳的眼睛。

就在当年慕生忠铺设水下桥的沱沱河上，副团长兼总工程师段耀焕，领着两个施工连队，经过两个冬春700多个日日夜夜的苦战，在原有的大桥旁边，又建起了一座雄伟、坚固的现代化公路大桥。他们在桥头刻写下“长江源头第一桥”七个大字。桥建起来了，但不少人的身体却垮下去了；路向前延伸着，但有的人却再也站不起来了。

据统计，这支部队在12年的整治青藏公路的过程中，有108名指战员长眠雪山高原，恰是梁山泊全部头领的数目。有420多名重伤或致残。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着新的路基，用自己的汗和血浇铸着黑色的路面。

## 一代接一代吃苦和一代比一代享福的“叫花子兵”

改建整治后的青藏公路，犹如一条黑色的缎带，由西宁一直飘到了拉萨，达到了国家二级公路的水准。公路的长度也由过去的2100多公里缩短到1900多公里；车辆时速可达80公里。据测算，仅此一项，每年即可节约运费6000万元左右。由格尔木到拉萨的行车时间由以前的10天、7天缩短到现在的3天、2天。

目前，青藏公路上的昼夜通车量达1500台次，80%以上的进出藏运输任务由它担负。它成为祖国内地连接大西南的一条主要交通大动脉。

有人说这里的高楼大厦、水电

光热都是车轮拉来的，这话有道理。

青藏兵站部所属的几个汽车团我都去看过，一个个营房整洁统一，环境优美漂亮；开的车是一律的“五十铃”和“罗曼”，动力大，抛锚少。罗曼车驾驶室有两排座，后一排是上下两层铺，可供睡眠休息。驾驶室还有一个收放自如的活动小桌，可供学习吃饭用。这一切，令我这个老汽车兵羡慕不已。

回想起来，这已是青藏高原汽车兵的第四代车了。第一代车是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手里接收的破烂货，吉普、吉斯、吉姆西等；第二代车是东德、捷克造的大依发、斯格达等；第三代车是国产的解放牌、黄河牌等。目前，这第四代车不光车况好、路况更好，车况也不差。触景生情，我和王根成不由想起我们跑车时的情景来。

那时，我们开的是载重六吨半的大依发车，这种车又笨又重，力气小一点的驾驶员连方向盘都搬不动，再加上车况差，缺少必须的零配件，所以车辆抛锚频繁。当驾驶员的，成天泥里滚，油里爬，还侍候不好它。别的不说，光是每天早晨的发动就让人够受的。我们得提前一个小时爬起来，摸黑在每台车下点起三堆火，一堆在差速器下，一堆在变速箱下，一堆在发动机下，以便把机器里冻成硬块的黑油、机油烤化，才好发动。另外，还要燃起一堆大火，把各车上两个盛满水的五加伦桶放在火周围，烧热后加进汽车水箱里，再用手摇柄慢慢摇动机器，以便给它带去点温热，否则，就很难启动。那时由于车上的蓄电池损坏严重，又配不上新的，大部分的汽车上无蓄电池，启动车全靠人用手摇柄摇。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为启动一台车常摇得人头昏眼花，喘不过气来。不少连队采取这样的办法：集中几个人突击摇着一台车，然后一拖一，二拖四，四拖八，全连车子要全部启动往往要两三个小时。还没上

路，就搞得浑身油泥，精疲力尽。经常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拂晓五点半就响，夜半三更才宿营。

汽车上缺少蓄电池，晚上行车照明可就抓瞎了。记得在执行平叛战斗运输任务中，需要昼夜兼程，我们只好提前准备两个铁罐头盒，分左右挂在汽车保险杠上。到了晚上给里面添上柴油，从棉衣里撕些棉花，搓成灯捻，放在罐头盒里，用打火机点着，呼呼地向前开去。跑七八公里后停下来加一次油。由于光亮照不远，为了安全起见，副驾驶员须把头伸出窗外，迎着寒风用双眼使劲瞅着，不断给驾驶员报着信号：“注意，前面有个坑！”“小心，前边有个急转弯，向左打方向！”……弄得两个人都很紧张。我是深深尝过这个苦头的。

当时对高原汽车兵的形象，有四句顺口溜：“穿的大衣没面子，穿的棉衣没套子，穿的单衣没袖子，腰里勒根破绳子”。皮大衣没面子是因为爬上爬下磨光了；棉衣里的棉套被撕下来点火或点灯用了；单衣袖子被撕掉作擦车布了，腰里勒绳子是因为衣服上的扣子掉光了。记得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冬末，总后政治部主任卢南樵将军来格尔木检查工作，看到汽车兵的形象，大发其火，在干部大会上大骂了一通：“你们简直是一伙叫花子兵！”于是有人在原来的四句顺口溜后面又加了一句：“活像一群叫花子！用以自嘲。”

由于车况差，道路和行车环境不好，再加上青藏线的汽车兵是一支全勤部队，一年中差不多有10个月时间在路上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严重的车辆事故一直困扰着大家。汽车团领导的体会是：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一来电话，不是车翻，就是人亡。据青藏兵站部统计，其所辖的几个汽车团，因车辆事故所造成的伤亡，五十年代是一个连，六十年代是一个排，七十年代是一个班。



## 写 98 封“劝降信”的 妻子自己“投降”了

青藏公路好像一卷长长的稿纸，车轮就是那饱蘸墨水的笔，轮胎与公路相摩擦，录下了汽车兵走过的足迹，记下了他们创造的业绩。

1983年，在兵站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部长王满洲向麾下的几个汽车团的头头下了军令：

“哪个汽车团要能保证三年不发生死人事故，我为他们报请三等功！”

三年，一千多天，几百台车，在处处充满险情的风雪高原上奔驰，能保证不发生一起事故吗？！

其他几个汽车团的头头们正在琢磨，团政委邢景山和团长张奎景站起来，他们发出掷地有声的两个字：“我们！”

为了实现自己立下的军令状，邢景山和其他领导一起对本团三十多年来在高原行车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历年出现的几百起事故，一一进行了分析，最后推出了安全行车的九字“真经”：度天时，识地利，求人和。

到1986年底，他们团果真实现了连续三年无亡人事故的目标。总后勤部给他们团记了集体三等功。

邢景山一点也没有陶醉，他又向全团发出了“向五年无亡人事故的目标迈进”的号召。为了把口号变成现实，他忘了自己，忘了家庭，终年在风雪线上奔波。到1988年，他们又创下了连续五年安全行车的优异成绩。

对于邢景山昼夜不停的奔劳，妻子很放心不下。她发现丈夫一回到家就显得很疲倦，身体也明显瘦了，就劝他到医院去检查检查。邢景山总是说：“忙完这阵再说。”可一个“这阵”刚完，另一个“这阵”又开始了。妻子多次劝他少跟几次车，他总是说：“不深入第一线算什么领导！”

天冲下唐古拉的愿望难以实现了。于是，张副团长和张营长研究决定：由张营长亲自带领两部好车，挑两名好驾驶员，把油集中起来给他们，大家突击挖路，送他们到山下的安多兵站去求援（那时，唐古拉兵站未建立）。张营长挑的驾驶员之一就是三连三排副排长王满洲。

冲过一道道雪障，当天傍晚张洪声、王满洲他们安全到达安多兵站。他们几乎累得挪不动了，兵站同志看着脸色青肿、浑身脏黑的汽车兵战友，劝他们好好休息休息。但张营长顾不上这些，山上的人还等着他呢。他在兵站给上级机关发了电报，表明了坚决战胜雪封的决心，然后装上面粉、大米、馒头、柴油、牛粪等急用物资，又开车向山上返去，于第二天中午到达山顶。

山上的病号越来越多，高山反应症和冻伤患者达95%以上。全营唯一的一座“房子”是用空油桶围成一圈，上面盖着一块篷布的一个棚子，这油桶棚名为营部，实际成了重病号的收容所。自从山下运来面粉大米后，情况大大改观，他们用洗脸盆当锅，盛雪化成水，做面片汤，用铁锹烤饼子，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在零下50度的雪山上，熄了火的汽车都被冻成了冰疙瘩，要想把它重新发动起来，就得点火烤车。车上带的劈柴早就烧光了，于是，有人开始用擦车布来点火；接着，有人撕下大衣面子，有人掏去棉衣套子蘸上机油点火烤车；最后有人甚至连棉手套、背包带等都拿来点火用了。

就这样，他们发动了全部车辆，2月4日晚，当最后一台车到达安多兵站时，屈指算，整整25个昼夜。25天来，风吹油抹，他们竟没洗过一次脸！

飞轮碾碎千里雪，马达响彻九天云。又经过三天三夜地奔驰，2月7日傍晚，他们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拉萨古城。

那天傍晚，我在格尔木兵站碰见了原来所在汽车团的政委李学敏中校。他刚带着一营的车队从拉萨执勤归来，裹着一身风寒，带着满脸沙尘。我离开这个团时他尚未入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很快熟悉。他告诉我，车队过唐古拉山时遇到了雪，翻昆仑山时又遇到了雨，都安全过来了。

他说得轻松自如。常年跑青藏线，艰难困苦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了。

望着一营的车队，我的脑里突然闪过一道光亮：对，就是这个一营的车队，曾创造了广为流传的奋战唐古拉山25昼夜的事迹。

那是1957年元月10日，副团长张功少校和营长张洪声大尉带领的满载武器弹药的75台车，来到海拔53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他们要把这批战备物资运到拉萨去，车上还有部分押运人员，全车队共204人。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刚上山不久，就遇到百年罕见的暴风雪，天地间一片混沌，道路和沟坎霎时被大雪填平了，汽车像处于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时时有倾覆的危险。由于氧气少，不少汽车走着走着就熄了火，气温降到零下50度，手一摸车门，像磁石似地就被粘住了。油路不通，卸下油管用嘴一吹，“嗤——”一声，嘴唇被粘下一块皮来。

在风雪弥漫的山坡上，张洪声召开了营党委扩大会，研究决定：一边挖雪开路，一边开车前进。

挖雪战斗开始了，每辆车上的铁锹不够用，不少人就用脸盆刨，有的人索性用手当铲子，往外扒雪。每个人的衣服都冻成了一敲响的冰铠甲，两只脚成了两个大冰坨，鞋袜都冻在一起脱不下了。

他们原打算经过两三天的奋战，也许可以冲下唐古拉。可三天过后，不少车辆陆续发生故障熄火，大部分车上的油也烧完了，看来两三

1988年底,邢景山随车队从拉萨回到团里后,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确诊:亚急性肝坏死晚期。

邢政委知道自己的人生道路将要走到尽头,大年初一早晨,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后几行字,向同志们告别:

“我临走时说很快回来,现在看来不能兑现了……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和你们一起欢度春节……”

1989年2月17日,年仅44岁的邢景山,心脏停止了跳动。

邢景山是近年来青藏兵站部被高山病夺去生命的14个团级干部之一,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47岁。

暴虐的高原,以“死”的威胁,向汽车兵发着淫威。偏偏高原汽车兵都是不怕死的。也许他们初来高原时,曾经产生过畏惧,讨厌过这里,骂过这里,但他们毕竟在这里流过汗,流过血,这里有他们栽的第一棵树,有他们盖的第一幢房,有倒下去战友的坟墓,更有他们创造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他们离不开这里,他们向往着这里更美好的明天。

汽车某团副营长陈文耀,是从开放城市兼侨乡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入伍的南国儿子。改革开放以来,家乡面貌一天一个新,和他同时入伍的两个同乡战友复员后,一个在街上练摊,一年轻轻松松赚个一两万;另一个在建筑队开车,不几年就盖起了一幢小楼。陈文耀的妻子沈丽萍是位归国华侨,当地几家企业都向他敞开大门,欢迎他这样的实干家;他也可以到国外去经营买卖,弄得好会很快成为一个富翁的。因此,妻子沈丽萍三番五次写信,劝他快点转业回家。一封,两封,五封,十封,不多久便写了九十八封“劝降信”。但陈文耀却全然不为所动,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团队,自己的车,舍不得离开青藏线、昆仑山。他向妻子施行了“反劝降”说:“你来高原吧,这里需要我,也需要你!”

妻子终于“投降”了。她的九十八封信没有找回他,他反而把妻子从开放城市拉到了青藏线,在昆仑山下安了家。

他们爱高原、恋事业的可贵品质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雪片似地飞来一百二十多封信件,盛赞他们是扎根高原的红柳,开放在昆仑山麓的雪莲花!

1984年夏,何新明从天津解放军运输工程学院毕业了。学院分配他去驻山西某部队工作。这个从地方高中生考入军校的新一代大学生,早就向往着到艰苦的边疆去一展身手。他找到学院领导要求:“分配我到青藏高原去吧!”

领导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千里迢迢来到驻格尔木汽车某团六连报到。三天后,连里分配他给一名老驾驶员当助手,去西藏安多拉煤。他很高兴。常言说,花盆里种不出万年松,小圈里养不出千里驹嘛,他早就想到世界屋脊上去闯荡一番哩。可是,车上昆仑山后,海拔越来越高,人的头里边也像擂鼓似的疼了起来;到了唐古拉山,胸口闷得像压了扇磨盘,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到了兵站,他扛起行李就往屋里跑,想赶快躺下来喘喘气。但老驾驶员却叫住了他:“大学生,咋不给师傅扛行李?”

他愣了一下,一咬牙,扛就扛!要当先生,先当学生嘛!就这样,何新明开始了自己高原汽车兵的生涯。他把自己在课堂里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制服了连里的“油老虎”车;他开动脑筋,勤于动手,使不少废旧零配件重新派上用场。渐渐,老兵们对这个大学生刮目相看了。后来他被任命为本排排长,接着是副连长,当连长的命令是1987年10月下发的。他感到连里这些在风雪高原摔打出来的驾驶员,论实践经验不能说少,但在理论上却缺乏点深度。于是,他抽空就给大家讲上一课,什么《载重汽车的修理与保养》

啦,《汽车省油窍门》啦,《怎样预防车辆事故》啦,等等,由于讲得实在,深入浅出,理论很快付诸实践,精神很快变成了物质。在全团开展的七项内容的评比活动中,他们连拿下了行政管理、安全行车、节约节材等六个第一。连队连续两年荣立集体三等功。

何新明深知,在环境艰苦的青藏高原,要在战士面前取得发言权,就得和他们一起在风里雪里,在缺氧地带摸爬滚打,忍饥挨冻。他当连长几年来,带领车队百多次地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1989年冬天,他带车队翻越唐古拉山时,遇上了大雪封山,路边的雪比车还高。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多度,人一下车,鞋底就被冻沾在地上;车轮滑得走不动,何新明就把自己的大衣垫在车轮下,发动大家推车前进,铲雪开路。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挖出了一条近千米长的“雪胡同”,把车队安全带下了山。

男大当婚。也许为了把根子牢牢扎在高原,何新明在格尔木找了一个姑娘结了婚,成了家。小两口新婚燕尔,恩恩爱爱。但何新明一心扑在工作上,却很少回家。尽管他的家离连队只隔一堵墙,几步远的路。有一次,他爱人余素珍因煤气中毒,昏迷过去,何新明把她送到医院安排好,立即又带着车队出发上路了。爱人小余说:“我理解他,他的心全在他的连队,他的汽车,他的工作上!”

1990年4月,总后勤部发布命令,授予何新明以“热爱高原的模范连长”的荣誉称号。

何新明,新一代高原汽车兵的杰出代表,他又率领他的车队奔向茫茫的世界屋脊!

青藏公路沿线人烟稀少,常常是几百里路上找不到一个村镇。为了解决过往部队、特别是常年在青藏线上跑车的汽车兵的住宿问题,几乎在公路修通的同时,兵站也随

之在公路边诞生了。 (许羊萍)

## 幸福 = 吃热菜、睡暖觉、和一家人一起吃饭

我的脑海里,至今还留着六七十年代高原兵站官兵自力更生,热情为过往部队服务的故事。

——过去高原兵站用的菜,基本上是从千里外的西宁或兰州运来的,路上要走十来天。夏天,途中烂掉十分之八九;冬天,途中冻坏十分之八九,吃到嘴里的菜往往比海参鱼翅还贵。为此,上级给兵站供应的大部分是脱水菜、花生米、肉罐头和蛋粉、黄豆之类的东西,饭碗里要见点青菜叶子很困难。自己种菜吧,“不毛之地”上无霜期很短,种子下到地里不是被干死,就是被冻死,根本长不起来,但这些并没有使大家灰心。驻雪山兵站的指战员给废装箱和脸盆里装上土,垫上马粪,搞成“活动菜田”,然后种上大葱,栽上蒜瓣,白天抬出去晒太阳,晚上抬进屋放在火炉边,勤浇水,巧施肥,使这些“活动菜田”里终于长出了绿油油的小葱和翠生生的蒜苗。对这些馋人的青菜他们自己舍不得吃一根,割下一茬又一茬,给住站汽车兵做出了一锅锅飘着绿叶翠枝的面片汤,大家吃得头冒热汗,嘴里直喷喷。

——“高原缺青菜,豆芽豆腐挂帅”。这是六十年代汽车兵对兵站生活的概括,岂不知这豆芽是靠煮锅台生出来的。

做豆腐,在这里却成了大问题。只好用人推。在海拔4700多米的地方氧气“定量”供应,人推着石磨转,累得头昏眼花,呕吐不止,走着走着,腿一软,摔倒了。于是大家轮班上阵。

——山高野味多。位于昆仑山上的二道沟兵站,发现驻地周围的野兔特别多,于是,他们便组织人每天外出打野兔,有时一天可打野兔

二十多只。

——山高水高。在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上有个唐古拉湖,湖里还飘动着一条条大鱼。唐古拉兵站站长吕传奎带着几个战士,赶着牦牛去湖里破冰捕鱼。

纳赤台兵站宏伟的四层大楼依山傍水而建,在雪山上看到这样现代化的建筑,令人肃然起敬。高大宽敞的餐厅两边,用斗大的字写着一幅对联:

昂首昆仑山麓乐为中华好男儿  
立志献身国防愿做长城一块砖  
这一切,使我的心受到强烈的震撼;那些在兵站存在了几十年,曾作为兵站主体建筑的帐篷不见了,地窝子没有了,木板房成了历史,干打垒也退役了。雪山兵站有了欲与昆仑试比高的大楼,这也许是内地许多人想不到的事。

走进楼内客房,间间整洁舒服,床上有干净的被褥,汽车兵上路执勤再也不用一年四季带着自己那沉重的行李卷,在兵站睡大通铺了。那呛人的煤坯炉,已让位于蒸气暖气管,在酷寒的冬季,室内温度可保持15—20度左右,汽车兵可以展开腿脚睡个好觉了。

千里风雪高原,以热为贵。这一点我本人是深有体会的。五六十年代,我们在青藏线跑车那阵,晚上到兵站不是住帐篷就是睡大厢。睡觉前用背包绳把被筒的一头捆起来,然后穿着皮大衣,戴着毛皮帽和皮手套钻进被筒里去。睡时是什么姿势,第二早起来仍是什么姿势。记得有一次就在这个纳赤台兵站,晚上干打垒的屋子里还烧着火墙,可第二天起床一看,墙上的霜毛竟有两寸多长,每个人的眉毛、胡楂和鬓发上都结了白霜,有一个同志的鼻子上冻了个大冰砣,差点把鼻子冻掉。

3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如今的纳赤台兵站已今非昔比了。1990年4月总后勤部授予他们以“高原红旗兵站”的荣誉称号,赞扬他们

18年红旗不倒,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集体三等功六次,兵站党支部受到总政治部和中央组织部的表彰。

为了使这面红旗在昆仑山上高高飘扬,不少人为她流过汗,洒过血,不少人为她奉献了青春,付出了生命。

兵站炊事班老班长徐鸿武,1957年带着两把菜刀上昆仑,在兵站一干就是30年。高原风吹皱了他的脸,昆仑雪染白了他的发,平凡而繁忙的招待工作耗掉了他的青春年华,无情的高原疾病侵蚀了他的健康。1987年,他带着满身的疾病和动过七次手术的刀痕,恋恋不舍地回四川老家度晚年去了。至今,兵站的同志和常年跑车的汽车兵,还经常念念不忘这棵昆仑不老松。

兵站副站长郭进军,是在这昆仑山的怀抱里倒下去的。长期以来,兵站的接待任务十分繁重,每天都有三四个连队住站,最多时一天曾接待过十七个连队,近两千人,光菜就要切一千多斤,和面淘米更是一盆接着一盆,一锅连着一锅。兵站干部几乎每天都在伙房跟班劳动。有一次,郭副站长正在伙房揉面。突觉眼前一黑,摔倒在案板上。大家把他扶回宿舍后,他鼻孔喷血达半脸盆之多。医生说这是高原性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造成的。后因病情急剧恶化,竟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

兵站原教导员赵国瑞结婚13年了,没有在家里过个团圆年。

妻子蓝伟华急了:“你不回,我就去!”于是她带着女儿随军到了高原军营。人到了军营,但随军却不能随夫。由于昆仑山气候恶劣,兵站家属院都建在山下的格尔木。她每周只能在电话里和二百里外的丈夫“见见面”,互相问候问候。又一年的春节到了。年三十晚上蓝伟华准备好了包团圆饺子的肉馅,女儿一次又一次在门口张望,盼着爸爸回来过年。可是,赵国瑞却从昆仑山打来

电话不无抱歉地说：“万分对不起你们。本来应该回来的，可兵站的战士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我需要和他们在一起过年……”

一些随军不能随夫的妻子们有这么一句话：“啥叫幸福？一家人能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猛一听感到不可理解，细一想它里面包含着多少辛酸和深情啊！

兵站的牧场设在无人区野牛沟，海拔4500米，一茬一茬的指战员都在这里放过牧，他们生火靠牛粪，吃水靠化雪，白天跟着牛羊转，晚上裹着皮袄睡，昼夜与牲口为伴，常年见不到一个人，完全过的是一种游牧生活。有一次，暴风雪袭来，天地间一片昏暗，群羊被风刮得无影无踪。为了寻找失散的羊，放牧战士背着干粮，在昆仑山中追踪，有时还要与相遇的狼群搏斗一番，累得走不动了，就躺在雪地上歇歇气，一直追寻了200多里地，才把羊群找了回来。

同是九十年代的年轻人，谁不向往现代化的生活；同是有血有肉的男子汉，谁不希望家庭的温暖与爱恋！但我们的战士却在这荒无人烟的雪山上，默默地奉献着青春，过着近似苦行僧的生活。

他们失去了很多。

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很多。

## 从“五大凉”到“五星级”的“空中楼阁”

汽车沿着昆仑山的北坡奋力向前爬着。随着海拔的升高，我渐渐感到脑袋里边像敲鼓一样疼起来了，但我咬着牙没吱声。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五道梁兵站。这个兵站地处昆仑山上，海拔4800米。当年慕生忠修青藏公路时曾在此设过站，叫可可西里站。可可西里是无人区的意思。

30多年前我曾到过五道梁兵站，那时站里的客房是破旧的拱形

帐篷，烧火用牛粪，吃水靠化冰。兵站的一项艰巨任务是背冰大战——因此地无水源，每天下午兵站除值班人员外，全体出动，用麻袋、柳条筐等去几里外的冰湖里背冰。在高寒缺氧的昆仑山上，背着沉重的冰块，一个个气喘嘘嘘，脚如坠铅。汗水与冰水结在一起，呼气与霜花凝在一起，一趟又一趟，有时直到半夜。站里有一间被大伙称为“水晶宫”的储冰房，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冰块。

条件如此艰苦，尽管兵站同志作了很大努力，仍不能使所有过往部队满意。所以有的人不叫他五道梁兵站，而叫“五大凉”兵站，说这里水凉、饭凉、菜凉，屋子凉，人心凉。

俱往矣！

如今“五大凉”变成了“五大热”。你瞧，兵站门前不远处，修起了一个15000多立方米的蓄水池，可供兵站及兄弟单位的一切用水，兵站已结束了背冰化水的历史。

特别令我惊奇的是这里的住房——办公室、客房、餐厅等，都是“空中楼阁”。站长告诉我：由于此地属永冻层，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兵站盖了几次房，住不多久冻土融化，地基下陷或裂缝，房子随即也东倒西歪。自然给我们出了难题，我们就要想办法对付它。现在的房基是挖地三米深，再浇铸起一个个直径多半米的水泥桩，桩体突出地面两米多，上面铺上水泥预制板，房子就盖在水泥板上，既防潮隔湿，也解决了地表塌陷的问题。

我信步走进“空中楼阁”，屋内干净整洁，温度适宜，置身此地，简直不敢叫人相信这是在可可西里的“无人区”里。

今天，一支在西藏执行战备任务后返回内地的部队正途经这里。兵站给他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在能摆34张餐桌的宽大敞亮的餐厅里，每桌都是八菜一汤。八个菜是：扣肉，炒三丁，手抓羊肉，红烧鱼，猪

头肉，虎皮辣椒，麻酱拌茄子，桔子罐头。主食是一盆高压锅蒸的白米饭，一盆葱花肉末面条，两盘煎饼，还有馒头。站长告诉我：一般情况下每人二两米饭、二两面条、二两煎饼就够了，不够的还有馒头。

我想起从格尔木出发时，兵站部王根成部长给我说的话：“你到了五道梁兵站，一定要尝尝他们的煎饼，保你吃了还想吃！”

果然，我刚在餐桌旁坐定，一盘黄葱葱、焦嫩嫩的煎饼便摆在了面前。尽管高山症弄得我头昏脑胀，食欲极差，我还是吃了两张，味道相当不错。同行的赵副主任告诉我：“电烤炉煎饼已成为五道梁兵站的特色饭了。现在青藏线上的不少兵站都创出了自己的特色饭和风味菜，如黑河兵站的绿豆米饭，当雄兵站的火锅牛肉，沱沱兵站的红烧鲤鱼，纳赤台兵站的砂锅豆腐等，都已在过往部队中叫响了。”

在海拔5300多米的唐古拉兵站却有高热量的温泉。温泉的水温可达70度，有人把拣到的野鸭蛋放在里面煮一会就可以吃了。你若有幸能在世界屋脊上洗一个温泉澡，那才是得天独厚的享受呢！

另一个是沱沱河兵站“长江源头宾馆”。自从地理学家证实沱沱是万里长江的正源以后，这里成了不少人期望一顾的地方。当年慕生忠在此修建水下桥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想到此地会成为一个高原小镇，而且变得越来越热闹。沱沱兵站顺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在河岸边盖起了一个颇为壮观的大楼，上书：“长江源头宾馆”几个大字。宾馆内设有中高档次的房间，当你住进那铺着地毯，放着沙发、席梦思床的房间时，倏忽间，你会感到这是在北京或上海的五星级大酒家里。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啊，变了！高原变了，变得叫人有点不可思议了！

（责任编辑：刘家驹）

# 蒋介石高参“通共”纪实

——韩练成将军在内战中的秘事

●毕永畅

1950年8月，海南岛刚解放，海南军管会主席冯白驹赴京汇报工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接见了，并听取了他的汇报。

一天，由周恩来召集曾在海南岛同冯白驹打过交道的原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和他一起座谈，陈毅、贺龙也在座。陈毅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亲切地询问韩练成和冯白驹：“昨晚怀仁堂晚会《三岔口》这出戏你们看了吗？”冯白驹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说：“看了，看不懂。”陈毅幽默地说：“两个不相识的自己在漆黑的夜里恶战了一场，天亮了才认识，真有趣啊！”韩练成有点难为情地说：“惭愧，没有完成任务。”周恩来沉思一下说：“这是我没有给你们接上线。”接着，又对韩练成和陈毅说：“莱芜战役你们不是合作表演得很好吗？要是没给你们接上线呢？”他转而面对冯白驹和韩练成说：“为什么没给你们接上线，只是单独向韩练成同志打个招呼呢，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故事发生在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关键岁月。



1941年6月14日，活跃在海南岛的琼崖纵队，在琼文根据地遭到顽军保六团的袭击，失掉了电台，从此琼纵就与党中央中断了电讯联系。1945年8月23日，纵队参谋长李振亚率队向五指山腹地毛棧、毛贵进军，打垮了顽保六团；从缴获的一份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关于日寇无条件投降的通令》中，才得悉日寇投降的消息，他急忙派传令兵把文件送到阜龙文豪山，交给纵队首长。

冯白驹根据这份文件，综合别的支队得到的情报，确认日寇投降的消息无疑，于是在琼崖纵队的统一号令下，各支队纷纷逼近敌人据点，要日伪军缴械投降。

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疾速派遣桂系第四十六军，分乘美国军舰、飞机，于1945年10月来琼接受日军投降，同时密令这支部队消灭中共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纵队。

韩练成到海南，扮演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个是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联系人。来琼前，在雷州半岛，他接到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上写道：“……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酌定。……”

对周恩来的委托，韩练成深知担子沉重。但是，怎样才能和琼纵通上气呢？到海口市后，他发现军统特务蔡劲军（广东省政府海口办事处主任）抢先一步从投降的日军手中

劫走了琼纵的被俘人员和大批有关资料,他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便以“行政院特派海南区接收协调委员会主席”、“中国陆军海南区受降司令官”的名义,斥责蔡劲军越权行事,限蔡即日将全部在押人员和一切资料交海口警备司令巢威处理。

释放这批被俘人员的时候,韩练成从中挑选了一位县级干部,亲自和他谈了话,并亲手把写给冯白驹的一封信交他带去。信的主要内容是,战争已经结束,必须尽快恢复秩序,要求琼纵派人出来,商谈整编游击队的问题。韩练成特别嘱咐这位干部,请琼纵领导人不要过份重视这封信的表面措辞,而是要好好考虑派人出来的实际意义。

韩练成的信送到琼崖特委和琼纵司令部。特委同志对韩练成的提议非常重视,对要不要派人去谈?谈些什么内容?结果会如何?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最后,特委决定派琼崖公学校长史丹和一名警卫员,前往海口谈判。

史丹几经辗转来到海口市,过了一天,谈判在得胜沙路临近海边的椰子园进行。在一间讲究的会议室里,史丹见到了一表人才的韩练成中将。

韩练成向史丹一一介绍了参与谈判的成员。谈判开始,史丹首先阐述了琼崖特委对时局的态度和方针,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对琼崖纵队的进攻和挑衅,停止发动内战的准备,共同遵守“双十协定”,实现海南的全面和平。

韩练成故意又开关于和平的问题,盛气凌人地说:“我们谈判的首要问题,应以国家军令、政令之统一为要旨,具体讨论怎样由政府收编你们琼崖纵队。”一名校官接着说:“你们归编政府军,应当早点做出积极的准备。”

史丹反驳说:“我们到这里来是谈判的,不是来听命于人的。诸位对‘双十协定’的基本精神及和平、团

结的方针避而不谈,只强调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显然是缺乏和谈诚意。关于军队整编问题,目前我们两党正在谈判之中,我们在此讨论这个问题是不适宜的。”

这时,韩练成用带着威胁的口吻说:“琼纵这么点人马,几条破枪,还是老实归编好。”

史丹又正辞严地说:“我远道来谈判,不是因为软弱无力,而是不愿看到海南再燃起战火。如果你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你们就在人民中输了理。再说,真要是打起来,你们未必就能取胜。”

顿时,会场气氛紧张,韩练成只好圆场:“今天暂时谈到此。统一军令,政令势在必行,但是史先生一人难以作主,请史先生回去跟领导上商量,我们日后再谈。”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史丹正在寓所苦苦思索着如何应付目前这种复杂的情况,韩练成突然派车来接他,说要和他面谈。对于这位军长阁下,白天他已经领教够了,今晚又要唱哪出戏?

出乎史丹的意料。韩练成把副官支开,还嘱咐警卫,假如有人来找他,就说不在。然后他压低声调说:“史先生,我寄给你们的信函看到了吧?那是官样文章,但其间有一句是我的真心话,我韩某绝不做对不起海南人民的事。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我还故意用红笔在这句话的下面画了杠杠。”韩练成用更低的声音说:“今天上午的谈判完全是演戏,是故意给上头看的。”接着,他便自述起身世来。

他是宁夏固原县人,早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的部队当过团长、旅长,曾和许多共产党员一起工作过。后来,蒋介石和冯玉祥打仗,冯打败了。蒋介石认为他年轻有为,便留他下来,送到德国去留学。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主张,并同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人取得了

联系。他对共产党有认识,党对他也有了解,至今,党和他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四十六军是桂系部队,蒋介石为了控制这支部队,派他来当军长。下面三个师的师长都是桂系的骨干人物。目前他还不能有效地控制这支部队。四十六军来琼,完全是为了消灭海南的革命武装,正在紧张地进行部署。今天举行的所谓和平谈判,是奉上面的旨意搞的,完全是为了欺骗舆论,麻痹琼崖纵队。

听了韩练成的这番话,史丹反复思量:他的表白是真是假?韩练成似乎猜到了史丹心中的疑虑,便问:“你们琼崖纵队跟延安有没有电讯联络?”这是十分重大的机密,史丹怎能如实告诉韩练成呢!于是便说:“有。”“有就好。”韩练成对史丹说:“请你们问一下延安,就会知道我是什么人。”

韩练成进而提出:“你们和中央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利用哪些港口与外面联系或运进物资,我可以派可靠的人去协助。”他还希望利用自己出巡的机会,在南丰墟或某个适当的地点,单独会见冯白驹,商量一些重大事宜。

对于韩练成的话,史丹更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和给予明确的答复,只好说:“韩军长的这番好意,我一定转告冯白驹等领导人。”

几天之后,史丹和警卫循原路回到了特委驻地,将情况向特委作了汇报。对韩练成究竟是什么人,尽管特委反复研究分析,终因无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而解不开这个谜。

史丹离开海口之后,韩练成稍稍放心,认为至少和琼纵通了气。但是,要完全实现周恩来的嘱托,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他必须设法限制军统蔡劲军和中统曾三省对琼纵的有害的活动。他必须解决由军统头子郑介民控制的汉奸詹松年的部队。从长远利益看,这支土著伪军部队的存在对琼纵是很不利的。解决这支部队是要

冒大风险的。但是他还是把这支伪军部队全部缴了械，并毙死了詹松年。他还必须限制由蔡廷锴军指挥的保安团队的扩编。广东当局张发奎、罗卓英曾要韩练成用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扩充保安团。他用种种借口，没有办这件事。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颁发了停战令。1月13日儋县国民党游击队二百多人进犯儋县白马井墟，结果被琼纵四支队一举歼灭。为了使这种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使人们相信海南岛是平静的，韩练成只好动用自己手中的一切宣传工具，把他的每次行动都公开发表，表示前途平安，没有什么危险；希望琼纵能够理解这种微妙关系，并且善于利用这种关系麻痹国民党，尽量避免或减少自己的损失。

1月16日，韩练成带一名副官、一名医生和卫队，乘火车由三亚到石碌视察铁矿。行前几天，他就发表了消息。十九师师长蒋雄表示这一带共党游击队活动频繁。韩练成笑了笑说：“这是自己吓唬自己。”便毅然出发了。

石碌是个露天铁矿，八所是重要港口，国民党在这一带驻有重兵，不断进犯解放区。琼纵为了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夺取武器，壮大自己，决定二支队于春节前夕伏击敌人的火车。伏击地点选在叉河南边地形居高临下、群众基础也好的老马村附近。他们在离铁路不远的田野里搭起了临时草寮，拆断了铁轨，严阵以待。第三天，天气阴冷，部队透过树梢隐约可以看到火车吐出的烟雾，还听到火车的轰隆声由远而近开来。当火车刚刚进入伏击圈，荫蔽在铁路沿线的琼纵指战员突然一齐向火车开火。“轰隆”一声巨响，火车脱轨前冲，瘫倒在地动弹不得。负责正面攻击的吴琼尧中队用机关枪猛烈扫射火车，担任后卫的部队则集中火力阻击蒋军的退路。一个蒋军

军官手持短枪，从车门跳了下来，拼命抵抗，被琼纵战士击倒在地。韩练成被压在车厢底下，摔伤了腰椎。他的随行人员，有的伤亡，有的被俘。仅十分钟左右，战斗结束。蒋雄派出的快速装甲部队赶到现场，琼纵早已无影无踪。

韩练成回到三亚，当时他的心里真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

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以后，特委决定仍由史丹赴海口，与韩练成进行第二次谈判。

到了海口，谈判仍在椰子园进行。史丹步入会议室，室内摆设依旧，但是气氛与前次大不相同。韩练成半卧在沙发里，点头示意史丹坐下。看样子，他行走有些不便，连例行的礼节也从简了。史丹环顾左右，在座的大多还是上次参加谈判的那些人，个个表情都很冷淡。

会谈一开始，韩练成就说：“关于上次谈的琼纵改编之事，你们作何考虑？”

史丹说：“我们认为，关于军队整编的问题，目前国共两党的代表正在谈判之中，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

一位校官立即接着说：“史先生此言差矣！抗战胜利以后，外患已经消除，而内患却愈见严重。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军令、政令之不统一。海南要实现和平，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史丹立即反驳说：“不然，所谓军队国家化，实际上是取消人民武装，把军队变为国民党一党的私有工具，这对于和平的实现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我们认为，要实现海南的和平，必须认真执行‘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

说到这里，韩练成突然打断史丹的话，高声呵斥道：“违背停战协定的是你们！你们口口声声讲和平，为什么动手打我们？”

史丹冷笑道：“一边讲和平一边动手的是你们。你们四十六军来琼

后，不仅抢夺海南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而且不断向我们进行挑衅，发动进攻。事实俱在，我们都一一记录在案，你们是抵赖不了的。”

这时韩练成怒目圆睁，“啪”的一声拍了桌子，说：“你血口喷人！我这次出巡石碌，遭到你们暗算，几乎丧命。”他略为停顿，用威胁的口吻说，“就凭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你们处置了。”一听此话，有几个人竟然站了起来，似乎要把史丹一口吞下。

面对这个严峻场面，史丹神态自若、理直气壮地说：“既然你们肆无忌惮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当然有回击的权利。至于处理谈判代表，你们国民党是有过先例的。抗战时，我方谈判代表林耀斌就惨遭你们杀害，结果你们在人民面前暴露了丑恶的面目。如果你们今天想做这赔本生意，那就悉听尊便。”

双方的舌战达到白热化。最后，谈判又是不欢而散。

第二天晚上，韩练成又一次派车来接史丹去同他单独见面。

韩练成同谈判时判若两人。他先亲切地向史丹问候，尔后低声说：“我过去对上、对下都说过，你们琼纵力量不大，不敢对我们动手。可是你们现在打到我这个军长头上来了，缴了机枪，我对部下怎么做工作？最好你们写封信来表明是误会，打错了，把缴获的几挺机关枪送回来，我好做部下的工作。”他又说：“你们这次在石碌伏击，上下左右都借此大作文章，要我早日动手，上面催得更紧。看来，海南的内战在近日内要打响了，你们要做好应变的准备。”史丹正打算提出让他帮助办几件事，进一步考察他，韩练成又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那些家伙心狠手毒，我得想法送你快回去。”说完，便让史丹和小吴很快赶回特委驻地。

从此，和谈之门关闭，双方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

1946年1月底,蒋介石电召韩练成赴南京参加名为整编实为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会议。去南京前,韩练成指定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代理军长职务。到了广州,张发奎仍不忘嘲弄韩练成说:“我们的军事政治家,腰骨被共产党打断,不觉得痛吗?”飞往南京途中,张发奎才告诉韩练成,他已派广州行营副主任徐景唐、参谋长甘丽初去海口代表处理接收协调委员会的工作,同时“协助”海竞强开展“剿匪”工作。

徐景唐和甘丽初带着所谓“广州行营剿匪方案”到了海口,把四十六军编为十五至十八个强力突击部队,分两个攻击波向琼纵根据地白沙地区合围“扫荡”。第一波使用九个营,向白沙地区进攻;第二波六至九个营,在外围搜寻捕捉突围部队。四十六军仗着装备和数量的优势,步步向白沙进逼,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富有长期对敌斗争经验的特委和琼纵,决定立足于打,坚持在斗争中求和平。

2月14日,四十六军集中三个团的兵力,分西、中、南路围攻白沙地区。特委率挺进支队跳出包围圈,坚持内线的部队和民兵,挖陷阱、插竹签、埋地雷、放冷枪,搞得敌人心惊肉跳,损失惨重,还被拖得疲惫不堪。2月底,韩练成回到海口,不得不着手收拾这个可怕的局面。

5月,张发奎又亲自到琼督阵,四十六军再次倾其全力,对解放区一面采取下围棋、“填空题”的方式进行军事“清剿”,一面利用极少数民族败类“以黎治黎”。琼纵一面开展反清乡、反征粮、反劳役的斗争,一面声东击西,一举攻克琼西北重地新盈港,迫使敌人新的“清剿”计划破产。

1946年6月,全国内战全面爆发。蒋介石决定将四十六军北调山东。1947年初,第四十六军由海南岛海运直达青岛。四十六军住兰村、

胶县一带,改称为整编第四十六师。他的身边,此时增添了一位不离左右的“秘书”,叫李一明。

1月29日,整编第四十六师由兰村、胶县开拔到博山。韩练成对李一明说:“双方正调集军队进行会战。此战是整个形势转折点。”他在谈了北线蒋军部署以后,接着说:“今天山东只有四十六军比较完整,王耀武指望这个军!我不能白白牺牲,能错开战争焦点,将来作用很大,小可控制胶济路,大可北向平津给李(宗仁)、白(崇禧)撑腰,到一定时期,迫李、白出面表明态度。”他要求李一明尽快与鲁中我军取得联系,询问有何要求。2月3日,便派另一名“高级情报员”刘质彬以寻找韩练成旧友杨某为名,到我鲁中军区联系。

这时,南线敌人已于1月31日发起进攻,企图在临沂外围同我军决战,华野首长决定,待北线敌人占领莱芜、新泰、博山一线,然后秘密移动全军,首先歼灭七十三军、十二军及整四十六师,然后攻占胶济线。

整四十六师8日进占新泰城后即调整部署,刘质彬仍未返回。韩练成非常着急。李一明看到敌人在军事行动上可能有新变动,须及时将情况报告鲁中军区,便提出9日前往蒙阴,韩练成同意李一明成行。

2月9日,我便衣侦察员押回来一个“俘虏”,从他身上搜出了高级特务的证件。野司侦察科长严振衡抬头一看,那人30岁出头,戴着一顶礼帽,身穿缎面皮袍,外套华达呢大衣,一副买卖人模样。

审问开始,那人竟直截了当地对严振衡说:“我要求知道你的身份。”严振衡诧异地反问:“为什么?”那人亮相说:“我是自己人,重要机密不能随便讲。”严振衡说了自己的职务。

那人便说:“我是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科长,现在的名字叫李一明,是组织上派到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工

作的,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李一明提供了李仙洲集团兵力部署的最新情报,严振衡一面听,一面对着地图作标记。

接着,李一明又转述了韩练成的意见:建议陈军长一心一意掌握鲁南大会战,因这次会战关系整个大局,不必顾虑北线。如北线有力量,动作时可告诉我,以便配合,为便于联络及时,可搞一部电台距我二三十里,并可继续派联络人员。

严振衡迅速将李一明提供的情况电告陈、粟首长,并请查询胶东军区是否有李一明其人?当晚,严振衡就接到野司回电:“李一明确有其人,暂留你处,很好接待。”

严振衡将侦察到的敌情和李一明谈的情况向陈、粟首长作了详细汇报。

陈毅当即对严振衡说:“你很快赶回去,要李一明回四十六军告诉韩练成,我们打李仙洲集团时,将不打四十六军,但一定要把部署和行动事先告诉我们,免得打错。”

严振衡星夜赶回侦察队,向李一明详细传达了陈、粟首长的指示,并随即派侦察员护送李一明返回整四十六师。

李一明回到整四十六师,韩练成告诉李一明:现在已决定要我向蒙阴进攻。假如我全军行动,一定拖延至18日到达蒙阴;如果一个师进攻,先进至常路,看情况决定前进或后撤。如果他们决心保卫蒙阴城,应马上大量制造宣传品,在我前进道路上发贴,内容最好是欢迎各个番号的主力军保卫蒙阴城,同时广泛散布流言,我好借此吓唬李仙洲。如他们决心阻止我前进,应在高地上放一把火,我即不前进或缓进。

在李一明返回整四十六师的当天,华野首长就下达了我军主力急速荫蔽北上的行军命令。

20多万大军拉来拉去,有的公开,有的荫蔽,有的向西,有的向北,极大地错乱了国民党统帅部的神



经。2月13日,蒋介石亲自写信给王耀武,催他迅速派部队进占莱芜、新泰两城。信的太意是:共军在苏北、鲁南地区作战经年,损失惨重,士气低落,现已无力与我主力部队作战,并有窜过胶济路、北渡黄河避战的企图。

刘质彬3日从博山出发,辗转十天,于14日才到达蒙阴,见到了陈毅司令员,将北线的情况作了汇报。陈毅嘱他于15日返回整四十六师,向韩练成传话。大意是:他诚意地告诉我们好多问题,表示谢意。我们希望他永远为民主事业共同携手。我党中央和对我他毫不怀疑,请放心。我野战军决不打他,当晚,刘质彬回到整四十六师谈了陈司令员的意见,韩练成表示:“很好,很好!我的议上边(指李仙洲)已采纳,决定部队后撤,不进攻蒙阴了。如此不仅蒙阴可以暂时免去威胁,而且南线可以放手大打。”次日,刘质彬又被派出到陈军长处报告情况。

20日清晨,由博山南下的七十七师被歼灭,师长田君健被击毙,李仙洲集团通往博山的退路也被完全封闭了。

20日夜间,在围歼七十七师的同时,我军对莱芜地区的蒋军发起全线攻击,前锋直逼莱芜城。

王耀武为了避免李仙洲集团被各个击破,命令整四十六师立即北上莱芜,与七十三军协力固守莱芜城。韩练成只好决定整四十六师大队人马进驻莱芜城汶河南岸,师部和直属特种兵分队驻城东关。

22日拂晓,整四十六师主力从汶河南岸向莱芜城内收缩,城小兵多,部队混乱。韩练成对李一明说:“完啦!你有什么意见?”李一明问:“你能掌握哪些部队?”韩练成说:“我只能掌握特务营,你知道,他们都是贵族子弟,不到一定程度我说

他们能听吗?”李一明说:“举义那是最好的,我现在只有负保护你的生命安全之责。我想只有一法,提早离开部队,否则,随军突围,那是很危险的。”韩练成立即表示同意:“好,就这么办。”

韩练成自从颜庄到莱芜后,就不住在整四十六师师部,而住在前方指挥所内,昼夜与李仙洲同吃同住。这天早上,李仙洲对韩练成说:派传令兵去就可以了,不必亲自去。韩练成说:传令兵找不到,必须亲自去。他叫传令兵送李仙洲到集合场去找杨赞谟,说完他进城了,李仙洲纳闷:韩练成说到城东某地去找某团长,何以现在又进城?到了集合场,见到杨赞谟,便问:各部队到齐了没有?杨赞谟说:除警戒部队外,都已到齐。李仙洲当即询问各旅旅长:你们师长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去了?他们都说不知道。李仙洲不能在此等候了,便令各部队开始撤退。

中午12时,敌人最后撤离莱芜城,我军一个师迅速占领该城,切断敌人再回莱芜的归路。13时,华野首长发出全线出击的命令。莱口公路两侧高地的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下来,枪炮声、喊杀声、喊话声和飞机投弹扫射声响成一片,战场上空硝烟弥漫。蒋军狼奔豕突,且战且走,被压缩在南自南白龙北至周家高庄20华里、东自芹村西至高家洼8华里的袋形谷地里,欲战不能,欲逃不成。午后15时,李仙洲左腿下部负伤,仍挣扎着向北逃命,因伤口流血过多昏倒,被我军俘获。韩浚带着3000多人逃到青石关附近,也被我军解除了武装。李仙洲集团56000多人全部被我军歼灭。

原来韩练成由李一明陪同,率一个警卫排,在激战的时候,进入了我军阵地,要求会见陈毅将军

陈司令员和唐主任在黄营前赶

来看望韩练成将军,在热烈的握手和互致问候后,陈毅对韩练成采取的果断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不过,历经战火,难免留有伤痕。关于在海南没有接上线的问题,据说,韩练成和冯白驹之间曾有些误解。周总理曾说:在海南岛联系不上,这是当时客观的条件,是没有办法的,海南那样处理是正确的。全国解放后十多年,韩练成总想找个机会和冯白驹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但都是在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匆匆忙忙说几句,没有深谈。

韩练成于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兰州部队第一副司令员,甘肃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等职。

1981年间,韩练成在追述海南的一段经历说:“历史是人们在自已走过的道路上留下的足迹,历史的真正价值是让事实自己说话。这时提供的一些背景性质的资料,只不过是让后来的同志知道当时敌人内部的情况而已。至于真正的我和我做的事,还是让人们去读我的回忆录吧。”

史丹同志追述了当时海南的情况,明确地表示韩练成对谈判问题的处理是不错的,是尽了他的责任的。当时之所以阴差阳错,未接上线,主要是由于我们丢失了电台。历经劫波,“好事多磨”。最后,还是让我们用周总理对韩练成和陈毅说的话来作结尾吧:“莱芜战役你们不是合作表演得很好吗?要是没接你们接上线呢?”——那么这段历史难道就不是这个样子落笔成章了?

(责任编辑:博文)

长江三峡，山连绵而峻峭，水逶迤而急湍，既往的政治、战争与人事又在沿江撒下了一系列斑斓的古迹、深沉的故实，使得这400里苍润陡峭的崖岸变成了一幅向朝阳而倾铺的大型画轴。

三峡工程即将上马，过不了多时，这幅长长的画轴将沉入几十丈深的水底，后人再要进入画境品味指点，怕是不可能了。在画轴即将淹没之前，我这个远居西北的人，握一杆笔，对三峡的重点景观预为检点，撮其大略，录而备忘。

## 白帝城

从高处扼定壘塘峡入口的白帝城，是三峡的起点。我遥想，这里的景色极其幽雅，很像是凡夫俗子离世升仙的必经之路，对帝王将相所奋力角逐的事业而言，却是艰难、晦败、死灭的象征。

公元221年6月，刘备亲率大兵伐吴，起因是二弟关羽被害，兴师伊始，突然三弟张飞也被人砍了脑袋。“秦腔”里有一折戏叫《祭灵》，是刘备发兵前夕痛奠两个结拜兄弟

的：

滴管中三军齐挂孝……

白人白马白旗号……

文官头戴三尺孝，

武将身穿白战袍，

为只为桃园恩义高……

想不到夷陵战败，700里“树栅连营”被小他一辈的陆逊一把火烧了，只得遁入白帝城。这时的刘备已是气息奄奄了，赶紧从成都召来诸葛亮，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便是天下皆知的“白帝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因子。若是没有刘备这一手绝招，后来的千多年间，又怎么会有“诸葛大名垂宇宙”的现象呢？

白帝城下，是诸葛亮的八阵图，其阵势分为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涪水季节仍可见到遗迹，聚石成堆，造型繁复，“万水排山争一门”，石堆石阵与深江大水争持角斗千余岁，其棱角、其形貌可以想见。我闹不清这水八阵，早八阵是如何调度军队的，所谓“64阵如棋盘，24阵如偃月者”，300年前的渔洋山人王士禛已觉得“不甚可辨”，我们又能看出个什么名堂呢？经了一趟三

# 三峡绝景

托孤”。刘备临终前娶了个小小手腕，在“卧龙”先生的躯体里播下了

峡，只觉得满眼是滔滔水浪，这波动不已的水浪就是复活了的八阵图。千里长江水，十万八阵图，大石若刀剑，小石如锯齿，诸葛亮想施展出最大魔力，封锁住整个长江上游，起的只是死守的作用而已。“江流石不转”，虽然是记载着诸葛亮难以磨灭的军事业绩，可也是蜀汉命运转入下坡路的碑碣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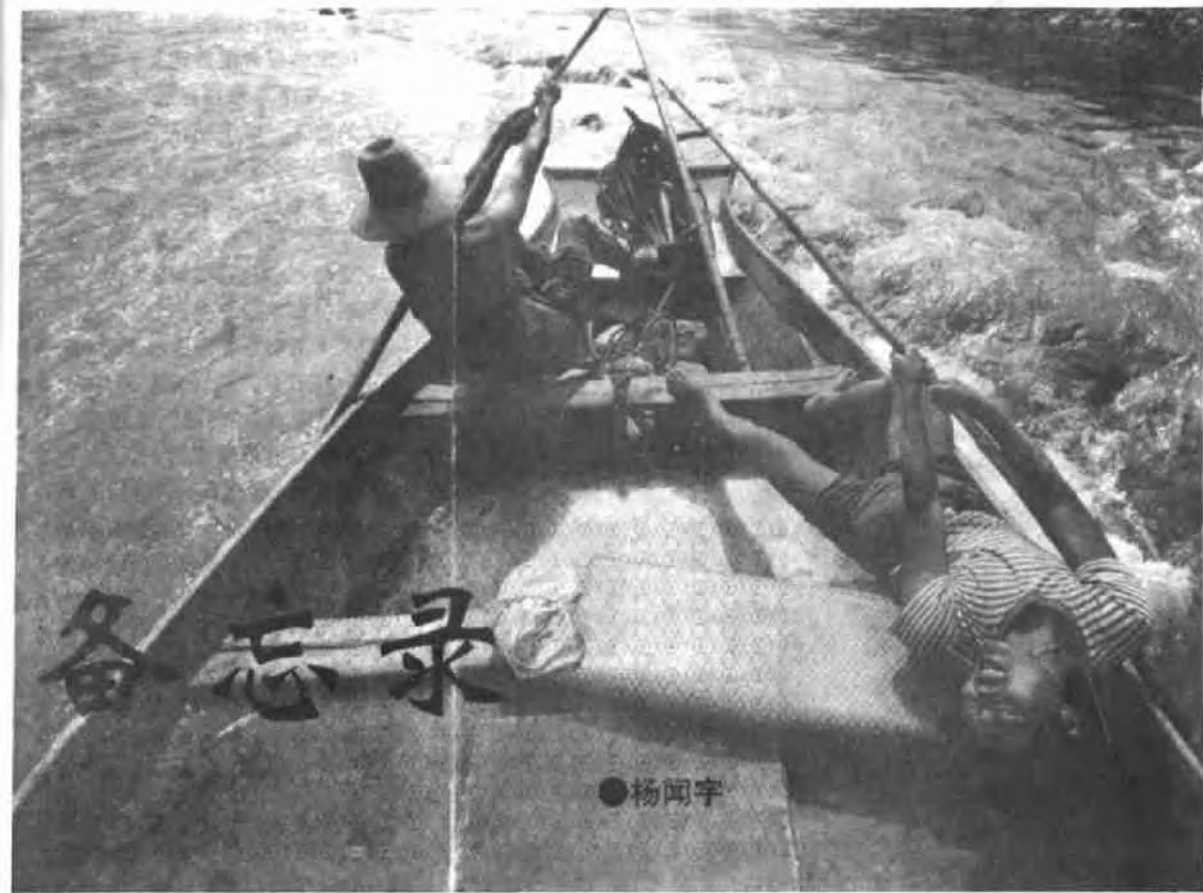
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据心。“白”者“悲”也，白为丧色，就三峡这幅长长的画卷而言，白帝城分明是悲剧记录的一页开端。

## 神女峰

“放舟下巫峡，心在十二峰”。十二峰分峙于巫峡两岸，其间最引人注目、最能逗人遐想者，是北侧那纤丽奇峭、形似女郎的“神女峰”。

这位西王母的宝贝女儿，曾“助





禹驱鬼神，斩石疏波，有功见纪”。《巫山县志》云：“赤帝女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为神女。”据传说与记载，瑶姬不单是生相美丽绝伦，而且精神、品格也相当的圣洁。后来传闻的生活作风问题，全部出在一个名叫宋玉的才子身上。宋玉写了《高唐赋》和《神女赋》。赋里，让楚怀王、楚襄王分别与这位神女梦中相会，而且主动向怀王提出什么“愿荐枕席”。既然神女乐意俯就，怀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乎“王因幸之”，搞了一场颠三倒四的“云雨”之事。就这样，瑰丽与淫邪搅作一团，将飘扬于仙界的一面旗帜生地降了半旗。

神女峰本是春秋寒暑的自然雕塑，而宋玉，偏偏要将它描绘成一个妖娆的天地精灵，宋玉未曾想到的

是，他的赋自下而上，从雅俗之间为中国文学艺术架起了一座破天荒的“云梯”。云梯所及，也为皇室不洁、帝王无德下了个难以抹去的注脚。

这两赋使得一种优美的气质泛化、也庸俗化了，导致“神女”一词后来竟衍化为青楼娼妓的代名词。

宋玉用浪漫主义手法捣碎了神女“不可以求得”的现实主义常规，竟逗引得后继的诗人们在神女峰前掀起了一个又一个膜拜与颂赞的浪潮。连诗圣杜甫，也极称宋玉“风流儒雅”，堪为师表哩。

因为文章写得好，宋玉骨子里也就骄傲得很。他有一句傲气十足的话：“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宋玉的故里在哪儿呢？他的家圆距神女峰并不很远，就在下游百里的秭归。

## 秭归

秭归是屈原的故乡。

宋玉是屈原的弟子，他聪明多了，不愿像乃师那样直来直去，便以赋为工具“假设其事，讽谏淫惑也”。楚王的淫惑谏住了没有，不得而知，楚国很快就灭亡了，这却是事实。宋玉不敢直谏而取巧于假设讽喻，文字上的“假设”怎么能挽救一个国家的命运呢？师徒之间同车而不同轨，两相比照，人们益发崇拜屈原。

历史对屈原的评价很简洁，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愤世嫉俗，怀沙投江。伟大与孤傲、清高与驳弃似乎是难于分割的两极。屈原以他忠正不阿的生命，为后世人臣、也为后代诗人树起了一个最实际、最标准的



尺度。他那巍峨的塑像滨江而立，正聆听着足下不舍昼夜的万里江声，俯视着 2000 多年间或者逆水而上、或者顺流直下的一个个臣僚与诗人，不管慢船还是快船，不管舱里载着清贫、忧愁还是载着酒肉与如花美眷，屈原大夫的目光始终是热烈的，更是冷峻的。

进入西陵峡，一抹纤尘不染的清溪碧流从北畔大壑中切入长江，这便是驰名的香溪。沿溪上溯 60 余里，是王嬭故里——昭君村。

屈原是天下公认的悲剧角色，王昭君同样是一个令人心折的悲剧形象。“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此一行动正如香溪水要绕出群山万壑汇入长江、东注入海一样，王昭君要突破深邃的、森严的汉家宫阙，不惜远嫁朔方，去觅取个人生命的最高自由（有

人说她是为了西汉朝廷才如此颠簸折腾的，这未必符合昭君的本意）。辞别之日，“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这是王昭君卓逸人格里迸发出的精神火花“竦动”了整个汉宫。“光明汉宫”的那一瞬息，发生在公元前 33 年，这个俏丽女子确切的生卒年月，被古老的神农架隐藏起来了。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昭君歿后葬之于塞外，天气凉了，塞上秋草全白，唯独她的坟墓上草色青青。从三峡行舟上眺望过去，香溪水悠悠不断地流进来，那青色的塚墓又静静地伫立在远方，清清地来青青地去，来无声息去绝踪迹，却将女儿家的美丽挥洒得那么遥远，又那么凝重，直让偌大一座汉宫遭了雷殛似的木木然发呆，甚至

在历史的档案里还要发呆。

屈原，王嬭，作为处于同一风景线上的与封建宫廷有牵扯的一男一女，在个人性格深处确也有些共通的地方。郦道元在《水经注》里写到秭归，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抑其山秀水清，故出隼异；地险流疾，故其性亦隘？”对秭归取一个“隘”字来质疑，分明是针对那个死扣铁门、难得松宽的社会。

王昭君那强韧而又脆弱的香魂未返巴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呢？他因理想破碎而自沉汨罗之后，传说是有一条神鱼，由汨罗而入洞庭，上溯西陵峡，硬是将屈原夫子驮回了秭归。我是深信的，物质条件的窘迫并不排斥灵魂的瑰丽高洁。高洁瑰丽灵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可能游离开本乡热土而存在，否则，屈原、王昭君的襟怀里为什么总是潜伏着一种故园感和归宿感呢？

三峡是中国版图正中一道曲折的闪电。2000 多年闪电似地过去了，秭归的“丽物”是“难掩”的。

## 猿声与诗画长廊

三峡流水从文化角度淘洗出一种悲剧美之后，显示于人们眼前的已不再是单纯自然性的游观物，而是负载着民族性的气质与美感的一大巨流。我们的古代诗人们从来就是悲剧的产儿，他们像一颗颗流星一样流经这样的长廊，怎能不留下生命中的千古绝唱呢？！

实际上呢？早在诗人们吟哦之先，面对着滔滔而进的长江水，祖居两岸的猿猴们就“吟哦”过了。描写三峡的最漂亮的文字，首推 1500 年前的郦道元；其字里行间最动人的音响，应属猿啼：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洞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

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据说，悬崖上的猿猴仗长江水时，一个个手拉手自树枝高处朝下结梯，直到江边，轮流而饮，饮足则长啸，啸声中散入林莽，所以杜甫有“高萝垂饮猿”的诗句。江流激烈而雄放，流漾着力度与美色，猿啼凄异而哀婉，挟裹着志士仁人的寂寥与失落。涛声和以猿啼，这是迅疾、坎坷、凶险途中深深的叹息，沉重的呜咽，是一曲浩大悲调的天然和弦。

没有猿啼，三峡之诗无论多悲，也悲不上相应的感情指数；唯有猿啼入诗，诗取猿啼，吟哦长啸之声在这无法宁静的水面上相辅相成，二者才可能传之弥远，怦动千秋。

而今的三峡，桔林似锦，秋色醉人，再也听不到高猿长啸了。猿猴们向着“夜静江水白，路回山月斜”的长江三峡作了个辉煌的揖别，黄灿灿的金桔为它们的哭哭笑笑画了个甜蜜蜜的“句号”。

## 高峡平湖

三峡作为巴楚文化频繁交往的重要通道，古往今来经过的人物多了。船夫土人之外，无名小卒不计，名满天下的文豪诗人也不计，就说说史册上不能不录的“大人物”吧：

巫山神女庙后有一平旷石坛，传云：“夏禹见神女受符书于此坛上”。得不着这宝书，大禹死活就通不开三峡的叠叠山岭。当然，大禹到这儿来了。

2200多年前，楚怀王、楚襄王先后来过，否则，宋玉著名的两赋就成了望空捕影之作。流传得这么广远的文章，最起码在大人物的行迹方面杜撰不得。

公元25年，蜀将公孙述在白帝城跃马称帝，虽然只风光了10年，也算个像样的人物。百多年后，刘备、诸葛亮又上了这一座似乎不宜于称帝的白帝城。

宋徽宗来过没有？闹不清楚。当时是重修过巫山神女庙，他赐号“逼真观”，封神女为“妙用真人”。大人物考据问题自辟蹊径，这“妙用”二字从何解释呢？也是个谜。

1958年，毛泽东来过；1980年，邓小平也来过。

不同时代的伟人们航行在同一条水道上，彼此的襟怀也大相径庭。楚王父子梦见的是更向荒唐演大荒的“云雨”私会，襟怀云水的当代伟人梦见的是人民事业堂皇的前景：

……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指的正是行将到来的三峡工程。自从2300年前筑长城以来，这是中国土地上规模最大、构建最为复杂的一项工程，有人称作“超世界水平的巨型工程”。同属大人物，梦的差距这样悬殊，这是时代前行的足音，也是历史拉开的跨度，不仅仅属于山水沧桑、岁月之旅赋予人间的某一心态。

浩大工程行将上马，三峡绝景无以冰驻。水位大幅度提高之日，三峡委蛇磅礴、峻厉庄严、雄、险、幽、奇的景观会自行消失，长江水狂放、激切、无从羁縻的波浪会自行收敛、稍息静化。涪陵白鹤梁的枯水石刻，丰都“鬼城”，忠县石宝寨，云阳张飞庙，奉节的锁江石柱、古栈道、八卦图，秭归的屈原祠将统统下沉江底，不可能重睹天日。高高在上的白帝城将成为湖中孤岛，卓然凌空的“神女”固然“无恙”，而降低高程之后，当年飘浮白云之处会清波涟漪，游弋的行舟取代了悠悠云絮。文物伴鱼虾，万象化清波，清凌凌的湖水里会贮藏多少曾经在尘世间享有盛誉的画面哟！别的姑且不论，诗画一体，水府里收藏的真是诗圣杜甫浪墨写播式的“画图”，就非常地迷

人心神：

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鹤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

——宿江边阁

雷声忽送千峰雨，

花气浑如百合香。

——即事

返照入江翻石壁，

归云拥树失山村。

——返照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登高

高江急峡雷霆斗，

古木苍藤日月昏。

——白帝

西南万壑注，劲敌两岸开；

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

——瞿塘怀古

五更鼓角声悲壮，

三峡星河影动摇。

——夔阁

到过三峡的众多的诗人里，杜甫的作品最多，写得也最好。杜甫在下世的前两年栖居夔州。坎坷一生，飘泊一世，作为诗海里的一只“沙鸥”，到这儿才觅得了自个儿的真正“归宿”。这位以整个生命慷慨投入的伟大诗人，与三峡的高山大水、人文历史实行了最美满的一次“结缘”。诗人在这里绘制的以悲凉气质为精髓的最珍奇的精品，将在“水晶宫”里深深的珍藏。日后的科技即使发达到可潜水旅游的时代，只恐怕也无缘欣赏如此瑰丽的画面了。

竣工后的高峡平湖，要贮存393亿立方米的水，浑涵汪洋，千汇万状，浩淼的大水势必焕发出自有的特色。仔细想去，尘世上一切美丽图画、美好灵魂的有机组织不是别的，正是水。水汽淋漓，烟波无限，“黄金难买水中色”，舟里游人会默默地凝视水下，寻觅三峡，像是在寻觅迢迢夜空中那璀璨而迷离的星辰……

（责任编辑：刘家驹）

# 叶利钦、海部、贝克……和

她带着未抹净的血痕，手捧着两盒已烂糊一团的蛋糕，忍着伤痛，急匆匆推开了外交部礼宾司的一间办公室。

面对来客，在外交场合一向沉稳的宁处长，也露出惊异莫名的神色：“晓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 血染的辉煌

这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前的一日。叶利钦总统在北京期间将举行规模盛大的记者招待会。为了使这次“世界级”的新闻发布会，能

在香格里拉饭店举办，黄小姐已策划奔走了多日，外交部的礼宾司、新闻司、地区业务司、北京电信局、俄罗斯驻华机构……道道关口，一路踉跄，今天下午与外交部宁处长的约见，将最后一锤定音。

偏偏天有不测风云，当外交部已在遥望之中时，黄晓京乘坐的出租车，为避让对面来车，撞伤了一位少女，又与路边的大树顶了牛。被撞的少女失去了美丽的明眸，而黄晓京，也由于那突如其来的强烈撞击，鼻骨骨折，脑部轻度震荡，浑身多处擦破，血迹斑斑。但与少女相比，她算“幸运”多了。

昏昏沉沉中的她，与被撞的少女一起抬上了辆临时被拦截的汽车，准备送往附近的医院急救。

黄晓京在人们的搬抬中清醒过来，只觉得脸上和浑身疼痛灼人，头部像压着铅块。突然，一个强烈的意念从脑海闪现：我的使命——叶利钦总统的新闻发布会。

多日的不懈努力，不就是为了那一日的辉煌吗？此刻距成功已咫尺之遥，怎能让其失之交臂呢？不行，我不能上医院，不能误了三点整的约见时间。她边想边挣扎着爬出汽车，跌跌撞撞地朝外交部赶去。

宁处长得知了事情的原委，再望望眼前这位“挂着彩”的小姐，不禁生出对她这种使命在身伤痛俱忘的敬业精神的钦佩。给她一个渴求已久的喜讯，将是此刻抚慰她伤痛



# “香格里拉”的公关小姐

刘东平

的一贴最佳药剂。

被黄晓京行为感染着的宁处长说：“晓京，今晚的新闻发布会，原已订在钓鱼台芳菲园举行。但现在我们决定，用足够的理由说服俄罗斯一方，将地点改在‘香格里拉’。”

黄晓京数日奔波的苦辣酸甜，全没在微微的笑靥之中。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香格里拉饭店的灯火格外璀璨辉煌。这位世界瞩目的外国首脑，踏进这中国一流饭店的殿堂，在香格里拉的荣誉日志上，又增添了一笔有历史意义的记载。

## 一样的微笑 一样的执著

黄晓京到香格里拉饭店仅一年之间，经她运筹奔波，先后把三位外国首脑拉到香格里拉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不仅使香格里拉的名字，在新闻传播中数度成为“亮点”，而且在首都饭店行业中，引起轰动。她亦因此连升三级，成为这家合资饭店销售部的第一位中国籍女经理。

作为一位军队高级干部女儿的黄晓京，自幼受到的是严格的军队规范，形成了自立、好强、争胜的性格。这一切，与她如今从事的饭店公关业务，似乎相去甚远。她那时的确也未曾想到，生活的步履有朝一日会跨到公关小姐的行列。

16岁，还是多梦的年龄，她被



△俄罗斯总统进入香格里拉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录选，成了一名空中小姐，一飞就是四五年。在空中，她用自己真诚的微笑，热情周到的服务，感染了每一位乘客；也训练出端庄典雅的东方小姐的礼仪举止。

后来，黄晓京调到国家旅游局，从事会计工作。可不安分的她，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兼做导游小姐，使当空姐时打的英语底子，得到巩固和提高，同时练就了滔滔不绝的演说口才与奔走耐力。

1987年，取得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经济管理专业的文凭，出任北京国际饭店的商务经理，并在这里获得了经济师资格。然而如

此循序而来的社会承认、大大小小的成就，在黄晓京爱追求卓越的躁动心灵中，总觉得太平淡、太不过瘾了。她隐隐地感到，她具备从事更富有魅力、更能实现自我的潜能。

她“跳槽”了，跳进了京城西郊的合资豪华饭店——香格里拉，操练“公关”。

才华大展的黄晓京，到“香格里拉”后的几番拼搏，几度殊荣，才是最令她情为之摇，心为之系的。

## 领先一步， 邀来海潮

1991年初夏的一个夜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了日

本首相海部俊树将于8月12日访华的消息。这条信息像一股电流，触动了黄晓京敏感的职业神经。

那一晚，她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各国首脑来访，总要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这种场合，是传播媒体追踪的热点。而新闻发布会的处所，将伴随着热点的传播，大大增加其知名度。所以她满脑子里转的，都是如何使海部首相的新闻发布会，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的谋略和行动方案。

第二天清晨，她便出击第一个目标——外交部。在礼宾司、新闻司，她口若悬河地陈述了“香格里拉”能够胜任接待日本首相的充分理由：“香格里拉”是五星级国际型饭店，拥有一流的设施和服务，饭店的通信设备具有国际水准，保安措施严密；交通顺畅无阻……

“最重要的是，我们已成功地接待过美国总统布什、前苏联国家元首戈尔巴乔夫，并赢得了他们的高度评价。”

黄晓京娓娓陈词，文雅热情，给外交部的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一国首脑的接待非同小可，必须慎之又慎，他们仍不动声色地使用着外交辞令：“黄小姐的意思我们完全清楚了，但这件事不仅仅取决于中方，必须得到日本驻华使馆的首肯，才能最后定夺。”

黄晓京丝毫不放松地顺言而进：“我个人对本饭店的赞誉之词，可以不足为凭，但请外交部代我们饭店，邀约日本大使馆的关键人物，同您们一道参观本饭店，由您们和日本以自己的判断力来下结论。”

第一步迈出之后，黄晓京的“公关”攻势未减，礼宾司、新闻司、地区业务司，她一关关地“攻”，以至于外交部传达室的大爷都认识她了，称她为“香格里拉”小姐。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负责此事的关键人物，亚洲司那位表面滴水不漏的吴先生，也在幕后对黄晓京鼎力相助。他迅速帮她接通了与日

本大使馆的联系，并同日使馆要员一道参观访问了香格里拉饭店。

这座豪华饭店的硬件和软件的确堪称一流，令外交部和日使馆官员心悦诚服，随即拍板定案。

在此之后，北京另几家著名的大饭店才陆续登门外交部。公关者的热情诚恳总是那样动人，可谦和严谨的吴先生，不得不再度使用起外交辞令，你们迟了一步，“香格里拉”小姐早闪电般地捷足先登了。

8月12日晚，日本首相海部带着温文尔雅的微笑，踱入香格里拉饭店。

红地毯两侧，中外记者们的录音麦克风照相机，紧紧追随、包围着海部首相。入席之后，海部首相对记者有问必答，谈笑风生。

这一令世界关注的访问的声、像信息，很快随着现代通信网络，传向世界各个角落。五大洲不同肤色的消息收视者们，由此得以目睹“香格里拉”的殿堂。

## 融入香格里拉 忘了自己

几度成功之后，黄晓京引起了  
▽海部在香格里拉新闻发布会上



人们的关注。当来访者一睹她那端庄淑女的风韵，总不免提出公关诀窍同美女优势关系的问题。

黄晓京并不介意行外人将事情看得过于简单，她内心最清楚：在竞争激烈的公关领域闯荡，没有高度的自信心和全身心的投入，靠美女效应，根本无法立足。

干饭店行业，尤其是高档饭店，哪家不瞄准世界风云人物和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国家元首，争得你死我活，以求提高自个饭店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声誉。

黄晓京很自信，喜欢承担诱惑力大难度更高的公关项目。她自信能在众多的追逐者中，出色地获得猎物，她果然成功了。

一融入“香格里拉”，黄晓京就倾其所能，奉献自己。她每天工作大都超过10小时，回到家中，倒在沙发里就再不想起来。早年新婚燕尔，她同她那军乐团出色指挥家的丈夫，也曾有过甜蜜得“月朦胧，鸟朦胧”的温馨时光。可如今丈夫眼中的她，总是一天奔波后的神色疲惫，偶尔一句“你越来越没女人味儿”的调侃，会让她深深内疚，但第二天一上



班，工作又溢满了她的脑子。

说起10岁的女儿，黄晓京脸上掠过一丝难掩的酸楚。每晚他回到家中，女儿已经熟睡。只有清晨那一声匆匆道别，她才得以对女儿的小脸端详一眼。女儿的课余时间，大都是家庭教师陪她度过的。偶尔一次她能和女儿共进晚餐，女儿竟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一般惊喜。晓京说：我能给女儿做的太少了，但我希望给她留下一种精神，积极向上、奋斗追求的精神。

“我太职业化了，无论何时何地都下意识推销‘香格里拉’。甚至把自己同‘香格里拉’融为一体。为了不忘自己的职业形象，我在服饰装束上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富有浪漫情调的、色彩艳丽的衣裙束之橱柜，总穿那几套庄重雅观的西服套装，连发型也不能多有变化，以便给客户端庄大方可信赖的印象，并始终如一地记得你。”

## 迟来的新闻 发布会

在海部的新闻发布会后，英国首相梅杰、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又

相继光临“香格里拉”。外交部何以一再向“香格里拉”倾斜？行业内不免啧有烦言。

其实道理很简单：“香格里拉”过硬的素质，黄晓京的出色公关，在外交官们的心目中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而数次成功的接待，以及外国首脑的高度评价，使“香格里拉”创下了新闻发布会的名牌效应。

1991年11月中旬，当美国国务卿贝克来华访问时，黄晓京再次将新闻发布会的场所，争取到了“香格里拉”。

前期的联络接洽工作已就绪，紧接着，腾房间、租电话线路、安装电缆，一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突然，一道通知：贝克的记者招待会延期。中外记者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有的去探听虚实奥秘，有人则失望地乘预定飞机走了。

而为此辛苦忙碌了多日的香格里拉人更是如坐针毡。

人们怎知，此时贝克国务卿正与钱其琛外长在钓鱼台紧张会谈，时间早已超出预期计划延续着，不知何时才能结束。这样一来，外交部署原定的安排也打乱了，他们根据时

间紧缩的情况，又拟定了两套方案，或会谈完直驱机场，取消原定的新闻发布会；或到机场后，举行一个简单的、小型的会。

黄晓京不时望望窗外那条通往香格里拉的大道，又紧盯身边那部沉默不语的电话机焦虑着。终于，一个念头在脑海中形成：得主动出击。于是她迅速拨通了美国驻中国使馆新闻中心的电话。

当她探听到新闻中心对贝克国务卿新的安排意向时，内心的焦躁、急恼、失落一股股往上翻，但她马上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心想：不能轻易退让、放弃，要据理力争。

黄晓京再次向美方新闻官员申述了香格里拉的充分准备和周密安排，最后又针对美方的顾虑强调：从国宾馆到机场，过香格里拉并不绕道。请定夺。

对方并未直接回答 Yes 或 No，只是请黄小姐耐心等待。

傍晚6时，悄然静待中的“香格里拉”忽然喧闹起来，那些黄头发、黑头发的新闻记者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个个神色匆匆地忙着抢占有利地形，架设照像器材，全副武装的保安人员也沿通道的红地毯一直排到门口，威风凛凛。

片刻，身材颀长的贝克国务卿在人群前呼后拥下，不疾不缓地走入香格里拉流光溢彩的大厅。

为了这迟来的新闻发布会，黄晓京已几夜未成眠，今天，又在大厅守候了一整天，双腿早麻木了。

贝克一行临离开中国时，特意给饭店总经理写来感谢信。信中说：我们在北京期间，贵饭店为美国代表团成员提供了很大帮助，对此我们深表谢意！香格里拉饭店是北京非常出色的饭店，我的代表团告诉我，你们的服务水准是一流的。

（责任编辑：刘家驹）



# 中緬军队 联合攻打 金三角

这是我军历史上同外军一起联合打击国民党残部的丛林作战，史称“中緬边境勘界警卫作战”。

国民党13兵团司令官李弥，在徐蚌会战中全军覆没，只身逃到上海。事后不久，蒋介石又东拼西凑，重新组建了一个第8军，下辖第3师、42师、170师、237师和教导师，委任李弥为第13兵团司令官兼第8军军长。在蒋介石的策划下，李弥仗着他是云南人，拖着残兵败将开到云南，并和余程万的第26军组成第六编练部，准备把云南作为反共的大本营。

处于惊恐中的蒋介石把赌注全押在云南。他知道卢汉靠不住，只好紧紧抓住李弥这张王牌。1949年12月3日，蒋介石在成都北校场“中央军校”的黄埔楼密见从昆明飞来的李弥，面授机宜，要他“把云南变成坚实反共基地，把共军抵御在云南之外。”会见后，蒋介石叫来顾祝同，要他全力保障云南所需的枪弹、物资。

1950年1月，蒋介石的美梦远未做完，李弥的第8军和余程万的第26军等蒋军主力就被我陈赓兵团和在云南省主席卢汉将军起义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歼灭3万多人。新第8军709团李国辉残敌600余人，逃往缅甸北部大其力以北地区；第26军278团罗伯刚残敌800余人逃往缅甸北部邦桑以南地区；西双版纳的地霸武装张伟成、蒙宝山等500余人逃到缅北景栋东北三岛地区。三股流寇武装相互勾结，形成一股反动势力，抓住解放军不能越境作战的特点，肆意窜扰云南边境，还时常袭击当地政府和群众，严重威胁两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1950年9月5日，又一次在廖蔚文策划，并派他亲赴缅甸招募土匪，收编地霸武装、土匪和少数叛乱分子，组建“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李弥任总指挥，直属台湾“国防部”领导。

半年多时间，这伙散兵游勇发展到近1万人，一直盘据在缅甸境内号称“金三角”的孟帕了一带。他们乘中国人民全力进行抗美援朝、剿匪和土地改革以及边防工作尚未全面展开之机，先后14次对云南边境实施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武装窜犯，企图进占云南沧源、西盟、募乃等县，建立“反共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13军、14军分别多次组织力量进行围剿。1952年2月，蒋介石又空运军官、特务700余人，以加强金三角残匪反攻大陆的活动。李弥还派国民党中央“第二行政专员”廖蔚文领着特务经常窜扰我云南边境地区，挑动民事纠纷，煽动边境旧势力敌视人民政府，制造暴乱。缅甸政府和人民虽经多次围剿清退，但由于地形复杂，山高林深，未能达到全歼目的。到1953年1月，逃缅残军已发展到1850人，编为1个总部、1个指挥所、3个军区、4个师、16个纵队。

蒋介石对金三角“反共救国军”的活动大加赞赏，并寄予厚望。1954年6月10日深夜，他在台北第三次

召见专程从泰国赶来的李弥，指示李弥无论如何要经营好“金三角”这块复兴基地，并派过去曾任蒋介石侍卫官、原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到“金三角”组织部队，而且还让他担任逃缅部队的副总指挥。1959年伊始，李弥和柳元麟在台湾当局的指使下，就如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区的土匪暴乱拟制了专门计划。

1960年7月，蒋介石又向“金三角”空运了一支400人的战斗骨干，带去大批武器装备，以加强李弥、柳元麟的势力。此时盘据在“金三角”的残匪通过整编扩充，已编成5个军、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和1个西盟军区。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这一敌情非常重视。5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昆明军区呈送的内参件上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指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应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员去各地调查调查，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虎大意；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具体落实。

在一次晚饭后，毛泽东走出菊香书屋，叫秘书请来周恩来总理和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边散步边磋商。5月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标，作出了关于边防对敌斗争的部署，并派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率指挥组汇集云南，自此，揭开了中緬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的序幕。

中緬两国边界是清朝时期划定的。新中国成立后，中緬两国一直遵守着历史形成的国界线，和平共处睦邻友好。陈毅副总理访緬时，曾留下美好的诗句：“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友谊永长存，共饮一江水。”

1954年12月29日，緬甸总理



吴努在雅加达茂物五国总理会议上，抵制了一些大国的干扰排斥，坚决邀请中国参加由联合国发起的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召开的“亚非会议”。他向会议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参加，缅甸将不参加会议。因为没有中国，亚洲在国际舞台上就不会发挥多大作用。”

1960年1月，缅甸总理吴努访华。1月28日，中国周恩来总理，缅甸吴努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定了《中缅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和《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按协定，中缅成立了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由驻缅大使姚仲明担任首席代表，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少将担任首席顾问。缅方由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准将担任首席代表，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担任首席顾问。

1960年6月，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会议。会议讨论了边界安全等问题。

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周恩来总理和吴努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60年中国国庆之日，又签署了正式划定中缅两国边界线的条约。

可当时李弥、柳元麟残部在边境不断进行的骚扰破坏活动，不仅使边境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危害，而且使中缅勘界受到严重影响。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于1960年11月4日在中国昆明市召开联合会议。会议根据中缅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专门商讨了如何保障边界勘测的安全警卫问题。这次会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跨越国界，进入缅甸20公里范围内清剿国民党残匪。会上，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和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将军联合签署了《捕歼蒋残匪协议》和《联合作战命令》，缅方还派出苏敏昂少校作为山友准将的特派代表到西双版纳的中方指挥部，作中缅联合作战联络员。

1960年11月，驻扎在中缅边境的中方陆军第13军39师和云南省军区的部分边防部队，共5个团和1个营兵力向边境集结，并在云南勐海县成立了前线指挥所，由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黎锡福、陆军13军副军长崔建功分任正副指挥。

为确保这次联合作战万无一失，缅方昂季将军在战斗打响之前，又率缅甸军事代表团飞抵昆明，同昆明军区领导就联合作战的具体问

题和一些事项作最后一次安排。

1960年11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在中缅边界的中国勐遮以西至中国南腊河与澜沧江交汇处的地段上作好出击准备。

按作战协议，一、中方军队在追击时，纵深不能超越缅境20公里。二、中方军队作战路线为由北向南，主要围剿柳部第1、4军部，2、3、5、6师师部及所属的8个团和8个行动小组。这些部队共占有22个据点。

1960年11月22日凌晨，我军突然跨越国境线。边防9团、10团，于当日5时，顺利到达指定位置，重点负责围剿盘据在曼俄仍、哥巴卡等据点的残匪等5师师部和第4团。由于地形复杂，敌军凭借天然障碍，拼命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我边防9团7连战士金静端被国民党军第5师师长李泰打伤后，强忍伤痛，猛冲上去将其击毙。而后，我军勇追穷寇，使儿处据点的残敌无一漏网。

23日早晨，我步117团、118和116团的一个营，采取多路进攻、分片围歼的战术对困守在孟马的残匪第4军军部、第1军军部，6师师部以及踏板据点的残匪2师师部，7团团部进行猛烈进攻。由于此役作

战方针正确，前线指挥得当，进剿官兵英勇善战，打得残匪抱头鼠窜。一天激战，歼灭敌人大部，占领全部残敌据点。毙敌2师少将师长蒙宝山、上校副师长蒙显，3师上校师长李光芳。活捉3师上校副师长叶文强等师、团军官和下级军官1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首次围剿取得成功。

第一天战果辉煌，不仅占领了敌1军、4军军部，2师、3师、5师师部，还歼灭了柳军大半有生力量。但就在我军奋勇追击之时，前方部队已抵达20公里“红线”。我军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绝不跨出“红线”一步。于是，在缅甸20公里范围以内驻扎下来，转入清剿。在“红线”内清剿，罗瑞卿总参谋长多次传达周恩来总理指标：要爱护缅甸人民，遵守群众纪律。我军严格按上级指示精神办事，得到了盟军和缅甸人民的拥戴。

本来，我军进至“红线”的任务是驻扎下来，警卫勘界竖桩。但就在一个月后，出现了新情况。

担任围剿柳元麟残部第2军、第3军的缅甸国防军，与国民党军交战20多天，进展不大。在蒋介石“避中击缅”的电令下，缅军与残匪激战相持，打得十分艰苦。危难之际，总指挥山友将军通过他的特派代表苏敏昂，请求我军越过“红线”携手作战。缅甸国防部以及缅北军区司令部也先后传来正式请求电。对此，昆明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在周恩来总理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同意盟军的请求后又作了重要指示。

接到中央、中央军委的回电，昆明军区立即命令西双版纳前线指挥部，连夜研究作战方案。我步兵117团、118团和边防10团、11团，于1月25日和26日先后向巴西里、叭坎亮、索水、南昆等据点挥戈前进，最后直指孟帕了匪军总司令部。

孟帕了，是“金三角”腹地的一

个村镇，人口不到5000人。柳元麟之所以选中这里作总指挥部，是因为这里是战略要地。它处于老挝、泰国、缅甸三国交界处。当地人把这里称为“鸡鸣三国”。从军事上讲，这里地势险要，各种石洞纵横，山回水曲，盘桓交错，易守难攻。从经济上讲，这里正处在澜沧江下游的湄公河畔，熟地膏腴。国民党残匪在这里苦心经营近10年，招兵买马，聚草积粮，深闭固拒。柳元麟扬言：枪弹充足，粮草丰厚，可打10年不成问题。在泰国、缅甸、老挝都有他重金收买的“线人”，情报灵通。加上台湾当局背后指使，因此，柳元麟对中缅联军的围剿没当回事。

1960年11月22日21点40分，柳元麟接到他的第1师、第4师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的消息时，正在同他的姘头、“反共志愿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局长沙虹寻欢作乐。一阵惊恐过后，很快恢复平静。他们认为：凭借天险和坚固防御工事，共军一两年内是打不进来的。为抵抗联军，他叫沙虹通知各军长官到总部开布防会。接着他亲自到前线督战。

这些情况我军了解得一清二楚。崔建功副军长带参谋人员到一线勘察地形，拟制战斗方案。经反复论证，报昆明军区批准，仍然采取“小群多路分片战斗”的战术，在300公里正面、100公里纵深地区，以6000兵力分8路向敌发起进攻。我军第一梯队主力排除险难，进至芜新一带时，柳元麟还不相信，一直以为是与缅军作战。当沙虹摸清确实是人民解放军时，柳元麟吓得面如土色。为逃命，大量金银财宝、武器弹药、文件密码和各种装备及鸦片都未带走。我军还在距柳部100多公里的南塔一带，如惊弓之鸟的柳元麟就率总部和第2军军部乘橡皮舟从湄公河（澜沧江）窜入老挝境地。我军只好在湄公河畔停止了追击。

这时，和缅军抵抗的国民党残敌第3军、第5军的主力听到柳元麟逃跑的消息，第3军军长李文焕、第5军军长段希文也丢盔卸甲，率部分残匪往老挝、泰国的丛山密林中逃命。缅军也迫于国界没有继续追击。

中缅联军就地清扫战场。

我军在完成工作后，进入缅甸参战部队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于1961年2月29日胜利班师。

这次越境作战，近3个月时间，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金三角”那一线牵魂的美梦。李弥、柳元麟苦心经营的巢穴被中缅联军一举清除。

1961年8月，一直坐镇泰国曼谷指挥的李弥接到蒋介石回招命令。同年11月，柳元麟也不得不收兵返台。而漏网的李文焕和段希文后来成为“金三角”的贩毒巨头，与台湾脱离了关系。

至此，多年来，分布在3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30多万缅甸人民受尽残匪欺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中缅勘界竖桩工作如期顺利完成。

我军这次越境作战，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都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也更加深厚和巩固。

今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缅边界的瑞丽、畹町、姐告等国家一级开放口岸的贸易交往也不断增加。被称为内陆“沙头角”的姐告，宏伟壮丽的“中缅一条街”正拔地而起。

畹町桥头，在周恩来总理当年访缅归来栽下的那茂密的茶花树下，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领导说：随着中缅两国经济交往的繁荣，几年后，这里的宝石、翡翠、玉石、柚木及各种矿产将会吸引各国的经济界人士和商人光顾。在新的时期，中缅两国人民又将成为亲密的贸易伙伴。（责任编辑：仲文）

# 分界于 截肢与不截肢的报告

● 王浩然



△张兴惠

读者目睹过当今世界称为“二号癌”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病——贝格尔氏病吗？得此病，必截肢！截一段不愈，再截，直至大腿根肛门边；然后又从另一条腿，一段段截到根，再延到上肢，一段段截，直至患者变成……“肉蛋”，走向死亡。

治“奇病怪症术精”的明朝大医学家陈实功在其著《外科正宗》一书中无奈地写道：“患此病者百人百不治也。”

那位欧罗巴先人——贝格尔倒想治，那就是：截。医学因此记载了“贝格尔氏病”。

1990年，新华社济南4月22日电：一直被医学界视为疑难病症的脉管炎，如今已被中国专家攻克。山东济宁市脉管炎医院张兴惠大夫研创的中西医结合的新疗法，可为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脉管炎患者提供一个具有奇效的良方。（几天后，国内外130多家报刊杂志相继转载了这条消息。）

对此，省科委曾邀请国内十几名医学界专家、权威，对1986年列入山东省“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新法治疗脉管炎疗效研究”课题进行鉴定。

严谨的科学经专家审慎地科学之眼通过了省级鉴定：新法治疗200例患者，临床治愈196例，治愈率达98%，总有效率100%。新法疗效显著，治愈率高，不截肢，栓塞的血管重新复通，消失的脉搏重新恢复，无复发，具有创新性。

1 张兴惠1938年出生时，奶奶被日寇活活烧死。娘抱着他藏在微山湖大苇荡里躲避杀戮。他像被晒干在滩上的小鱼，童年的世界就是饥饿疾病。哥哥、姐姐、弟弟连饥带病都

和渴望！在部队他样样出色，鱼雷、水雷、深水炸弹的性能他了如指掌。调机电部门工作后，内燃机、电动机业务又很拔尖，防化学业务比武，他戴防毒面具只用0.5秒，是全军第一，受到海军青岛基地司令部通令



死了。

5岁那年，本村族兄张兴昌得了一种极可怕的病：双足乌黑溃烂，趾骨脱落，袒露的白骨挂着烂肉，他夜夜狼般的嚎叫，整个村好似蒙上一层鬼气。乡亲们顿悟出：脱骨疔（脉管炎），是阴病，鬼治的！

村里老族长咬咬牙：“趁他还有气，埋！要不气一断，疔毒会飞出，飞到谁身上，就会着住谁！”30岁的张兴昌被活活钉进棺材，也深深钉进张兴惠少年的记忆里。

1955年，张兴惠登上了苏军波罗的海舰队三年前送来的扫雷舰。他觉得大舰、大海满载了他的赤诚

嘉奖。组织定他为入党提干的苗子。他感到前程就像这艘劈浪的舰，天天快活极了！

命真巧，舰上选战位卫生员选上了他。他立志于研究混沌朦胧的怪病有了机会。为补充仅三年课堂学问的空白，他自学完高中课程和大学医学课。为治疗上的辩证施治，他系统地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达尔文的进化论，并精读了《黄帝内经》、《伤寒论》、《药性赋》、《外科正宗》、《解剖学》、《药理学》、《微生物学》等几十种医学和哲学书籍。

海天寥廓。知识的太阳每天从海平线蒸腾出它无比的辉煌。

服役四年探家。他看到刮“五风”给家乡带来的苍凉，他同乡战友马为来家中母亲饿死，弟弟、妹妹饿得爬着出门。学校的老师饿跑了，学校散了……他回到部队，万分激动！他写了：“报纸五谷堆成山，农夫守锅叹饥寒。欲问此事何方有，故土蒿根皆吃完。妖风横扫人黄面，刮暗青天刮黄泉。羊山殒灵会咸丰，心挂老母泪荒田。”

当时部队正开展社教运动，旨在批判“攻击三面红旗”的彭德怀及其有同感的人。马为来精心设计了自己的前途，他在大会上奋起揭发批判了“隐藏在本舰伪装积极反对

贤，说贫下中农要提高阶级觉悟，不能让黑帮治病。

徐清贤只好在医院外面搭窝棚住下，每天等候完批斗的张兴惠来给治疗，张兴惠被抓入监狱，徐被赶回家，他带张兴惠送给他的药和仪器自行治疗。一年后痊愈。

那首诗使张兴惠随着运动的升级，由“三家村”的三反分子升到“5·16”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又开始了坐牢、逃亡，再坐牢、再大逃亡的艰险历程。迫于逼缉杀头，他逃进了东北茫茫林海。过着三年多野人般的生活……

他到底还是被缉捕归案，关进

治疗血管炎的实践。

张兴惠倍受炼狱的折磨。原县领导指示不能支持“释放犯”！张兴惠就带几名徒弟凑材料自己动手盖简易房收治病人。他往河南设医疗点，在黄河大堤上对徒弟说：“咱到了黄河也心不死，要是在河南办不成，下个目标就去北大荒！”在河南，他有钱没钱都治，一百多患者又随他去了山东。

我采访病区后，张兴惠向我表达了他历经二十多年，把中医经络学和巴甫洛夫神经学相结合所创立的病因学：“脉管炎是多原因性损伤性血管植物性神经麻痹”。通俗讲：人的大脑神经不能直接支配血液循环，这是由植物性神经支配的，植物性神经对血管的支配功能消失，血管的收缩和舒张活动就停止，血管腔内的血液失去前进的促进力而停滞，停滞的血液粘稠度增高，血栓就形成堵塞血管，血流不通，致使脚、手因缺血而溃烂坏死，肉腐骨脱，为此，中医称此病为“脱骨疽。”

“脉管炎等类的四肢血管病的发病率在万分之四十。中国约400万患者，世界约有2000万名。铁托、蒋经国皆死于此症。我们医院现有265名职工，300张床位，这远远不够，十年内要发展成1000张床位的大型专科医院，为国内外患者提供住院的方便。”

现在，该医院有住院病人和家庭病床病人一千多人。张兴惠和他的徒弟们累计收治脉管炎及其他四肢血管病患者两万多例，他们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八名患者。另外，美国、日本、泰国、韩国、菲律宾、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患者也纷纷来电来函咨询和要求住院。”

张兴惠领我到病区采访。香港患者曾耀光，于1990年夏患病，经获皇家医学博士学位的私医整治无效，又到伊丽莎白医院、九龙医院，一个月花掉16万港币，反而病情加



三面红旗”的张兴惠。

马为来入党提干了。张兴惠受尽了批判，带着打上黑印记的档案回乡了。

张兴惠被分配到喻屯公社卫生院。他为摸索治疗脉管炎之法，自己设计制作土仪器，用自身试验，灼烫的电流烧伤了腿，药液浸肿了脚，他仍矢志不移，顺人体的脉管和经络探寻一条科学之路。

1966年偶遇患者徐清贤，他用自己的方法试诊。第二天，徐清贤说几年来第一次睡觉安稳了，身上像卸了个大土坯。十几天后，“文革”开始了，他成了黑帮。工作组恐吓徐清

了大牢。

大牢是参悟人生的静园。他在参悟人生中更感到生命的可贵。为了生命的完善，摧残生命的“二号癌”必须攻克！靠记忆和多年治疗的经验，他写下了十几万字的学术笔记。看守和犯人对这位一米八的大汉十分不解：“他这图啥呢？小命都难保，还弄那！”

2 当全国打倒“四人帮”、讨论真理的检验标准的时候，带着褐色印记的张兴惠仍在艰难而顽强地进行

重,脚跟已溃烂。5月份到深圳和广州,医生众口一词——截。

他从香港来到山东济宁脉管炎医院两个月就不痛了。

黑龙江鸡西电厂干部鲁青贵,患静脉炎病20多年,花掉30多万元。他左腿溃烂也见森森白骨,准备截肢前一个月,从《健康报》获知新疗法后急急赶来。一条信息保住了一条腿。

山东阳谷农民黄秀亮,患病7年,双足溃烂生蛆,左脚烂掉1/3,合并败血症,属病危期。妻子领两孩子离家,只等他咽气后再嫁人。经新法治疗两年七个月已痊愈。妻子主动回家,破镜重圆了。

四川患者高立,二等残疾军人。从1978年患病,花医疗费20多万元。失望使他三次自杀未遂。1990年受新法治疗,不但治好病,还结了婚,生了个胖儿子。

内蒙包钢医院主管检验师傅鹏志,从医30多年,见过多少脉管炎截肢的惨景,不曾想灾难竟落到自己头上。手术前两天,他从报上得知还有不截肢的医院,于1988年大年初二由家人急忙护送来。一年多,伤口愈合了,走路同正常人一样。

时间,刚叩开九十年代的大门,就给脉管炎新法的奠基人奉上盛满硕果的花篮。

4月,首都17家国家新闻单位组织一支庞大的记者团,一行22人,专程来济宁对张兴惠采访。

10月,在“首届中国中医药博览会”上,他们接待了国内外一万多名求医问药者,新法治疗脉管炎受到中央、卫生部领导及医学界专家高度赞扬,获“神农杯”优秀奖。

在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济宁市脉管炎医院的展位上,来自各国参加“国际传统医药大会”的医学专家云集在这里,怀着医学家共同的期

待,怀着完美人类生命韵律浓郁的爱,关注着张兴惠的介绍。他身旁是两位治愈的患者,两位从地狱边缘返回人间的工人田锦昌和农民韩广乾,自豪地伸出他们复通了动脉血管、恢复了脉搏正常跳动的脚,任专家们验证。澳大利亚国家卫生部部长戴维·格莱姆触摸了患者田锦昌的足背动脉,那强劲跳动的脉搏使他惊讶,他紧握张兴惠的手说:“贝格尔氏病是个顽症,在西方和澳洲只能截肢,恢复脉搏是不可想象的事。能根治是个奇迹!您的成功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诚挚的邀请这位神医能到澳大利亚设分院。

张兴惠告诉我,他们从小到大发展至今,没向国家要一分钱,现已成为一个拥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700多万元,在北京、济南、大连、青岛、抚顺、威海、广州设有医疗分院的专科医院。他们由国家派干部,自己培养医务人员,自己发展项目创收。

张兴惠在为攻克世界疑顽症探路时,他拥有知识,也拥有贫穷。1978年他彻底平反,到公社卫生院,得不到经济和道义的支持,只得从每月30多元的工资中挤出一些来买配药和制造仪器的原材料。自己每天二毛菜金,天天吃咸菜疙瘩。一次,省内外40多名患者慕名而来,医院不配合,他们把12名病人拉到农村,借大队和邻居的房子安顿他们。

直到1986年,省卫生厅的科委的领导对张兴惠治疗的30例病人进行考察,发现有效率100%!正式列入省“七五”重点攻关项目,济宁市郊区政府正式批准成立脉管炎医院,情况才有好转。

——根据脉管炎病人治疗时间长特点,他们独创了“家庭式病房”。在生机勃勃的病区,我采访了一个个“家庭式病房”,“每户”粮油炉灶等生活设施样样齐全,吃、住方便,像在自己家一样,病人和亲属都

有了安定感;有的是病轻或基本痊愈的农村病人和无亲属陪同的重病人组成“家庭”,轻的照顾重的,由医院发给工资。逢年过节,医院都拿出一千多元给他们买副食,送去一片温暖。

——受过苦的人最富同情心;治病救人的医生的同情心更为高尚。多年来,他们为贫困病人免费治疗数额惊人,仅1991年就免收灾区和农村贫困病人的医药费300多万元。

4月,张兴惠的坚强支持者,同他一样超过一米八的山东硬汉、济宁市科委主任肖嘉善迈入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殿堂。日内瓦,由联合国卫生组织主办的“第二十届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展览会”上,在有1300个参展项目的激烈角逐中,他们获得了铜牌奖!

10月,张兴惠应邀参加了“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国际发明家协会主席莫萨先生亲临他们的展台,并提词留念。短短几天,国内有12家医疗单位协商与张兴惠搞联合。经专家评定,新法治疗脉管炎又获得银牌奖!

11月,他们参加了在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92中日医学科技博览会”。张兴惠接待了成千上万名中外参观者,最感兴趣的日本医学代表团得知新疗法能彻底治愈脉管炎时,惊叹不已,称这是世界奇迹。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特意来到济宁脉管炎医院展台前咨询:“脉管炎这病我了解。你们新法能不截肢吗?”张兴惠答道:“新法不仅不用截肢,而且还可以使栓塞的血管复通。”李铁映听后连声称赞:“很好!很好!”这次博览会,他们荣获“博毅杯”奖。

中央电视台为他拍了专题片,一部纪实广播剧早已传遍大街小巷……

(责任编辑:刘家驹)



△1954年初，几个青年友人摄于北京。左起：陈敏凡、汪明、张自箴、罗坚、田庄、蔡亮、杜高

# 「小家族」冤案二十年

·杜高

我面前摆着一本《吴祖光悲欢曲》。（《吴祖光悲欢曲》，许国荣、张治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五十年代轰动文艺界的“小家族反动集团”冤案的真相，真实地描述了划进这个集团的几个青年的面貌。扉页上一张五十年代的小照片，七个青年朋友亲密地靠在一起，他们的名字是：陈敏凡、汪明、张自箴、罗坚、田庄、蔡亮、杜高。此外，“小家族”还有杜鸣心和陶冶。

我望着旧照，从沉思中寻觅我们的被毁灭的青春……

我和蔡亮相识是1950年夏天，在长辛店铁路工厂。

那一年，他18岁，我20岁。那是一个热情的年代，新中国诞生不满一年，人民对共产党充满热爱和希望，中国大地一片蓬勃景象。青年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工厂和工农结合，歌颂新时代。我那时是文工团的创作员，到长辛店工厂写剧本；蔡亮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到工厂学习锻炼。我们相识后，很快成了好朋友。

蔡亮和他的男女同学们每天高兴地在车间帮着干零活，给工人们读报，办墙报，为工人们画像和画劳动场景的速写。他们给车间带来了欢乐气氛，很受工人们的欢迎。

蔡亮和我在食堂同桌吃饭，经常交谈。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经济管理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娴静善良的知识女性。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一家到了重庆，那里的抗战环境和进步文艺对幼年蔡亮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唤起了他对艺术的热爱。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上海。这时父母发现了孩子的绘画天赋，于是把他送到刚从重庆迁回上海的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艺术学校”学画。

1950年春，“育才”推荐刚满17岁的蔡亮报考中央美院。但他赶到北京时报名日期已过，眼看美好的愿望将化作泡影，少年蔡亮焦急万





分。这时他遇见了老同学周光玠，他是徐悲鸿在艺专时的学生。周光玠对蔡亮说：“你的这个情况只有一个办法，请徐院长看看你的画。我带你去见徐先生。”去见徐悲鸿？蔡亮吃了一惊。他觉得这位大师离自己太遥远了。周光玠给他鼓气：“不要紧张，徐先生平易近人，从不把学生拒之门外。”就这样，在一个温暖的春夜，蔡亮由热心的周光玠带领着，走进了东寿禄街16号徐先生的寓所。

这是北京的一个旧四合院。院子里野草丛生，几近荒芜。客厅里陈设简朴，家具古旧。墙上挂的字画和一张徐先生的自画像吸引了蔡亮的注意，但此刻他没有心情细细欣赏。徐先生走进客厅，周光玠介绍了蔡亮。听说蔡亮是“育才”的学生，专程从上海来报考，徐先生很关心，便接过蔡亮带去的厚厚一叠素描、速写，坐到桌旁一张张翻看起来。当徐先生看完了最后一张，抬起头来看看

蔡亮，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用平静的语调对蔡亮说：“你考取了。”

蔡亮就这样跨进了中央美院的大门。他永远怀念这一个温暖的北京的春夜，他的艺术生涯的起点。

那年12月，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到朝鲜战场。两年后我回到北京，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的宿舍在东单北极阁头条胡同，横隔一条大街便是帅府园中央美院。这时蔡亮常到我的宿舍来，在我这里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一个是汪明。

汪明解放前曾自告奋勇洒水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也拍电影。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汪明和我是朝鲜战场上的亲密战友。我们曾一同爬山越岭夜行军，一同在猫耳洞里创作剧本，又一同在敌机的空袭中为战士们演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油画)蔡亮 张自慧

戏。我们又一同从朝鲜回国，都是青年艺术剧院的创作员，同住在一个宿舍。

一个是田庄。

田庄是我童年时在欧阳予倩先生主持的广西艺术馆的演剧小伙伴，1947年他在上海戏剧学校毕业后，和几位同学一同到解放区投奔革命。他参与筹建“长影”，随后到北京，在电影局工作。田庄是个才子，有很高的文学天赋。他读书多，过目不忘。田庄心地单纯坦诚，淡泊名利，看重友情。他常常丢下自己正在写的东西，无私地帮助朋友把作品写好。七十年代末，他还热诚地帮助当时的无名青年苏叔阳完成了剧作《丹心谱》。

再一个是罗坚。

罗坚是我们当中的“延安老干部”，前我国驻苏大使刘晓同志的儿子。他和杜鸣心、陶冶都是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抗日战争结束后，





△吴祖光、新风霞夫妇 1963年摄于北京

他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送往延安。进北京后，他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老党员”，虽然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杜鸣心那时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他小时候也是一个流浪儿，陶行知先生从难童中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把他收进育才学校。后来这个流浪儿终于成为引人注目的少年钢琴家，十几岁就举行过演奏会。1953年前后，他到北京学习俄语，准备赴苏留学。杜鸣心事业心很强，他常常沉醉在音乐里，走路的时候也歪着脖子，很有节奏，仿佛在聆听回旋在他心中的旋律。

陶冶是个性格活泼开朗的人，他在育才学校学戏剧表演。他口若悬河，语言风趣，任何场合都不沉默。到北京后，他先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来到文化部做国际文化联络工作。

我们的年龄相近，人生经历相似，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共同的爱好和情趣。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到剧院看新排演的戏，看内部放映的电影，看画展，听音乐会。我们常常到中山公园喝茶，到北海公园划船，在长安街的林荫道上漫步。我们

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梦想，诚挚地交谈。艺术之神使我们这一群青年着了迷。我们讨论读过的书，讲述自己构想的作品，坦露各自心中的爱情秘密；我们鄙视平庸，我们崇拜天才；我们厌恶虚伪，我们赞美纯真。

我记不起“小家族”是怎么叫起来的，把我们叫做“小家族”，是说我们像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还是说我们是一个伟大母亲的一群孩子呢？但我们确实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或者如我面前的这本《吴祖光悲喜剧》里的一个标题称作的：

“一群可爱的青年友人”。

这些朋友对蔡亮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是我们当中的小弟弟，这位美术学院的学生除了在教室里画人体素描以外，还跟随我们走进了辉煌的戏剧世界，迷人的音乐天地，跨入了诗歌的大门。蔡亮开始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他开始懂得，一个具有全面艺术修养的画家才能赋予作品深邃的内涵，使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一个真正的画家，其实是一个用画笔作为工具的诗人和思想家。他愿成为这样的艺术家。

我们还有几位共同熟识的年长的好朋友，大都是我们童年演剧时的兄长和大姐，我们成群结队地到他们家去过春节，度中秋。他们中有著名表演艺术家朱琳，身患残疾的诗人洪道，话剧导演肖屹、喜剧作家王少燕。不幸的是后来他们也被戴上了“小家族之友”的帽子，受到了莫名其妙的牵连。

还有两位我们尊敬的年长的朋友，后来对我们的人生命运发生了特殊重大的影响，一位是路翎，一位是吴祖光。

路翎，这位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囚禁了25年的著名作家，当时也在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住在我的隔壁。他当时大



〈8年后，杜高和蔡亮（左）重逢于北京

约30岁左右,出版了近200万字的作品。他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等,是民主革命时期文学的重要成果之一。路翎是一位以惊人的刻苦精神从事文学劳动的作家,每天从早到晚不停息地写作,他的每一个文学成就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浸透了心血和汗水。他在短短的一年多写完了三部剧作,但都被剧院领导否定。他不争辩,不屈服,用新的作品回答苛刻的批评。他的精神使我感动。路翎为人真诚质朴,生活十分节俭。后来他和汪明一同到了朝鲜前线,在前线表现英勇。回国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新作,遭到了更猛烈的批评。路翎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时肚子饿了,便拉着我和汪明一起到东单的馄饨摊吃夜宵。他的酒量大,一碟花生一盘腊肠,喝完一瓶“二锅头”。只有在这时,他才带着痛苦的神情发泄几句对那些粗暴批评的蔑视和愤慨。

蔡亮在我的宿舍里大概看见过路翎一两次。这位未来的画家当时并没有引起大作家的注意,他们不认识,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吴祖光是我国一位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剧作家,当我在剧团里做小演员时,他已是戏剧界著名的“神童作家”了。他的剧作《风雪夜归人》、《嫦娥奔月》、《捉鬼传》等,都是我喜爱的作品。我认识祖光是从朝鲜回国以后,他那时住在东单栖凤楼,离青艺宿舍很近。他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和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文化气氛浓郁的小院子,吸引了许多文化人来作客。吴祖光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人,除了他的学识和智慧以外,他的性格也极富魅力。他待人平等亲切,仁爱宽厚,同情别人的疾苦。他的谈吐活泼风趣,在他家作客,你不会感到任何拘束,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都一视同仁,他是一个天性自由的艺术家的。他的美丽而又善良的夫人

新风霞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我们遵照中国人的方式亲切而敬慕地叫她“大嫂”。她是评剧院的台柱,每天晚上忙于登台演出,白天在家里练功练唱,但她仍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没有成家的青年朋友。我们喜欢听祖光谈戏剧,喜欢听风霞高歌一曲,也喜欢在他们家吃饭。

蔡亮和祖光还有一层亲戚关系,他叫祖光表舅。

那一年祖光编了一本散文集《艺术的花朵》,收录了他写的十多篇描述梅兰芳、程砚秋、常香玉、新风霞等戏曲表演家的极富文采的散文,每一篇都附有一幅精美的插图,出自名画家张正宇、丁聪、郁风等手笔。祖光特意把写梅兰芳的那一篇留给蔡亮,要他画一幅梅先生《贵妃醉酒》的舞台速写。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从吴祖光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他们没有论资排辈的俗见,信任和扶植无名的青年。不久,《艺术的花朵》出版了。这是蔡亮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我们向他祝贺。这时,田庄一边欣赏着一幅幅插图,一边把蔡亮拉到身边,对他的作品进行评论:“尽管你画的人物很逼真,线条很细腻,但同张正宇、郁风的画摆在一起,便显出了拘谨和呆板,缺乏艺术趣味。”田庄又说,他们的插图潇洒自如,神采飞扬,并不单纯追求逼真,却表现出画家对人物的喜爱和赞美,融进了画家自己的感受,这就达到了一种艺术境界,给读者留下了韵味。

像往常一样,蔡亮虚心地倾听着,细细地咀嚼这番评论中包含的哲理。我们厌恶互相吹捧,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友爱。

不久后的一天,蔡亮兴奋地跑来,把我带到美院画室,让我看他刚完成的一幅新作:《借宿》。他对我说:“你有一次同我讲了一个故事,在朝鲜的山洞里,你睡着了,身旁的一位老战士把你的棉衣补好了。这

个故事引发了我的想象,我把它同藏区的生活联系起来,就构思出了这个画面。”我看到他正处在一种艺术想象的热情中,我为他在艺术上的进步感到高兴。

啊,我们确实是一群做着美梦的大孩子。

我们哪会懂得,青年人的才华往往引来嫉恨。我们更不懂得,有一种“理论”笼罩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它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把人对生活的各样的意愿和追求,统统归纳到两个敌对阶级的争斗,从而可以任意把一个人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这种可怕的理论及其实践,窒息人的一切活泼自由的思想,直到人的纯真的感情。

1955年,政治风暴来临了。以胡风为首的一批革命作家突然变成了一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路翎被逮捕,灾难降到了我的头上。

我被隔离起来,关在路翎被捕时的那间小屋里,交代和他平日接触中的每一句谈话。人们用阶级斗争的锐利眼光注视着我和我的这几个青年朋友,力图再挖掘出一个“小集团”来,并把它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挂上,以证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严峻性。于是,“小家族”被当作一个政治集团的名称揭了出来,我的朋友统统被隔离反省,交代材料。中央美院把蔡亮禁闭起来进行审查,召开大会小会对他展开凶猛的批斗。

我不能申辩,只能彻底否定自己。我批判自己的文艺思想同胡风理论的联系,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自己把个人友谊摆到集体主义之上的小圈子主义、温情主义、自由主义……但我不能承认“小家族”是一个政治集团,更不能承认它是胡风集团的一个“外围组织”。我的朋友从未看见过胡风先生,胡风集团的其他成员我们一个也不认识。

一天深夜，专案组两位同志同我谈话一直到清晨三点。最后向我摊出了一个材料：“你不是说过，将来你们要坐到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吗？这难道不就是你们‘小家族’的政治野心和政治纲领吗？这难道不就是要推翻党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胡风的反革命阴谋吗？”

专案人员走后，我瘫倒在椅子上，呆望着小窗外暗夜的天空，用力回想什么时候曾讲过这么一句话。

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开幕式，我看见徐悲鸿先生坐在主席台上，两天后大会突然宣布，徐先生出席波兰使馆的招待会时突发脑溢血，抢救不及而去世。那些日子悲痛笼罩着美术学院，蔡亮和他的同学们守护在导师的遗体旁，迎送络绎不绝的吊唁者。我深感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我和朋友们互相勉励：“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应当有这个志向。”想不到这句话传了出去，竟变成了“小家族篡党夺权政治野心”的证据！

我被隔离反省一年七个月。到了1956年下半年，由于苏共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引起了国际上的波动，我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小家族”不过是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在一起吃吃喝喝，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

我恢复了自由。我最先见到的是田庄和陈敏凡，他俩在审查结束后结为夫妻，建立了一个小家庭。他们告诉我：

罗坚被批斗后，撤掉了乐队队长职务，下放到贵州。

杜鸣心提前从苏联调回，检查反省。

陶冶经过批斗，留团察看。

汪明的剧作取消演出，行政降级，另行分配工作。

蔡亮开除团籍，取消留校任教资格，发配西安。与他同行的有她的女友张自蕤。

张自蕤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小姑娘。她和蔡亮同年级，年龄却比蔡亮要小两岁。蔡亮曾带她到我的小屋来过一两次。她比我在剧院看到的其他女孩子更显得纯真朴素，短短的头发表，红红的圆脸。她安静地坐在一边听我们聊天，很少插话。蔡亮不断地在我面前赞美自蕤，说她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好，念研究生时就担任了调干生班的助教，已经是一个预备党员了。我猜到他们正恋爱，而且看出我的这个小老弟不但爱慕她，也很敬佩她。但我万万想不到这场政治风暴竟也伤害到这个纯洁而无辜的姑娘。

学院党委把她叫去，问她：“你是要党籍呢，还是要蔡亮？”可怜的姑娘哭泣着向党表白，她热爱党，但她不愿离开蔡亮，蔡亮是好人。于是，她被取消党籍，同蔡亮一起送往西安。

这一对苦难情侣提着一个网兜，背起一个大画夹，凄然告别母校，登上开往西安的火车。有两位同情他们的党员调干生悄悄来到车站为他们送行。蔡亮和自蕤对这两位同学说：“这就算是我们的婚礼！”

听到这里，我也克制不住我的眼泪。在那个阶级斗争凌驾一切的时代，一个柔弱的姑娘竟敢以这种近乎“反叛”的举动来维护坚贞不渝的爱情。我简直不敢想象，她将要蒙受多少屈辱和困苦。我也暗自为蔡亮庆幸，在他未来的艰辛的人生旅途中，能有这样一位忠实的姑娘与他相伴。

不平凡的1957年到来了。上半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其它一些鼓舞人心的讲话，欢迎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文艺界的空气缓和了，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开始回顾反胡风斗争中是否有过火的现象。我记得中国剧协一位负责人在我恢复自由后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

啦，黑夜里开枪，伤了自己人。”中央美院处理蔡亮问题的院长江丰和党委副书记洪波是两位正直的老党员，他们感到了愧疚，认为逼迫蔡亮写的那些不实的材料应当推翻。年初，蔡亮从西安送画到北京时，洪波向他表示了歉意，并嘱他回西安后立即写一个申诉材料寄来美院。

蔡亮的申诉书还没有寄出，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突变。那些在整风会上向党提意见的热心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场规模更大的政治运动激烈地展开了。

美术界揭露了以江丰为首的右派集团。洪波被划为这个集团的成员。

戏剧界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吴祖光。

灾难又一次落到了“小家族”几个青年的头上。

原先挂到胡风那里去的“小家族”的现成材料，现在变成打击吴祖光的有力炮弹。一些沉醉在阶级斗争理论狂想之中的先生们宣布：吴祖光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和黄苗子、丁聪、唐瑜一班文化人搞了个“二流堂”，现在又搞了个“小家族”，这是“二流堂”的第二代，可见资产阶级右派一天也没有忘记培养接班人，准备同共产党进行长期斗争！

于是，一篇篇批判文章气冲牛斗，一个接一个斗争会群情激昂，一行又一行大字标题赫然印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报刊上：“彻底捣毁吴祖光的‘二流堂’、‘小家族’！”“彻底粉碎吴祖光的右派纲领！”“揭穿‘小家族’的反动政治阴谋！”……面对这种发狂的思想斗争和大动干戈的政治运动，我们又一次陷入绝境，只有目瞪口呆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蔡亮，是在团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批判大会上。这是文艺界规模最大的一场批斗，两千多人把礼堂挤得满满的，熟悉与陌生的面孔都鼓起对“阶级敌人”的

强烈愤恨。聚光灯亮起来，新闻纪录片厂正在把这场批判会拍成电影。吴祖光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我坐在台下听取揭发我的罪行的一个个发言。突然，我听到主持人叫蔡亮的名字，我抬起头，他恰好从我身边走过，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了惊慌、痛苦和无奈。他走上台后，有意把话筒往一边推开，用手里捏着的稿纸挡住自己的脸，躲避摄影机镜头。他用低声调照着稿子念，讲了些什么我全没听见，我心想：可怜的小蔡亮呀，你远在西安也没有躲过这场灾难，还是被揪到北京来了……

1958年4月18日一大早，我被叫到文联大楼，在我的右派结论书上签字。接着，一位早在等着我的公安人员把我带到大楼外一辆卡车上。卡车驶进了北京监狱。没有审讯，没有申辩，只在两张纸上用黑油墨印下了我的指纹。我从此与世隔绝，开始了遥遥无期的劳改生涯。

“小家族”重又被人提起是在十年之后。1967年12月的一个寒风呼号的清晨，我在劳改农场扛着铁锹向田野走去时，忽然听见高音喇叭里传来播音员激越的声音，播送着《人民日报》的一篇声讨“二流堂”、“小家族”的革命檄文。我再次惊愕得目瞪口呆了。隔了十年，“小家族”的主帅又由吴祖光换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后台老板竟变成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天哪！我又开始接受一批批不辞辛苦从北京来到农场的外调人员的审问，而现在他们逼我交代的，却是那些当年整我的人是怎样包庇我！

我掉进了一个历史大玩笑里。

最苦的却又是远在西安的蔡亮和自疑。他们戴上了“小家族分子”黑袖章游街示众，他们画自己的“罪行录”展览，他们低头向革命群众请罪。他们的家被抄了，他们的画稿被撕成碎片烧成灰烬，他们刚从牛棚

放出来又被赶到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屋里住。但是他们手中的画笔又不是造反派能代替的，所以又要用他们来画领袖像，制造革命圣地的“红海洋”。可是怎么能戴着黑袖章的反革命分子描绘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呢？于是造反派规定，在作画的时候，他们要摘下黑袖章，画完后再自觉地戴上。张自疑临产前还挺着身子由蔡亮把她扶上脚手架画领袖像。——这就是他们和千万个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里的共同命运。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终于宣告了这个痛苦的年代永远地成为过去。

1979年春，文化部发出文件，为“二流堂”、“小家族”平反。

蔡亮在西安收到中央美院7月24日发出的平反通知，上面写着：“几个青年聚在一起谈论问题不是政治错误。”张自疑恢复了党籍。

回想起来，从我赴朝归来到反胡风运动开始，我和几个朋友的来往不过短短两三年，而我们却用了整整23年来“赎罪”。汪明付出了他的生命，他于1975年死在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里。田庄有幸看到了平反决定，当晚便大量咯血抬进了医院。刚刚回到北京的我和罗坚赶到医院去看他，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重逢竟成了我们的永诀，几天后田庄便辞别了这个世界。

回想起1959年10月，我在监狱里迎接建国10周年国庆节。这天，管教人员命令我们粉刷墙壁，张贴庆祝口号和宣传画。

我们把一张张招贴画贴在白粉墙上。忽然一个热烈的场景出现在我的眼前，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一个个裹着白头巾的陕北农民昂头吹奏唢呐，敲锣打鼓，欢腾的人群扶老携幼，高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火炬连成了队伍沿着广阔的山野蜿蜒曲折、星星点点、无穷无尽、隐隐地衬

托出远处的宝塔……这是延安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历史性的场景。这幅画形象生动，构图新颖，以恢宏的气势强烈地感染着观众。

当我看到这幅题名《延安火炬》的画作者竟是“蔡亮”时，我差一点没有叫出来，读者可以想到我当时的喜悦和感动。

蔡亮不但活着，还在创作！并且用这样美好的作品呈献给祖国母亲，这对关在监狱里的我是多大的欣慰啊！

这个国庆节真叫我难忘，这一天政府还发给我们两个白面馒头，我一边嚼着馒头，想念起蔡亮来。

把蔡亮送到西安，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惩罚，是剥夺他留在中央美院从事艺术创作的一切优越条件。可对蔡亮说来，陕西却是一片文化沃土。这里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这里的深厚的革命传统，这里的丰富的民间艺术和千万个受着这种文化熏陶的淳朴的劳动人民，使一个从学院出身的青年呼吸到了清新的艺术气息，使他获得了一种更为宝贵的条件：把自己的灵魂和民族民间文化相融合，和革命文化传统相融合，脚踏实地地走到人民中去。

一场政治运动毁灭一个幼小的艺术生命，大西北丰腴的黄土高原却又培育了一个新的艺术生命，造就一个新艺术家。蔡亮在“小家族”平反后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朴素地把这个命运叫作“因祸得福”，他说“感谢大西北”。

人生的厄运和磨难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者消沉，也可以使一个坚强的性格更成熟更完美。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小家族”成员中，画家蔡亮是一个强者。不仅由于他为祖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了《延安火炬》、《锁柱》等优秀油画，还因为他在忍辱负重中奋起的不屈的精神。

（本文作者现任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

（责任编辑：白雷）

# 报界宗师张季鸾

● 高向明

被誉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张季鸾，在他一生短短的54年中，从事新闻工作30年，撰写报刊文章和评论3000多篇。这位杰出的新闻记者、著名的报刊评论家和爱国人士，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911年武昌起义后，张季鸾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协助于右任编辑《民立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由于右任推荐，张季鸾被聘为孙先生的秘书，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事后，张还把这项活动写成新闻专电，发往上海的《民立报》。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专电。同年2月，临时政府向握有实权的袁世凯妥协。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不久，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张季鸾也结束了他一生中昙花一现的政界生涯，回到了上海，与于右任等筹办“民立图书公司”。1913年，张季鸾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任总编辑，同时兼任上海《民立报》驻京记者。

3月20日，袁世凯暗杀资产阶级革命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后，全国舆论大哗。张季鸾在北京《民立报》上痛斥袁世凯的野蛮暴行。袁对张恨之人骨。4月26日，袁世凯未经国会同意，擅自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偕同陆徵祥、周学熙，与



英、法、德、日、俄5国银行团签订了为数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以盐税收入为担保。这是袁世凯反动政府出卖中国主权，向帝国主义举借的最大一笔外债，完全是奴役性的政治贷款。张季鸾采访到这个消息，并弄到《合同》的全文，立即在上海《民立报》上揭露了这一肮脏交易。报纸刊出，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成了孙中山领导的讨袁之役（二次革命）的导火线。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军警查封了报馆，逮捕了张季鸾。后经张的好友康心孚等人的多方周旋营救，张被关了3个多月才于释放，被驱逐出北京，重返上海。

1915年，张在上海创办《民信

日报》，任总编辑，和井勿幕一起抨击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的罪行。1916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张季鸾重新来到北京，主持北京《中华新报》笔政，兼任上海《新闻报》驻京记者。1918年9月24日，《中华新报》因报道段祺瑞政府非法签订《清蒙五路中日借款合同》，揭露其出卖中国宝贵资源的行径，报馆被查封，总编辑张季鸾二次被捕入狱。两周后，张被营救出狱，又回到上海，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由于经营不善，于1924年停刊。张失业后，由陕西同乡、河南省督军胡景翼推荐，当了陇海铁路会办。那是当时有名的肥缺，但张到任不到一个月，便拂袖而去，说：“不干这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于是，来到天津，靠每天撰写评论、采访新闻，投寄给上海的报纸得到稿费维持生活。不久，他和友人一起接办了《大公报》。

《大公报》原由满族人英敛之于1902年创办的。是宣扬保皇立宪观点的，1916年卖给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时，已奄奄一息，终于宣告停刊。此时，张季鸾正好流落到天津，恰巧胡政之也来到这里。有一天，他们俩和寓居天津的留日同学吴鼎昌会面。吴曾任大清银行总务局长，民初又任农商部次长等职，与财政金融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位老友漫步街头，行至日租界旭街四面钟

对过时，看到大门紧闭的旧《大公报》馆，不禁感慨万分。三人一致主张把旧《大公报》的房产、设备、招牌买下来，来它个“旧店新张”，办一份像样的报纸。于是商定：报纸接办后，改为新记公司《大公报》，经济完全独立，不接受任何方面的资助，由吴鼎昌等筹资5万元，担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并由三人组成社评委员会。

一切筹备就绪，新记公司《大公报》遂于1926年9月1日续刊。当时的形势是：北洋军阀即将失势，南方新兴力量即将取而代之，《大公报》为了生存，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立场。因此，张季鸾在续刊那天的《大公报》社评中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他还提出“不望成功，准备失败”8个字作为办报的秘诀。

接办后的《大公报》办得很有朝气，每天发表犀利的言论，几个副刊办得有声有色，很快引起读者的注意，销路也越来越广。很快成为北方最有影响的大报。

张季鸾把全部身心都放在办报事业上。他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亲自撰写社评、处理重要新闻、过问版面的安排。他平易近人，注意广交朋友。他从接触不同身份的来客中，了解社会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作为他撰写社评的依据。每晚9点，他都要到编辑部来审阅当天已经发排的大、小清样，看外国通讯社的电稿。当年天津日租界旭街是闹市区，日夜喧嚣，他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全神贯注地工作。张季鸾写的社评精练扼要，从不使用僻字、僻典。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给他留下多大地位。留多少就写多少。遇到大问题，字数留少了，他能删繁就简，抓住要害；遇到小问题，字数留多了，也能旁证侧引，不给人以勉强拉长的感

觉。有时写了一半，忽然来了更重要的新闻，只得易题重写。为了争取时间，他写好一段，裁下来发排，接着再写，边写边排，待小样打了出来，再从头到尾看一遍，稍加修改，一篇社评就定稿了。

没有过硬的根底，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张季鸾文笔快、脑子灵，知识丰富，而且记忆力惊人，他脑子里储存着大量材料，无怪乎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讲过，做总编辑，就要像张季鸾那样。

新记公司《大公报》续刊10年，资金已由开办时的5万元累积约200万元，全国设有1300多处分销处，《大公报》已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但“七·七”事变，报纸不得不自动停刊。幸亏张季鸾早有远见，1935年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后，日寇进逼华北，局势日益严峻，他就建议报馆应采取应变措施，迅速筹划出上海版，将报馆的资产逐步南移。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津沪两地同时刊行《大公报》。但是又爆发了“八·一三”战事，上海版不得不自动停刊。张季鸾于“八·一三”以后的第4天，偕同两三名同业人员，丢下妻子和刚刚出生一个半月的独生子，在敌机不断的轰炸下，带病兼程赶到汉口，于9月18日创办了《大公报》汉口版。他独自主持汉口版的笔政，每天的社评都出自他的手。在汉口的一年当中，国家大局，抗日形势最为震荡，《大公报》的言论也最为社会所关注。1938年8月，武汉形势吃紧，汉口版的全体人员和设备又撤往重庆，同年12月1日，重庆版创刊。1938年以后，《大公报》还先后出了香港版和桂林版。不论什么地方出什么版，张季鸾始终是《大公报》的总编辑。

这时候的《大公报》已影响到东南亚、香港、日本，以及美国。发行

量1938年已逾10万份。1941年，《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40年度全世界最优外国报纸荣誉奖。重庆新闻界300多人为此举行了庆祝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培养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中如范长江、杨刚、陆诒、萧乾、彭子冈等，后来都成为新中国新闻界的中坚力量。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他由于过度的劳累，严重地损坏了健康，终于被肺结核病夺去了生命。他去世后，重庆市新闻界和各界人士上千人举行了公祭大会。国共两党的高级人士蒋介石、孔祥熙、张治中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都亲临吊唁。两党对张季鸾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毛泽东等唁电称：“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等的唁电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张季鸾一生淡泊名利，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社评不署名，不留底。他一再表示：“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认为“报纸的文章只是评述当天的时事，是急就章，不可能写得深刻。如果再出什么集子，不仅是骗人，而且害己。”

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中，国民党政府曾几次以重金收买他，均遭拒绝。在他生病时，蒋介石送去1万元医疗费，他原封退回。他一生没有为自己购买下任何私产，以致身后他的遗孀和年仅4岁的幼子的生活费，不得不由《大公报》承担。1939年10月10日，香港各界举行大献金活动，张先生把1931年他50岁得子时亲朋好友和国民党权贵赠送的金器。全部捐作抗战基金，表现了一位爱国者的赤诚情怀。

（责任编辑：方实）



由成都乘车南行，过川西重镇石羊场，奔大道，择东行数分钟，绿竹掩映处，有红墙一道，圈出别一个天地。这便是明代古刹铁像寺，创建于1984年秋的四川尼众佛学院就设在寺内。铁像寺始建时，曾于地下掘出铁像一尊，因而得名。

进得山门，见一老尼坐在墙脚补袈裟。递上四川佛教协会的介绍信，说明采访意图，老尼嘱我们稍候，便去通报。片刻间，一位看上去30来岁的尼姑含笑而来，说佛学院院长隆莲大法师正在授课，招呼我们去客厅稍坐。后来得知，这尼姑法名果芳，是佛学院的第一届学员，毕业后留院，负责管理图书资料。

客厅不大。环室一圈沙发，屋顶垂下吊灯，正墙上挂着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佛学大师赵朴初居士题赠铁像寺的手迹：“像法重辉圣尼寺，律传远绍铁萨罗”。侧墙上有隆莲书自撰诗四幅，诗书俱佳。其中一首为隆莲6年前以76岁高龄返故乡乐山，游乌龙寺所题，诗云：“曾将黄绢置山头，香宋诗坛博一筹。五十年来才思尽，愧携秃笔返乌龙。”

果芳奉上清茶，告以隆莲同意我们去课堂摄影。言毕趋前引路，导入教室。教室墙上贴着中国地图和

也亲耳听到她的教诲，这也算是现代文明对佛学的一贡献吧。小尼熟练地取出录音带，翻了一面，又放进去——看来，她是本周值日生。

课时结束，女学僧们携凳鱼贯而出，将凳放在斋堂里各自的位置上，便三三两两，低语呢喃，缓步而去。按作息时间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是她们的“修定”时间。

随隆莲来到客厅，落座寒暄几句，我们便攀谈起来。隆莲不仅佛学、国学精深，且谙英文、藏文，通数理化，出版过诗集，兼擅书法。叫人感佩不已的是，她只读过一年小学，学问全凭自学得来。

隆莲俗姓游，名永康，四川乐山人，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幼承家

## 当代中国第一女高僧

### 隆莲

#### ● 赵世真

世界地图。黑板左侧是赵朴初手书：“多闻多思”。正对讲台的墙上是壁报园地。壁报刊头大书“自由论坛”四字。

隆莲安详地端坐讲台桌后，娓娓授道，思维明晰，声音清朗。虽经书在手，却并不翻阅，显见早已烂熟于心了。40余名女学僧，一色袈裟，一式正襟危坐，仪态端方，细细观察，才辨出个体间的差异。有的稚气未尽，有的却已韶华半逝，30来岁的年长者，显得比同龄的俗家女子见老一些。

我们的出现，并未引起骚动。见了生人，女学僧们无惊无论，继续受业，旁若无人。只有一二小尼投过来一瞥，那目光平静如水，连好奇都说不上。

一位小尼走下座位，径直走向讲台。我们这才注意到隆莲面前有一台录音机，正在录她的讲授。隆莲佛学造诣之深，广为人道。能使后人

学，又学诗于刘豫波、陈石遗两老师。19岁起，她先后在成都女师及女中任教，并悬壶济世。1939年，她遵父命参加当时四川省政府举办的县政人员、普通文官、高等文官三级考试，均名列榜首。她并未因此踏上仕途，却于1941年悄然到成都爱道堂禅院剃发为尼。中国少了一位女县长，却多了一位高僧，这不能不说是佛门幸事。

隆莲为什么在风华正茂的年龄遁迹空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些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人说她情场“失意”，也有人说她“厌世”。隆莲淡然置之。说到出家动机，她认为“这不是在家人所能领悟的”。她说：“我小时候浑名叫‘蛮子’，所以需要渡化，我是甘入佛门为尼的。”为此，她还吟诗一首：“老家原住獠人（按：乐山一带，古为獠人居地）乡，又称蛮子女儿王；三生有幸当和尚，要与痴僧较短长。”



可以肯定一点的是，隆莲当年斩断青丝，与家庭熏陶有关。她生长于信奉佛法家庭，外公是当地佛协会会长，外祖母和母亲又是虔诚的佛教信徒，父亲对佛学颇有研究。她13岁即长斋奉佛。到爱道堂后，从高僧能海法师习佛法。她年轻时撰写的佛学著作《摄大乘论略述》问世后，曾受到名闻中外的佛学大师王恩阳的赞赏。以后，便一发不可收，著述颇丰，有的还成为佛学院的正式教材，在海内外佛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所有这些成就都得益于早期能海法师潜心倾力指导。那么，能海法师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很想了解师徒之间的某些联系。

能海法师，俗姓龚，名学先，字缙熙，四川绵竹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8）腊月二十二。父母双亡，师依姐为生。14岁当学徒，商号主人亦姓龚。授以经史。1905年，师弃商从戎，考入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历任队长、团长、司令等职。1915年，东渡日本，对日本佛教之盛行，颇多感触，萌学佛之念，骤于有如日本之富强。1924年出家，于三藏经典，多所研读，尽涉堂奥。1925年入西藏，依止康萨格大师（被誉为西藏日月二轮之一）学法。1933年，在上海、太原等地巡回讲经，继赴五台山广济茅蓬。“七七”事变后，住成都南郊近慈寺爱道堂禅院。1941年，师收隆莲为徒，喜莲颖慧，精心传授，学业日进。隆莲悟得师之佛法主要有四个特点：一、继承丛林制，兼吸收赞教寺庙家风；二、师于显教，遍学诸宗，不存门户之见；三、师于密法，认为系与显教相表里，相辅翼；四、师教弟子学法，由浅入深，执简御繁。

1949年，师参与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倡导、组织的彭县起义。1951年，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为特邀代表。1952年10月，出席中国佛学筹备会；12月，赴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会议。1959

年，西藏叛乱，师发表谈话，坚决拥护政府措施，载《人民日报》。1966年，师移居茅蓬，红卫兵强迫僧众解散。1967年元月师含恨圆寂，遗骨葬于清凉桥。1978年3月，五台山佛协于显通寺为师召开追悼大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及中国佛协均派代表参加，并函电致悼。遗骨塔于善财洞侧宝塔山麓。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为塔题铭，给予能海法师以极高的评价。作为能海法师高足的隆莲，一直情念恩师的海人不倦，言传身教，特为师立传，题为《显密双修的能海法师》，被载入《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一书中。今天，我们从隆莲忙碌的身影中，仿佛可以看见，重重山峦上，旭日东升的天际，能海法师弘扬佛法51年所折射的耀眼的光辉！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一根红线在紧紧贯穿着，那就是“爱国爱教”的精神。

入佛门50余载，隆莲研习佛学，提携后进，夙夜匪懈。十年动乱中，曾受到冲击，但不坠爱国爱教之志。1978年后，隆莲已老迈，仍孜孜于弘扬佛学，培养佛学人才。现在，她除担任佛学院院长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协副会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佛协名誉会长、省文史馆研究员。她每



△隆莲法师

周在佛学院授课时间达12小时，而这不包括每星期一、六在爱道堂的授课。佛门的“无我”境界在她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这十年是我最幸福的十年。”隆莲微笑着说，“一是落实了宗教政策；二是十年没有上过医院。‘文革’中我没有挨过打，但病得很凶。说来也怪，‘文革’一过病就好了。”

话题一转，隆莲由“幸福”谈她的忧虑：担心衣钵失传，后继乏人。他说：“我非常赞成每个庙子都要培养自己的人才。”

由隆莲之“忧”，不难理解她为什么而今以84岁高龄仍对办好佛



△本文作者在尼众学院与院长隆莲法师交谈

学，培养佛学人才如此呕心沥血。

佛学院学制三年。第一届学员共35人，有寺尼，也有在家信徒，分别来自四川、浙江、陕西、山西、湖南、河南等地，1987年毕业。毕业学员中有11人留院，或进专修班，或任神职。其余学员有的到寺庙，有的到佛协。第二届也就是本届学员有40余人，皆为寺尼，分两个班，专修班相当于大专，中修班相当于中专。毕业后发给文凭，国家承认学历。

学员入学考试由佛学院命题，发送各地。各地组织考试后，将试卷密封寄回，由佛学院统一阅卷，择优录取。考试科目为佛学、文化、外语，其中外语成绩作为参考分。考生有高中学历或具同等学历，其父母大多数是佛教信徒。学员入学后，每月国家给32元生活费。学员可与家人书信往来，也可接受家人钱财一类贴补。外地家人来探亲，凡女宾，佛学院皆留宿。学院课程十之七为佛学，其余为汉语、外语、史地、政治。学员毕业分配实行三个面向：面向寺庙，面向教学，面向佛协。毕业分配后，月工资数十元。一学员毕业分配到某市佛协后，抱怨数十元的月薪太低。隆莲对此颇不以为然：“既然投身佛门，就得有献身精神。况且，那位毕业学员每月伙食费只交12元，还有余钱可供自由支配。”

佛学课主要由隆莲讲授，另外三门功课则延聘3位兼职教师。汉语、外语教师系佛教信徒，政治教师则是无神论者——中共党员。三人都是60岁以上的男性。三位教师所获得报酬甚薄：每节课四元。学院经费困难，“困难也要办，”隆莲说，“等老的死了，办起来更困难。”

佛学院办起来后，接待了众多海内外嘉宾，赵朴初曾三到该院。美国和比丘尼的始祖斯里兰卡的佛教界人士曾到该院，斯里兰卡派尼众来进修。去年，台湾高雄佛光山星

云法师莅临该院，以“志在三无漏学，行在六波罗密”一语题赠，并赠佛光山制笺一枚，书笺上诗云：“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也算是一种人生哲学吧。她约见我们的那天，不丹国的国师率佛教代表团来访，她忙到晚上未吃饭，可她对我们说：“为了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也为了和各国佛教僧众永结法缘，这是我份内的事，忙一点没什么。”

我们提出，可否跟几位学员见见面？隆莲欣然允诺，却又说：“一般外面人来参观，我们都不把弟子介绍给大家。今天看你们是四川日报记者……”她没把话说完，但却足以打消我们跟学员作较深层次交谈的任何打算。

四位学员款款而来。看上去年龄稍长的一位来自重庆。法名常慧，是重庆市政协委员，戴近视眼镜。一位是自贡市佛协的秘书长，法名法性。一位来自长沙，法名自然。常慧恐我们不解，解释道：“就是大自然的那个‘自然’。”还有一位来自河南洛阳白马寺，法名印俊。略事交谈，四位学员举止沉稳，言谈得体。客问主答，能用一句话说清的事，答者绝不多说一句。而当我们提议替她们合个影时，四位学员却不约而同地露出些许愉悦的羞涩——以大殿前开得正好的盆花为点缀，照相机录下了这一瞬间。

我们对隆莲如此礼遇，表示衷心的感谢。随便向她提及，原川报社长许川同志因患癌症，多方医治无效，新近不幸逝世。隆莲仔细聆听后，语气凝重缓慢：“很遗憾，如果我早晓得此事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个丹方，或许能够治愈他的病。”我很是惊讶，未曾想到隆莲还涉猎医学，喜不自胜，忙询及什么“妙药”。隆莲侃侃而谈：“这个丹方是父亲的一位开药店的朋友私下里传授给父

亲的。那时，我和姑母同时颈上患了九指烂阳（俗称结核病），整日咳嗽不止，满脸痛苦状，身体日渐消瘦，每况愈下，最后竟卧床不起，族人十分焦急。父亲的那位挚友闻讯后，便将此方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父亲大喜，照朋友嘱咐，亲自到山上采集天青地白草（即野蒿草），常常是早出晚归。回来后洗净熬成汤，再浓缩成膏状，搽可，敷也可。天天如此，不过月余，果真痊愈，族人满心欢喜，还买了一串鞭炮以示庆贺。我的一位亲戚，是乐山市犍为县的人民教师，患了胃癌，我依此民间方药，给他治疗，也恢复了元气。”

没有不透风的墙。去年，四川省煤炭厅的一位处长患了肺癌，听说有这等事，怀一线的希望专程到铁像寺求见隆莲，隆莲不无忧虑地说：“他可是我的亲属，你是外人，万一……”这位处长倒也爽快，打断她的话：“甭提那个，我怎么会怪你？反正也是老病了，我住过许多医院都没治好，你就当在我身上试一试吧。”言词之恳切，旁人也为之感动不已。“济世活人，普渡善民”这是佛教的信条，隆莲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慷慨应允。奇迹又一次出现，三月余，这位处长红光满面，如坐春风，逢人便夸：“隆莲法师用草药治好了我的肺癌，太了不起了……”在向隆莲致谢时，他戏谑说：“法师，你可以申请专利了。”

采访结束，隆莲送我们到门口，连称“简慢”，躬身道别。

不多时我们便又置身于都市的喧嚣中，突发奇想，用“世外桃源”来类比刚刚告别的那个世界不知是否恰当？如果你哪天想超脱一下，去朝这处佛门圣地，请别忘了通知我一声，也许我能给你当一个很出色的向导。其实，我私心里很想去重访一趟，去体味那份素色，那份宁馨，那份执著的追求。

（责任编辑：白雪）

# 一本英雄书

## 一场生死劫

谈《欧阳海之歌》及其作者

●许国荣



一本书，两年里发行千万册，曾被万人争相阅读；十余年后再版却已无人问津。这是书的价值发生变化，还是时代剧变的缘故？一个人，由于写了一本书，始而被捧上九重天，继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这是祸还是福？请看此文——

作者题记

如今40岁以上的中国人，很少有不知道《欧阳海之歌》这本书的。这本曾经红遍中国的描写英雄的书，从它的风靡全国到迅速销声匿迹，称得上是一出人世间的悲喜剧。历史是昨天的足迹，让我们一起温习一下这逝去的足迹……

### 书是怎样写出来的？

1963年冬天，在京广铁路衡山附近欧阳海舍身救火车的这件事，当初是作为事故定性的。那些年军队提倡野营拉练，欧阳海所在的6900部队在一次拉练途中，有匹驮

的马挡在铁道上，恰在此时一列赛车飞驰而来。拉练部队殿后的收容班长欧阳海见状，拼命将马推离铁道线，而他自己却被列车撞倒，伤重而牺牲；列车虽因紧急煞车造成一些损失，却并无大碍。事故因部队而引起，无从推卸责任，经过研究，决定它是一次由拉练部队引起的重大铁路事故。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部队和铁道部门只剩下如何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不会再有欧阳海救车的英雄行为，更不可能有宣扬英雄的《欧阳海之歌》这本书的出现。过了些日子，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事故发生的地点，在两座山

的峡谷间一个急转弯道上，弯道这边视线受阻，但火车行进的声音却形成强烈共鸣；因而拉练部队的马受惊而拦在铁道上，并非人为，主要原因在地势；其二，若不是欧阳海舍生拼死推开驮炮的马，那么钢铸的炮身和碾不断的马皮，势必造成列车出轨，车上数以千计的乘客和车上设备，将造成严重的损失；其三，欧阳海的战友也气不平，反响强烈，明明是他以生命换来列车的平安，怎能反而落个事故在身？鉴此，铁道部门的专家和部队领导组成一个调查组，经过实地反复调查研究，终于改变原来事故的裁决，认定是一次

英雄壮举。

那些年,宣传英雄、学习英雄是思想工作的重要一环;而英雄又多数出在部队,雷锋、刘英俊、王杰、麦贤得……过一阵子就出一个,轰轰烈烈宣传一通。这回出了个欧阳海,很快成为热点新闻,作家、记者蜂拥而去,到欧阳海所在部队,到他老家湖南桂阳,采访,寻踪。在这群采访、寻踪的人群里,就有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编剧金敬迈。

金敬迈1949年高中毕业,在武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演过戏,写过剧本,是个干起活来不知疲倦的人。在不长的时间里,他访问了欧阳海所在部队的干部和战士,采访了欧阳海家乡有关人员。当然格外仔细地访问了欧阳海的家庭成员。他宣称,他掌握了欧阳海的一百多个故事,可以说是所有采访者里工夫下得最多、素材掌握得最丰富的。

他是话剧团的编剧,第二年又有全军戏剧会演,他就充满信心地写起剧本来。正当他没日没夜地全身心投入写作,剧团领导突然作出决定:第一,金敬迈这个话剧剧本立即下马,军区一位诗人写的以欧阳海为主人公的歌剧已经开写,广州军区总不能同时将两台写欧阳海的戏去北京参加会演;第二,金敬迈采访来的材料全部转给写歌剧的诗人,以保证重点。

初听之下,金敬迈差点跳起来,这叫什么事呢?他尽心费力地采访,呕心沥血地构思,日以继夜地写作,都白费了?不问一问谁掌握的素材更丰富?谁的构思更好些?无非他金敬迈是个无名小卒。他心里憋着口气,攥着股劲,因为从采访开始他就十分喜爱欧阳海这个人物。他身上那种倔强劲,那种干起活来不要命的派头,那种磊落光明的作风,都让金敬迈心折,令他神往。甚至可以说,在酝酿的过程里,欧阳海身上融进了他金敬迈的性格,金敬迈的头脑里有了欧阳海的思绪,他和他已

经血脉相通,呼吸与共,到了不吐不快、不快的境地。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只有服从。

放下稿子,他神不守舍,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怎么办?写,非写不可。不让写剧本,就写成别的。他没有写过别的东西。不管什么,反正得写。于是请假一个月,他每晚等孩子们上床后开写,到翌晨天明停笔,然后将手稿置于桌上,倒头睡觉。夫人曾凡三就用上班前的间隙读稿,顺手或改正笔误,或略事润色。

夜复一夜,如喷泉喷水,若堤坝决口,金敬迈那不是写,而是飞流急泻,一气呵成,在24个夜晚里写成了10章48节31万余字的《欧阳海之歌》。熬了24个通宵写成的东西,像十月怀胎生的孩子,虽然人瘦了一圈,却异常高兴,他卸下了肩头的重负,了却一件心事。可是这部东西叫什么?他拿不准。小说?报告文学?还是英雄传记?都不确切。叫小说吧,欧阳海是真人,全篇基本上也是以他为原型、以他的成长为脉络写的;报告文学或英雄传记?又不像,欧阳海周围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也用并非欧阳海的情节和细节,可以说是用了典型化的创作方法,揉进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在许多方面将作者的和欧阳海的思想、性格、为人作派相沟通、相融合了。总之,他心里在打鼓,这部什么也不是的稿子,也许只是让他白熬了24个通宵,空费了半年心思,平白无故地憋那口气。他绝对没有想到,这部他无法界定是什么体裁的稿子,却红遍中国,掀起狂热,还对他个人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

## 差点叫部长“枪毙”

从1963年冬欧阳海救车起,到1964年秋,时隔不过半年,《欧阳海之歌》已经写成,可见神速,可见顺利。但是,这本写得神速而顺利的书,却遇到过三次冲击,每次都几乎

使它造成灭顶之灾。第一次冲击发生在编辑部讨论书稿过程中。

写成《欧阳海之歌》不久,适逢解放军文艺社副主编鲁易去广州组稿。有一天,一位敦厚壮实的小伙子,拎着一沓稿子来找鲁主编。稿子?那好,留下来,很快就看。不,小伙子要亲自朗读给鲁主编听。热情而执拗的金敬迈,以他当歌剧演员的功底,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地朗读起来。鲁主编是位老编辑,看过数不清的稿件,却是头一回听稿。可他越听越激动,不住地点头:“好啊,是部好稿子!”

稿子很快在解放军文艺社的编辑手里传看,所有看过的编辑、领导一致肯定。当然,爱挑剔的“编辑老爷们”也总能提出许多意见来,1964年冬,把金敬迈请到北京商量修改。

开头一切顺利。风闻极有个性的作者表现得很谦虚,好商量。一章一章捋过去,没有卡壳。欧阳海童年的两章,无可挑剔;三章、四章写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关系,在描写欧阳海和同时入伍的刘伟成之间争强好胜上,似乎有点过分了。可以,收敛一些。派司。五章写对待荣誉的态度,不错;六章写入党,有新意;七章“家乡行”,有人提出不能为了写欧阳海的先进而贬低家乡父老;虚心接受。九章——九章写欧阳海和指导员之间的矛盾、冲突,突然卡壳了!

指导员(实际上是副指导员,指导员暂时离连队)看歪了欧阳海,认为他的做好事、救火等等,是为了表现自己,是个人英雄主义,从而多方刁难、责怪。欧阳海呢,明明看到了指导员身上的缺点,要不要对他进行批评呢?经过思想斗争,认为当面批评才是与人为善、才算不犯自由主义。于是这两人间展开了一场是与非、原则与非原则的斗争。

多数人认为这场斗争写得有气势,是军事文学的一个突破,它反映了生活真实。可是分管解放军文艺

社的一位文化部副部长斩钉截铁地说，这一章必须改，不能设想在一部军事题材作品里出现一个品质恶劣的指导员，不改好这一章书不能出。

金敬迈的犟脾气一下就暴露无遗。他涨红着脸争辩说，他之所以要在欧阳海救火车牺牲之前写这么一场斗争，是由于生活里有这样的人，有这种美与丑的斗争；只有写足了这场斗争，欧阳海这个英雄的磊落光明才足以体现，他才是一个品格高、值得尊敬的英雄。他说，这之前就有人警告过他，要他放弃这一章。他绝不放弃，宁可不出书也不愿意放弃。那样做他对不起死去的英雄。

僵持了好一阵子，多方对他做工作，当然又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这位指导员的身份改为代理副指导员，副的，还是代理，还是文工团拉小提琴的，来连队是来体验生活的；他和欧阳海之间的这场斗争，自然也改成误会为主。总而言之，有错误的只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

改是改了，金敬迈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这一章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的委屈和言不由衷。

## 狂热——印数一千万

第二次冲击，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

《欧阳海之歌》正式出书时间是1965年10月。这时已是“文革”前夕，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如箭在弦上。即使在这样风声鹤唳的情势下，这本描写一个普通战士的书，一进入1966年就出现了狂热。

狂热首先表现在青年争相阅读。将近30年后的今天，笔者听到过许多如今三十五六到四十一二岁的人谈当年读《欧阳海之歌》的盛景。1990年笔者在美国，曾经听许多中国留学生谈起过这本书，许许

多多留学生对这本《欧阳海之歌》有一种既亲切又陌生的感情。当年常常是，发现班上（那时他们是中学生或小学生）有人弄到一本，马上涌上去借。于是排好先后顺序，限定每人两天甚至一天看完。就这么一个传一个，传到后来书已磨损、残缺，依旧在青年手里流传。

其次反映在出版上。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印数超过1千万册，恐怕到今天还没有被打破，在世界出版史上也是少有的。这么说吧，全国各省市绝大部分都印了，数字都不小；不少军区印，有些军兵种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农村读物出版社也印。当然解放军文艺社更是一版再版地印。另外，国内出过少数民族文字版，国外有五种文字印过，日文版有两个版本。

狂热还表现在对作者的态度上。不要以为只有外国才有对明星的狂热崇拜，也不要以为中国到80年代才出现对摇滚、对港台歌星的狂热举止。不，1965年—1967年间在全国许多城市出现过几万人、十几万人对《欧阳海之歌》、对金敬迈的狂热。报告会，报告会后的要求签名、握手，要求近距离看一眼，常常使金敬迈几个小时也无法离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它之前出版过的宣传雷锋、刘英俊、王杰、麦贤得这些英雄的书没有引起这样的轰动效应，而读者独独钟情于这一本？这是一种文学现象，又不仅仅是文学现象，应该说，这种狂热有深刻的时代属性和政治内涵。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来看，第一，它称得上是一部文学作品，并且将小说应有的情节生动性和纪实文学切近生活的逼真性，作了有机融合。在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当初的无法界定体裁，恰恰成了这本书所以畅销的重要原因；第二，它塑造了一个血肉丰盈的人物欧阳海，熔铸在这个人物身上的农民的坚韧品质，经受生活锤炼之后具有的无私、宽

容境界，加上强烈的平民意识和民主精神，使之塑造出来一个令人爱和敬的普通人形象；第三，可以说，它具备大众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字浅显，通俗易懂，情节紧凑，富于人情味；虽然不曾标明，实际上它是一部充满政治激情的通俗文学作品。

这本小说之所以轰动，主要在于政治因素。那是个热衷于造神的年代。《欧阳海之歌》既迎合了领头造神者的政治需要，又满足了被造神运动趋势的广大群众的感情需求。这不，“万物生长靠太阳”，欧阳海之听以成为英雄，不正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结果么！

可是，当“文革”风暴既起，《欧阳海之歌》红得发紫时刻，却有过一次对它的巨大冲击。街上出现了批《欧阳海之歌》的大字报，造反派办的小报上刊登着对书、对作者的造反文章；解放军文艺社门前不断有红卫兵来造反。罪名是什么？书美化“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事实呢，书里引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的两段话。

别看这短短的两段引文，在那个疯狂的时代足以让这本书和写这本书的人“永世不得翻身”。类似的事已有千千万万。但是恰恰那时它已被“中央文革”看中，要派上用场，因而红卫兵造反只热闹了一阵就偃旗息鼓。问题怎么解决呢？向上打了一份报告，说明情况，提出措施，江青大笔一批“同意”，解决了。措施是，将引用刘少奇语录的两页撕下来，另写成、印好两页粘上去。同时，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发表部分章节，以昭示全民，这本书依旧是红的，不曾变黑。

这场冲击来势很猛，消失得很快。之后，金敬迈就卷入上层政治圈子，始而捧到天上，继而贬入地狱，开始了他“文艺组里三个月，秦城监狱五年半”的不平常的日子。

## 从“我们的作家” 到“5·16政委”

“文革”开始，金敬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一员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之后，奉命写另一位保卫铁路的英雄蔡永祥，他一头沉到钱塘江大桥下蔡永祥生前所在连体验生活。

1967年4月下旬，接到电话，要他立即去京。问：什么事？不予答复。于是他伙食帐未清，衣服未拿，连夜赶到北京。这才告诉他：江青要接见他，谈《欧阳海之歌》的修改和蔡永祥一书的写作。问：何时接见？曰：不知道，待命，不要跑远了，于是他住下来等待。

那时候人们都去忙于参加“文化大革命”，难得有一两个朋友陪他聊聊天。有一天金敬迈对朋友说了一桩令人惊讶的心思：他要利用江青接见他的机会，把赵寰救出来。赵寰是他们创作组的主力，写过《董存瑞》、《红缨歌》、《南海长城》等著名剧本，由于在“交心运动”中被迫交了一句对毛主席不恭敬的“黑心”，几年来备受折磨，“文革”开始就被专政。他了解赵寰，那是个写起剧本来不要命的人；他金敬迈所以能写点东西，是赵寰带出来的。凭一个共产党员的党心，一个受过他恩惠者的良心，他要说动江青下令释放赵寰。有没有风险？当然有，头一次见面就给“旗手”出这样的题目，何况风闻此人喜怒无常。但是他要冒这个风险。他是富于同情心的人，又从小养成侠义心肠。他说这几天他一直在暗暗准备这篇直谏的“台词”。

4月28日晚9时，江青在京西宾馆接见金敬迈。谈完正题之后，趁“旗手”高兴时分，他用一大篇准备好的说词，说动了江青，竟然让江青叫他马上上楼找着正住在那里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要黄永胜以江青的名义马上打电话到广州，立即把赵寰放出来。

金敬迈十分得意地为朋友做了一件好事。可是他哪里知道，这也是为他自己几个月后的蹲秦城监狱埋下了伏笔。

4天之后，1967年“五一”晚上，金敬迈被请上天安门城楼，还由江青领着去见毛泽东，江青一口一个“我们的作家”，以示器重，以显亲热，以标榜她的礼贤下士。也在那几天，戚本禹找金敬迈谈话，说起江青有意留他在即将成立的“中央文革”文艺组工作，问他意下如何？

金敬迈征求朋友意见：去还是不去？去，从短期看，会影响写作；从长远看兴许对写作有好处。那时候主要从一个作家的立场考虑这件事。其实，他和他朋友都清楚，他性格率直而任性，既无城府，更无心计，不要说没害人之心，连防人之意都没有的，又特别富于同情心，哪里是搞政治的材料。可是50年代入党的党员都有份愚忠，只要组织吩咐，粉身碎骨也要上，根本不合自己意愿的事也得干，一如他奉命修改欧阳海和指导员的矛盾一样，他不可能做出拒绝的决定来。最后，金敬迈正色说：“其实，还商量什么？人家叫你去，你能不去吗？”

文艺组大约在1967年的五六月间开张，金敬迈作为五人班子的第二把手，据他自己调侃说，说不出忙什么，却实实在在是忙得不吃不睡不看报。无非是奉旨灭派性、消派仗，搞大联合等等。大约到这年9月份，说文艺组出了问题，金敬迈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说是反对江青。罪名有二，一是整江青黑材料。六月间，上海有人打电话到文艺组，说有人把江青三十年代演的电影片收集起来。问是谁在收集？干什么？说：红卫兵，不清楚为什么。金就请示戚本禹。戚说：“运到北京来看看。”于是金叫运来。影片未出北京站就让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派人取走，不久江青责问下来：“谁叫弄来的？”金说请示过戚。戚否认。金气极说：

好吧，那就算在我头上吧！罪名之二是欺骗江青，为坏人翻案。那不是么，4月28日晚上的直谏嘛！1968年，宣布他是“5·16”文艺口政委。

这以后，金敬迈就消失了。他直谏获释的赵寰也继他入狱。这二位一南一北在监狱蹲了5年有余。

他在秦城监狱享受了5年单身监禁。陪同他的是刻骨铭心的孤独。令他捉摸不透的是：他有什么错？究竟什么原因让他落入这种境地？

他出来时，竟是满头白发，还有那一腔难平的激愤。

“四人帮”倒台之后，金敬迈和赵寰合作写了出话剧《神州风雷》，曾经演遍全国。由这两个江青的阶下囚执笔，将江青复灭、入狱的史实搬上舞台，这算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应得的报应？

##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64年，在构思《欧阳海之歌》的时候，金敬迈就作了一个决定：在书里只引用3个人的话——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道理很简单，毛泽东自不必说；刘少奇公认是毛的接班人，而林彪是当权的军委领导人，以高举毛泽东思想、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为标榜，这两位不会倒。

这既不是他的多虑——因人毁书的事常有，又反映了金敬迈政治上的一种判断。中国的作家都得学会这种判断。中国的作家都得根据这种判断落笔。正是在这样的判断之下，在书里他为欧阳海的成长用浓墨重彩安排了这样的背景：在1960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深入广泛地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在部队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五好”运动，出现了一茬又一茬的英雄，其中就有欧阳海……

正是这样的安排,这样的描绘,出版时被人认作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反映了时代的本质属性。这是《欧阳海之歌》出版之后立即被上层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此之谓“成也萧何”,恰如其分。

《欧阳海之歌》受到的第一次冲击,是对文学典型的认识问题,即生活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这个长期搞混乱的问题。好在牵涉面只有一章,金敬迈遵命修改,构不成对这本书的致命打击。

这本书受到的第二次冲击,证明金敬迈当初决定少引领导人语录并非多虑。同样却又证明他对政治权术的无知——既然可以立为接班人,自然也可以将之列入敌人行列;昨日之立为接班人,是政治需要,今日另立接班人,同样是政治需要。这不是政治舞台上的辩证法吗?好在受第二次冲击时,作者地位稳中看升,刘少奇的话又只引短短两段,剪剪贴贴就应付过去,也没有构成对这本书的致命打击。

但是当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国土上消失之后,这本《欧阳海之歌》所遭受到冲击,就远比前两次要严重得多,那是将那成长的时代特征去掉,把欧阳海所以成长的动力抽去,这本书的灵魂也就不再存在。这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一击。这,恰恰是当年被人们大为称赞、认作这本书长处中的长处。此之谓“败也萧何”。

1978年,金敬迈曾经对《欧阳海之歌》作过一次修改,解放军文艺社也出过一版,但是毫无反响,和20年前出版时的盛况不成比例。

应当承认,欧阳海是一个掷地有声的英雄,《欧阳海之歌》也是一首昂扬的英雄颂歌。但是,毕竟是那个时代的颂歌。它随着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领导中国的那个时代,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那种将一切进步、光明和智慧归结到领袖身上去的时尚,归根结蒂,

願祖國的青年  
人自尊自信  
自立無愧於  
創造過燦爛  
文明的祖先

李政道教授名述  
張瑞齡於北京

歲在壬申季蕤賓錄



本刊特将书法家张瑞龄书写的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名述发表,作为“五四”青年节的一份礼物,献给本刊青年读者。张瑞龄先生自幼习字,有扎实的书法艺术功底。为国内楷书名家之一,他的作品,在国外也享有盛名。我国家代表团出访日本,曾将他书写的条幅作为礼品赠给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海部俊树等。

随着经济这个基础的改变,它终于消失在今日中国文坛上了。《欧阳海之歌》从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时代精神的体现等方面,决定了它只能留在昨天。

我们崇尚反映论,认为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生活,当然和政治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生活绝不仅仅是政治,把文学艺术紧紧地和政治绑在一起,把一件作品变成多变的政治舞台的传声筒,这终究是一条穷途。难道这不是现成的教训吗?

(责任编辑:仲文)

# 蓝天上的

## 一家人

● 宿聚生

悄跑出去向邻居叔叔阿姨，他们也是飞行员，跟妈妈在一个团。果然，那架冒烟的飞机正是妈妈驾驶的，出了故障，中断任务，紧急返场迫降……这一晚上，那架冒烟的飞机一直在小宇环脑海里闪来闪去，她整整作了一夜恶梦。然而第二天一早，妈妈说她还要去执行飞行任务。小宇环受不了了，不顾一切，她决心要阻止妈妈……。

直到给孩子准备好了一整天的饭菜，董锁箴要出门去机场了，她才



董锁箴没想到，女儿到底也当了飞行员。

那年，女儿字环在上语文课。突然挨窗的孩子喊起来：“不好了！飞机冒烟了……”班上几个飞行员的孩子一下子跳起来，拔腿就跑出教室。当他们看见，天上一架飞机正冒着烟歪歪斜斜往机场滑落……几张小脸全白了，一个个小手变得冰凉。

后几节课老师讲了什么字环一句也没听进去。捱到放学了，她背着书包拼命往家跑。一进门，看见妈妈好好的正在家里。一颗小心心扑嗒一下这才落了地。但她不敢问妈妈，知道问了妈妈也不会说，她便悄

发现飞行装具包不见了。里里外外翻找，找了一头汗，哪都没有。这时，女儿正瑟缩地躲闪着。她走过去，在女儿跟前蹲下，她看见女儿黑亮的大眼睛里，正水银珠儿一样润动着祈求……她什么都明白了，心里一热，喉头不觉酸楚。这样小的孩子，眼里却竟会有那样多，那样年深月久的惊怕与担忧……她握着女儿的小手，一时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飞行装具包是在门外草棵子里拿回来的。小宇环泪珠扑嗒扑嗒掉下来：“妈妈，别再飞了，别当飞行员了，告诉爸爸也别当了，我害怕……”

她能说什么？面对女儿的祈求，她一时无言以对……

当初，她穿上飞行服的时候，作为新中国一代新女性的象征，幸福使她几乎一连几夜难以入眠。她把一张沈阳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毫不犹豫地塞进抽屉里，毅然决然走进了军营，飞上了蓝天……很快她发现，关于“飞行员”的少女之梦，远非那样浪漫。那紧张艰苦的训练，即被人称为“世上第一风险事业”，给她带来的一次一次空中险情；那偏僻的山沟机场单调枯燥生活，等等，就更不用说了，仅就情感生活的疏漠，她是万万没想到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正是多梦时节，正是多情年龄，她向往幸福，她向往爱情。然而，军营生活却使她常常是起床后匆匆洗把脸，连头都顾不上梳就要进行战备、运输、科研、抢险救灾、人工降雨……飞行任务几乎不容人有喘息之机。几乎没有“恋爱”过程，她匆匆结了婚，爱人也是飞行员。从湖北来到沈阳，度了15天婚假，连“新娘”的滋味都还未尝到，就又匆匆返回部队。虽然后来有了自己的“窝”，但作为飞行员，他们必须严格执行“星期六制度”，经常是隔窗相望，不能相聚。

她怀了孕，仍然在飞，直到腹部隆起很高妨碍拉驾驶杆了，她才停下来。生下孩子，按规定女飞行员有半年哺乳假，不参加飞行。可是部队任务紧，她连最起码的56天产假都未休满就又上了蓝天。孩子只好托给郑州奶奶家……

两口子都是运输机飞行员，一年有大半年时间在外边执行任务，千里万里，地北天南……完成任务回一次家，甚至连孩子模样都未熟悉，便又要登机启程。她是女人，她是母亲，“母爱”是人间最伟大的情感，然而，她……

多少次，她拿着飞行装具包，望着酣睡中的孩子，开开房门，在黑夜中悄然离去……。



后来宇环上了中学，中学在公社所在地，离机场十几里，天天来回走显然不行，只好住校。每星期一早上离家时，带上一小袋米，拎上一瓶炸酱或咸菜丝，一个星期，带别的菜肯定会坏。

这些年来，女儿不安定的、多艰多磨的生活，把独立与坚强的秉性铸进了自己的性格与灵魂，作为一名女飞行员的荣誉感、事业心无形中融进了女儿的血液之中。25个长空春秋，近3000小时的空中飞行，百万里风雨航程，这距离连起来可以绕地球几十圈。当她作为飞行副团长，胸前挂着6枚军功章的时候，这种自豪感与骄傲之情已远不是25年前那个梦幻少女的浪漫遐思了。这骄傲与自豪感是坚实的。回想25年的飞行生活，她没有后悔，没有怨尤，没有嗟叹，没有感伤。她为自己一生的充实而欣慰。因此，虽然她没有想到有一天女儿竟然也当了飞行员，但她为此感到的，仅仅只是一点暗暗的惊奇而已——“女飞行员”在世界上已是寥若晨星，而母女飞行员……这种巧合或说这种奇特的重合，便不能不说是天下鲜有，举世无双了。有人说这是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事情。但她知道，女儿绝不是为了出奇才当飞行员的，更不是为了图慕虚名而选择了这条人生道路的。如果是那样，18年的艰苦磨练早已是能把她建立在虚荣心之上的这点勇气统统打碎了。董锁斌明白，垫衬着女儿这一选择的，是一种情感的磨砺，是一种心灵的熏陶。那磨砺，那熏陶，是像土地一样坚实、深厚，也像蓝天一样博大、高远的……因为女儿对女飞行员的生活已有了足够的了解，因此董锁斌相信，女儿将比当年的自己更能直面人生，更能以充分的准备去勇敢地迎接她将面对的风风雨雨，在航程上留下她比上一辈女飞行员更为坚实的青春的脚印……



1955年刘长祥执行试航拉萨任务



1962年董锁斌执行空投任务



董锁斌和女儿宇环

是啊，蓝天还是那片蓝天。

然而，蓝天毕竟已不再是那片

蓝天了……

(责任编辑：仲文)

1910年到1926年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全盛时期,当时军阀之间暗杀、火并与掠夺,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逼得文艺暂且躲入香艳儒雅甜情蜜意的象牙塔里,否则一般有正义感的文人学子,真要被嗜血成性的武夫斩尽杀绝了。作为文学史上评价不太高的小说流派,常熟籍作家徐枕亚、俞天愤和吴双热,曾是这个派别的旗手和中坚。三人先后活跃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报界和出版界,对艳情通俗小说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鲁迅先生就说过,徐枕亚的文言哀情小说《玉梨魂》,风靡北平上海,远达东南亚华侨区。

徐枕亚,也名徐觉,早年是柳亚子的南社社员。徐枕亚才气横溢,平时好饮酒。饮得半醉,即挥毫吟诗。他诗文好,书法也美秀高妙,许广文赞其书法:“婉婉如处女簪花”,海内人士把觅取他的墨宝当作幸事。徐枕亚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玉梨魂》,发表于1912年的《民权报》。后来印行单行本,销量达数万册。这部小说基本用骈文叙事,杂以

▽读书台,常熟十八景之一。南梁昭明太子读书处,徐枕亚等人曾在此酝酿反清义举



△吴双热等人曾在此求学

## 鸳鸯蝴蝶派

### 江南三作家

#### ● 俞小红

诗词、书信,全书有30章,约9万字。小说的男主角何梦霞应聘赴无锡某乡绅家当家庭塾师。该家有一个年轻寡妇白梨影。白梨影的儿子叫鹏郎,才9岁,由何梦霞每天教书。何与白暗中爱慕频传书信,在封建礼教下,寡妇再嫁几乎是不可能,但青年男女如痴如狂的恋情却是无法压抑的。何梦霞为此憔悴成疾。善良的梨影便把她未婚的小姑筠倩介绍给何梦霞,一则让何摆脱相思之苦,二则让筠倩去照顾何的病体。不久,何梦霞与筠倩订婚。但何仍然暗恋着可望而不可得的梨影。筠倩发现了何的情书,郁郁寡欢而病亡。梨影痛心疾首一病不起。何梦霞含悲忍痛,东渡日本学习军事,辛亥革命时回国,在攻打武昌的战役中阵亡。这部小说白梨影的原型,就是徐枕亚在无锡东亭蔡姓乡绅家认识的一

个年轻寡妇,这个寡妇芳名叫佩华,也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并有几十封信札保存在徐枕亚身边。徐枕亚写到白梨影给何梦霞的情书的文字,均采自佩华的信札。《玉梨魂》出版后,京沪两地的闺阁女郎沉醉于此书中,引发了一段段婚姻悲剧。据说,徐枕亚当年丧妻不久,便有人上门说媒。女方是清末最后一科状元刘春霖的女儿,北京人氏。刘氏在闺阁中读得《玉梨魂》,羡慕徐的文采,得知徐枕亚妻子病亡不久,便有填房之想。刘春霖拗不过宝贝女儿的恳求,就托朋友作媒。徐枕亚自然应允,一年后便与刘氏结了婚,初作状元公的女婿,徐枕亚红袖添香,创作情思喷涌不绝,既创办清华书局,又着手编《小说丛报》。还写成《玉梨魂》的续本《雪鸿泪史》,销路竟然不亚于前书。但好景不长,徐枕亚的母

亲是个封建意识浓厚的旧式女人，经常虐待刘氏，婆媳关系无法调和。刘氏不久就郁郁病死。从此，徐枕亚借酒浇愁，不再有写作兴趣了。1934年，上海民兴舞台排演《玉梨魂》，徐枕亚观后作了《情天劫后诗六首》，其中有两首含泪咽悲，至为情深：“不是著书空造孽，误人误己自疑猜，忽然再见如花影，泪眼双枯不敢开。”“旧境当前若可寻，层层节节痛余心，梦圆一幕能如愿，我愧偷生直到今。”概括徐枕亚的小说与出版生涯。徐枕亚后来创办《小说丛报》、《小说季报》。并有《余之妻》、《双翼记》、《兰闺恨》、《刻骨相思记》等一批中长篇小说问世。

吴双热是与徐枕亚齐名的小说家，他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孽冤镜》于1912年登于《民权报》副刊，与《玉梨魂》间日登载。1913年出单行本，后改编为文明戏上演，在上海滩轰动一时。徐枕亚为其小说作序云：“吴子双热鬼才也，为人豪放面善滑稽，似趋于乐观一派者。”

吴双热初期在上海办一份平民化的周刊，名叫《五铜圆》，每本卖5个铜圆，故取此刊名。当时一副大饼油条也卖5个铜圆。在这份刊物上，他写了一部充满小市民诙谐趣味的长篇小说《快活夫妻》。吴双热交游很广，在20余年的编辑生涯中，往来于苏州、上海、常熟等地，与沪上名流周瘦鹃、包天笑、范烟桥、程小青、顾明道、江红蕉等江南才子交往密切。他办杂志时，利用了郑逸梅的第一篇作品。并客串写侦探小说，时间在1924年间。当时范烟桥、赵眠云合编《星报》，邀请23位作家顺着情节链续写连载形式的侦探小说。吴双热写了一篇《此是销魂荡魄时》。《孽冤镜》是一部24章的自述体小说，作者的思想较时代超前，鼓吹“自由结婚”，“为多情女儿向其父母乞怜请命”，反叛意味很强。小说写王可青与薛环娘自由订婚，因遭家庭阻挠，先后殉情。王可青是苏州

官宦子弟，与贫女薛环娘相识相爱，王可青之父嫌薛家贫穷，逼儿子与某大官的侄女结婚。可青被逼与环娘退婚，环娘心死如灰，就在闺房的墙壁上撞死。可青到环娘墓前吊祭，自缢于墓侧。小说的文笔哀怨悱恻，有梁祝悲剧的遗风。1927年，从不写舞台剧的吴双热，在家乡常熟听到了一则社会新闻，他为女主人公的惨死而激起义愤，闭门赶写了一出四幕话剧，名曰《败叶摧花记》。新闻的起因是这样的：常熟城西叶云贵从日本留学归来，与无锡某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师华玲恋爱。叶云贵骗取华玲欢心，说自己出身于常熟富商之家，家有田地房产。华玲的母亲也误以为找到了乘龙快婿。婚礼在无锡举行，叶家竟无亲戚参加。其实，叶家已衰败，供叶云贵留洋读书后，房产也已抵押。叶怕父母破衣烂衫出席婚宴露丑，便谎称父母年迈不耐车船，不让父母到无锡吃喜酒。华家也信以为真。华玲婚后在无锡产下一女，叶云贵当时在南京国民党部任职。正值国民党北伐告成，叶云贵身居官职，对妻子日渐冷淡。他此时不怕暴露庐山真面目，便令妻子携女返回常熟城西叶家老宅居住。叶母脾气暴戾，对这个媳妇文质彬彬的样子尤其看不惯。俗语道，冷粥冷饭好吃，冷言冷语难挨。两个女人住一屋，磨擦不断。华玲带个女儿，常常暗中落泪，终于夜夜失眠导致神经错乱，病情也一天比一天严重。叶母不愿服侍华玲，便催促叶云贵回家。一天深夜，叶云贵便装潜回家，次日早晨又匆匆离去。不久，就传出华玲暴病身亡的消息。无锡华家得讯，派人赶到常熟，见华玲死相可疑，便把案情递交警方。经审讯叶母，真相大白。华玲当夜昏迷于床时，被叶云贵用竹箩斗（盛米用的器具）罩扣在头部扼杀的。当华玲手脚挣扎时，冷酷无情的叶母竟然按住不放。凶手叶云贵逃到南京，被警方通缉后，又隐匿到东北，始终没有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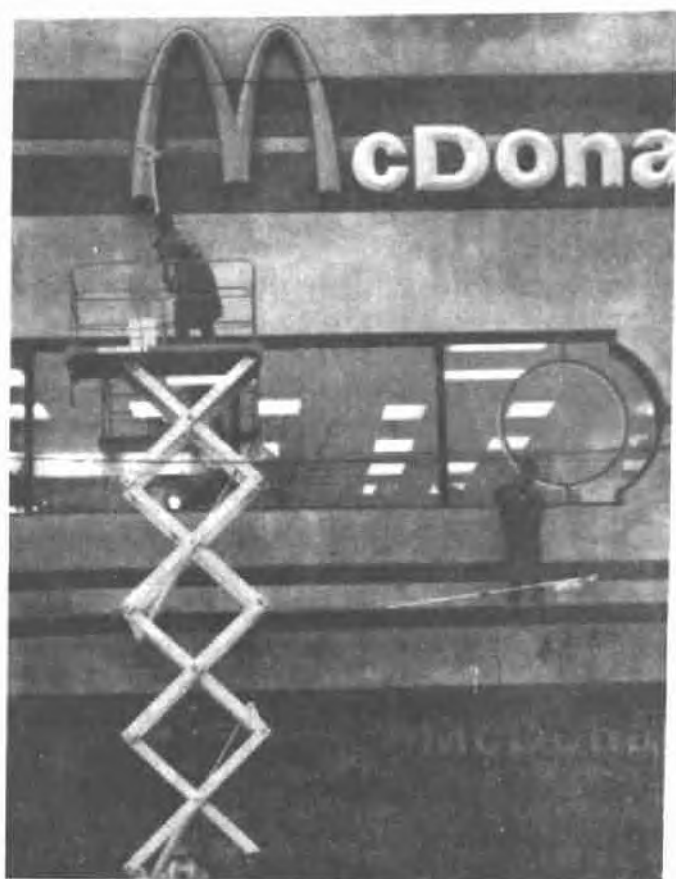
拿归案。吴双热就根据此事写成了剧本，在上海大演特演，一时轰动。因为其中的叶云贵是国民党党员，有影射当局者之疑，吴双热受到政治压力，这个话剧只演了三个月。

吴双热作品很多，长篇有《兰娘哀史》、《学时馨》、《断肠花》、《娟娘香史》、《无边风月传》、《女儿红》、《花开花落》等11部，短篇小说有4部。

俞天愤的名字是后来改的，原名叫俞彩生，优爽有丈夫气概。一天，看到包天笑的名字是“天笑”两字，他便对人说：“他叫天笑，我偏要天愤。”于是，就改名为俞天愤。俞天愤的父亲便是俞金门，是常熟有名的儒医，早年与开缺回里的光绪师傅翁同和交往密切。辛亥革命前夜，俞天愤仅20岁，率领本地健壮青年百多人组成民团，与流窜的绿旗兵丁作战，赢得百姓称颂。他的第一部作品写的是法国女英雄贞德，刊于曾朴主编的《小说林》。1912年发表长篇《薄命碑》、《二月春风》、《绣囊记》、《镜中人》。他因为熟知地方乡绅争权夺利的内幕，就写了一部社会政治小说《剑胆琴心录》，其中“选举趣史”一章写得尤其尖刺幽默，把个民国老爷贿选丑态描摹得维妙维肖。此章入选《中国黑幕大观》。俞天愤写的小说与他的豪爽风格相吻合。他白天为改良地方政治，提倡公益事业而奔走呼号，更深夜静时便伏案奋笔疾书小说。写完一部小说，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几乎很少错漏。有时报馆接到他的稿件，惊奇地以为他是誊清后才寄的，其实他只一遍而终。名家风范，快手利索，全在于他少年时受到良好的书法训练。

俞天愤是江阴南菁学府的高材生，他的遭遇与写《洪秀全演义》的黄小配相似，平时脾性“合则留，不合则去”，孤傲洒脱，容易招致地方小人攻讦。可惜他既有文才，又有孔武之力，终为世俗所不容，后客死他乡。

（责任编辑：刘家驹）



# 京城

## 挡不住的诱惑

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大潮,使人们的观念随着经济腾飞的滚滚车轮,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一面封闭的窗口被打开了,城市这块五彩缤纷的调色板上,又出现了大学生打工潮。

星期三的下午,系里没课。陈明运和他的女友安琪相约吃过午饭在校门口聚会。



# 大学生打工潮

· 刘一达

他们骑着自行车直奔城里，那里有两个不同的工作岗位在等待着他们。

陈明远要到新街口的一家个体餐馆端盘子，老板也是个青年，对他格外关照，打工按小时计算工钱，一小时4块钱，比“外来妹”高一倍。老板看重的是他们学校那块牌子。

安祺是到鼓楼东大街给一个服装店老板的儿子辅导外语。这位“大款”希望正念高一的儿子能有所出息，不惜高价聘用了两位家庭教师，安祺占了一席之地。

陈明远和安祺都是学文科的，喜欢美术和音乐，喜欢文学和旅游，而这些爱好都需要一定的花销，他们计划暑假去九寨沟，这一趟少说要400块钱。他们羞于伸手跟家里要钱，何况他们父母的收入离“小康”还有很大距离。因此，当社会上兴起大学生打工潮时，毫不犹豫地跻身于这支劳动大军之中。

安祺今年21岁，三好生，穿着印有外国影星的文化衫和西式短裤，短发，圆脸，大眼，显得特潇洒，对于笔者的采访，她直言不讳地说：“我是学哲学的，哲学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哲学大书。课余打工是学哲学最好的课堂，它可以使我们广泛地接触社会。同时，打工也给我们课余生活增添了情趣。说句实在话，处在商品经济的社会大背景下，改革的浪潮必然会对我们生活准则和思维方式产生冲



击波。我们也需要生活享受，课余打工的思想动机，并不排除挣钱的因素。在我们学校有人认为到个体餐馆端盘子，有失体统，其实他们就没想想，20多岁的人伸手跟家里人要钱，还靠家人养活，是不是就那么体面！”

说到这里，她爽朗地笑起来：“其实在国外，大学生课余时间打工是很平常的事，就连总统的儿子也打工，他们觉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才可耻。我觉得时下京城兴起的大学生打工热潮，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

她告诉笔者，她的外语水平并不高，但是辅导那个高中生尚绰绰有余。“大款”对她表现得十分慷慨，辅导一次20元钱，如果期末考试那个高中生能得高分，要另外给予奖

励。她每周辅导3次，一个月收入上百元，相比之下，陈明远的工作要苦一些，累一些。

笔者不揣冒昧地问：“这么说你们俩的小金库一定数目可观了吧？”

她莞尔一笑：“离万元户还差得远呢，干了八个月了，并没攒下多少钱，不过，到南方旅游的费用足够了。”

据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清华、北大等几所高校的在校学生中个人存款十万元以上的达40多位。尽管新的观念已使富者为雄，但富不露相者仍大有人在。毫无疑问，大学生中的“大款”绝不是打工所得。几年前，大学校园里的经商风起，令那些以清贫为荣的老教授们吃惊的是，一些脑瓜灵活的学生失去了以往的安份，在校园里开办书店报亭，开办

歌厅咖啡厅,开办酒店快餐店,开办百货店修理部……尽管校方对此屡下禁令,教师们也颇多微词,但学生们是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钱,算不上大逆不道,何况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学生课余打工也是发展第三产业的需要呢。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暑假京城大学生打工的人数超过了10万。京伦饭店要举办宵夜活动,招聘30名兼职人员,报名者4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在校大学生。

## 父亲的耳光使他 明白最真的梦

叶军的脸上留着红红的印痕,颓丧地坐在“银梦”酒家的雅座席上,一连气喝了五扎生啤。一个小时前,他跟在国家机关当副局长的父亲翻了脸。想不到平常斯斯文文的“老爹”发起火来竟也露出了凶相,那记耳光重重地打在叶军白皙的脸上,顿时红肿起来。他咬着牙瞪着眼,攥起的拳头松开了。对父亲,他无可奈何。

叶军是某外语学院三年级的材生。他曾在电视台举办的英语口语比赛中获过奖。上大学后,他又选修了德语和日语,他的邻居“强子”跟他是中学同学,毕业时,打架斗殴被判了3年劳教,出来后在三里屯摆服装摊,那里离使馆区较近,老外经常光顾。“强子”因不会外语,常常使“大鱼”漏网。一天,叶军到“强子”的摊位买仔服,“强子”说:“哥们儿白送你一件,只要你帮我看一会儿摊。”叶军满口答应下来。那天下午刚好有几个国外旅游团在摊位附近的饭店下榻,老外一拨接一拨地到这儿来购物。叶军操着流利的外语与老外讨价还价,推销货物,使“强子”的摊位生意格外红火,一个下午,上万元的服装出手。“强子”为酬谢叶军,除了那件仔服外,还分给他200块钱。第一次尝到甜头,便欲罢

不能。从此,叶军每逢下午没课,便到“强子”这儿帮他练摊,每次都不空手回来。通过练摊,他还结识了几位旅行社的导游,旅行社忙不过来时,也让他去带团,做这种“外活”,他是背着学校,瞒着家里的,不久,叶军的父亲便晓得了他在外面打工的事。老爷子身为局级干部,认为儿子不正经念书跟不三不四的鬼混,面子上令他难堪。叶军平时住校,只有星期日回来一趟,父亲对他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让他与外界断绝来往,安心学业。叶军知道跟父亲是隔辈人,想的干的都不一样,思想上的“代沟”很难逾越,便作了口头保证。其实他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不久,他在外打工的事又一次败露,父亲恼羞成怒,遂演出了上面那场令父子绝情的家庭悲剧。

叶军的教师闻知此事,找叶军谈话。叶军说,外出打工并不丢人,何况我学的是外语专业,打工也是发挥专业特长,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之中本身就是口语强化的训练。一席话,说得老师也无言以对。

“强子”摊发了笔财,在朝阳门外租了个门面,办了个酒吧。叶军不但经常到他的摊门面,而且还帮他拉一些外国旅游团队,每月的收入颇丰。尽管他打工打得挺火,但是功课一点没耽误,期末考试,他五门功课均在90分以上,口语课还拿了个全系第一。

去年夏天,叶军的母亲病危,他把自己的7000元积蓄全都贡献给家里,四处找医生为母亲治病,使老太太大为感动,父亲跟他的关系也有所缓和。

笔者在某大饭店见到正在这里打工的叶军。他瘦高个子,戴着深度眼镜,西服革履,满有风度,22岁,相貌比实际年龄老成。他把我拉到一间会客室,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地讲起自己打工的遭遇。

“大学生打工属于新生事物,迈

出这一步,思想上要有超越。中国社会又一向是轻商的,现阶段大学生还属于社会和家庭的骄子,宠儿。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还根深蒂固,而传统观念的所谓学业就是死啃书本。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远离社会远离生活,一个个都是书呆子。”

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也许听说过一个女研究生被人贩子拐骗到河南农村给一个土老帽当媳妇的事。这就是严酷的现实,研究生的学问很深了吧?念了那么多书,却一点不了解社会,反倒被社会所愚弄,这是大学生自己的悲哀。大学生课余时间打工,可以更广泛地了解社会,丰富自己的阅历,有什么不好呢?人只有了解社会,才会被社会所容纳,否则,当生活的旁观者,只能被社会排斥。其实我们多读了点书,都是‘死书’。现在改革大潮使更多的大学生觉悟了,外出打工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潮流应该肯定。当年毛泽东不是也主张知识分子劳动化吗?他也倡导过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为什么有些人就想不开呢?包括我父亲……”

“你打算今后怎么办呢?”

“还有半年多,我就要毕业了。我这两年在社会上闯荡了一下,可以说是小试锋芒吧。起码大学毕业不会为找工作发愁。国家花钱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我该报效国家,我并不打算出国,就在国内干了。我父亲的意见让我考研究生,但我不想考,想先投入社会干几年,现在有两家外企公司已答应聘用我,我准备毕业以后,就去海南。”

##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早就听说舒放在京城私人乐队中的名气了。

在某歌舞厅,笔者采访到他。置身于此,能感受到纽约夜总会的味道。到这里娱乐的人,层次不高,十有八九是个体餐馆的老板或练摊致富的款爷。他们携带着情妇或姘头,

到这里寻找某种感官刺激。他们大把大把地挥霍金钱，扯开嗓子鬼哭狼嚎般地吼叫，很难想象为这些人伴奏要承受多少心灵上的重负。

舒放知道我是来找他的，说：“今天不练了，走，咱们找个地方痛快聊一会儿。”

我们离开了这个喧闹的音乐世界，在马路对面的一家餐馆找了个空桌子坐下来。

“你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

“没别的目的，这儿挣钱多。”

回答简明扼要，充满豪爽气。

“你打工几年了？”

“一年多。以前加盟过别的乐队，零打碎敲，现在是自己挑头。你刚才看到的那个队，就是我的，一共11个人，除了队长，也就是穴头，是专业的，执照是他的名字，其他人都是艺术院校的学生。他们跟我的关系挺铁，召之即来。”

“你干得这么火，教师没意见吗？”

“我们学的都是音乐专业，正好把所学的专业用于实践，老师开始不给亮绿灯，主要是怕我们在社会上惹事生非，现在他们想开了。”

“你们每次演出，收入多少？”

“钱不多，大头都让队长拿走了，我们是去练活儿的，说白了就是出卖劳动力。不过，我们自己把这作为一种艺术实践，并不计较钱多钱少。”

调查报告说：目前艺术院校的学生中外出打工的占70%，尽管学校对打工是明令禁止的，但是挡不住学生对外面世界的神往。他们或是与专业乐队搭伙，或是到专业团体当“票友”，或是参与演唱会的“客串”，总之，五花八门，各有各的高招。

我问舒放：“你一个堂堂大学生到到等酒吧和舞厅演奏，不觉得难为情吗？”

他哈哈地笑起来：“艺术的价值

就在于寻找听众，只要需要，到哪儿演出都可以。音乐是没有国界也没有等级之分的。到舞厅演奏，刚开始也抹不开面子，可时间长了，就无所谓了。这跟中国的博士生硕士生在国外端盘子当清洁工是一样的道理。其实只要想开了，不自己轻视自己，无所谓谁高谁下。”停了一下，他接着说，“外出打工使我开阔了眼界，结交了许多朋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们这些艺术院校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圈子，自己的艺术沙龙。演出把我学到的演奏技巧充分发挥出来，去年一年，我创作了十几首通俗歌曲呢。”

舒放应该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他学习和打工有较宽松的环境。

## 不出国门就能品尝到 留学打工的滋味

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南口，突然冒出来一个“麦当劳”快餐店。

别具一格的店堂装饰，和一流的服务水准使北京人大开眼界。

“麦当劳”是1992年4月开业的。早在春节后，他们公开招聘员工，由于该店实行计时工作制。应聘者如云。他们只招800人，却有20,000多人报名，在这庞大的报名者中，在校大学生竟占了三分之一。经过几轮角逐，目前他们聘用了50多名在校大学生。这些大学生一般是下午来上班，干到晚上9点。按照“麦当劳”的传统，大学生享受着该店“正式”职工一样的各种待遇。在这里，他们的工作相当努力，深受老板的赏识。

在“麦当劳”二楼的一间整洁的办公室里，笔者见到了小王和小刘。

小王是某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为能竞争到这一席位置，她感到荣幸，她告诉我，她的同学都很羡慕她。

她说，对她课余打工，当教师的母亲表示赞成。母亲认为，她是在蜜

罐里长大的，应该通过打工好好锻炼一下，为将来走入社会打下基础。她的老师对她打工也表示理解。小王在班里是三好学生，这次期末考试，又在班里名列前茅。打工的社会实践，丰富了她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她抓紧业余时间，还搞文学写作，目前已写了几篇散文，其中两篇已在报上发表。

“麦当劳”的工作节奏相当快，要求员工上班以后手脚不停。小王在服务区站柜台，平均两分钟要端一份快餐，每小时来回走动的距离有10公里，对她的体能和意志确实是一种考验。

跟她一起应聘到“麦当劳”打工的某大学女生小杜，就是因为适应不了这种紧张的工作节奏，加上身体状况不佳，打了退堂鼓。

小刘是某一理工大学外语专业二年级的学生。他笑着说：“我出来打工就是要体验一下国外大学生打工的滋味的。”

他哥哥在美国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工资也高，但是活儿非常苦。去年，他哥哥回北京治病，跟他介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打工的情况，有很多人都累出了病。他自己也是因为活太累，把身体搞垮了。

小刘本来想毕业后也去美国留学，他哥哥已经帮他联系好学校和经济担保。但是他听了哥哥介绍的情况，毅然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他觉得在国内打工已经体验到这是什么滋味，何必再出国？

在“麦当劳”，小刘干得很出色，已经升为“训练员”（即领班）。现在他每周有三个半天到“麦当劳”打工，紧张的工作节奏，使他觉得自己比过去充实多了。

他对笔者说：“培养生活上的独立性，打工挣钱，是大学生的一种荣光。”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大学生认为，与其花几万元换取一个自费出国的机会，不如在国内甩开



膀子干,当前改革开放的大潮,为他们前途的选择,创造了一种机遇。他们清醒地看到,国内有许多领域,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可以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 心跟着希望在动

按国家教委的有关规定,大学生在校期间是不许从事各种获取收入的经营活动的。虽然没有明确不许外出打工,但按“获取收入”的概念,自然包括打工挣钱。所以许多大学生课余时间外出打工,是不愿声张的。教师对此所持的态度亦很暧昧,既不愿看到学生违反某些规定,又不愿意违背学生的意志,所以有些教师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有两所大学的学生会就大学生打工问题搞过调查,90%的大学生有这种愿望,并希望有关部门能开禁。劳动部门对聘用在校大学生的问题也有明文禁止的规定。但有些部门对此亦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从用工的利弊考虑,大学生打工无疑是层次较高、充满活力、价格低廉的劳动力。

家在外地的大学生没有卷入打工潮,别有苦衷。某重点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郭晓景对笔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今年三月,他与两个同班同学

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餐厅打工,端着盘子上桌时,正好顾客是他所在县的副县长老杜。郭晓景能考上北京的名牌大学,曾使这位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大为风光。因为那一年,该省考入北京重点大学的只有5位,其他4位都是省城的。郭晓景如同中了状元,进京上学时,由村至乡,由乡至县,一路上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县长亲自把大红花戴在他的胸前,并派专车送到火车站。他不但是家庭的光荣,也是全县的骄傲,县长在临别时,握着他的手说:“你要努力学习,争取更大成绩,全县人民期待你早日学成返回故里报效家乡老乡亲。”

此时此地,当这位副县长看到郭晓景穿着工作服,满头大汗地当“跑堂的”,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问他何以沦落到这种地步,是不是家里不给他寄钱,使他寄人篱下挣钱糊口而荒疏学业。郭晓景告诉他打工的目的并不只为挣钱。老杜哪里肯信,当场掏出500块钱,让他不要再外出打工,全身心投入学习,为乡亲们挣脸。事后,老杜回到县里对郭晓景的父母问寒问暖,并答应由县里出资,每月给郭晓景寄200元,弥补生活不足,坚决不要再外出打工。

看来,大学生打工的思想阻力并不完全来自家庭和学校。

大学生打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引起教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关注。教育界的一些人士认为,前几年曾一度出现的校园经商热,经过这几年的治理整顿,已有所收敛。现在鼓励大学生打工,无疑会使这股经商热死灰复燃,干扰学校正常的学习秩序,影响学生安心学习。学生的第一要职是学习,第二天职也是学习,而打工则属于走入社会以后的事。因此现在的打工潮弊大于利。

社会学家则提出相反的论点,认为大学生不能脱离火热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当前的改革开放大潮,现在有许多教科书观点陈旧,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学生不能死啃书本,应该广泛地接触社会,而打工是最好的社会实践,是走入社会生活的第一步,是书本知识的补充,社会应为大学生打工开放绿灯,少设禁区,多提供打工的机会。学校方面也应有组织地让学生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搞“集体打工”。

不管怎么说,当前大学生打工方兴未艾,当代的大学生受改革开放洪流的感召,心跟着希望在动,敢于弄潮,敢于实践,他们渴望社会能对他们多一分理解,帮助他们在走入社会之前,读懂生活这部大书。

(责任编辑:小芸)





# 巴玉藻



## 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

● 王忠瑜 王钟灵

1919年8月,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终于在马尾诞生了。

飞机设计者是一位蒙族青年,他叫巴玉藻,时年27岁。

这是一架命名为“甲型一号”的双桴双翼水上初级教练机。操纵灵活,飞行稳定,可以承受比实际重量大八倍的压力。配备的发动机为100马力,最大时速为120公里,其飞行效能不亚于欧美生产的飞机。

这年冬天,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侍从武官、航空局局长杨仙逸到马尾亲自试飞了这架飞机。这

天,马尾万人空巷,男女老幼都围聚在江边,一睹“飞船”腾空的奇观。消息传至北平,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特颁发命令:给予巴玉藻晋升官阶和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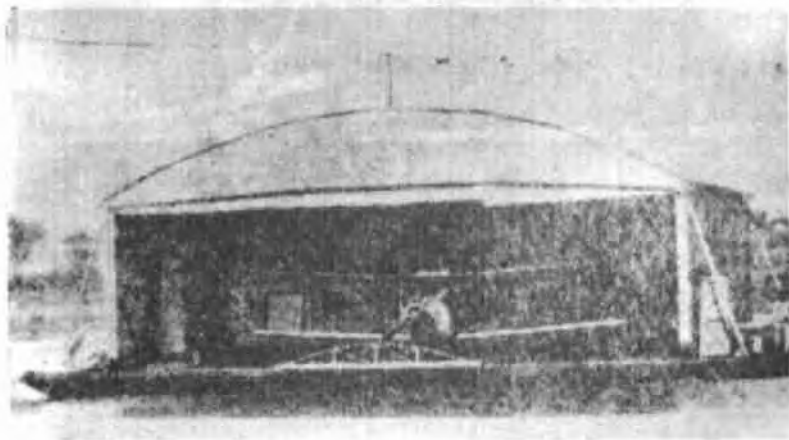
巴玉藻先后设计制造了甲、乙、丙、丁、戊、己等六种型号的水上飞机,一次比一次先进。最后制成的飞机,其发动机已达到350马力,飞机最大时速达到180公里,机上设有炸弹舱,可作长途轰炸用。平时,可改为宽敞的四座客机使用。尽管巴玉藻表现出色的设计制造飞机与组织才能,但终因军阀争权夺利,互相攻战,使偌大的中国四分五裂,国库没有财力来发展国防工业,因此,巴玉藻宏图难展。

1922年春,海军当局为了调用巴玉藻他们制造的水上飞机去江西湖口进行训练,事先要在湖口建筑供水上飞机使用的机棚和滑水道。这项工程不仅耗资巨大,而且需要时间。海军当局便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巴玉藻。

巴玉藻找到了他的好友王助,两个人共同研究、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供水上飞机使用的水上浮站(又名浮坞)。这座浮坞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于同年8月10日,由上海江南造船厂造成。高8.1米,长21.6米,宽10.8米,吃水0.9米,这座浮站,在江河中不论何时都可以保证飞机避免风雨的袭击,而且可使飞机不受潮水的影响,自由地升降。在当时,是世界上的首创。

他不仅在飞机制造上做出卓越的贡献,他还在培养我国第一批航空工程专业人才上尽了力量。他从1918年4月便兼任了福州海军飞潜学校甲班(飞机制造班)教官,亲自编写教材,教授数理和飞机专业各科,如:特别动力学、飞机制造学、飞机工程学、飞机实地图标、飞机稳度算法……等,1923年该班毕业学员17人,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飞机制造的专业人员,均为海军飞

▽世界上第一个水上机库



机工程处所聘用。

1927年5月1日,巴玉藻与他的好友沈来秋、何居超等经过奋斗,组建了海军中唯一的学术团体——海军制造研究社。

他们创办了中国机械制造方面的学术杂志《制造》。

1926年,北洋军阀周荫人战败,他的部下要强渡黑龙江占马尾。马尾守军司令部把巴玉藻等人邀请去商议退敌之计。巴玉藻和王助研究用玻璃瓶子上装上化学药品做成土炸弹,从飞机上投下,像燃烧弹一样爆炸后烧着了一些房屋,竟把败兵吓退了,没敢进入马尾。也保住了飞机制造厂。

1923年他去上海接家属时,友人特地要他见孙中山。中山先生热诚地邀请他去广州创办飞机制造厂,还特意送给他一座住房。可是因为马尾还在制造飞机,他一时丢不开,巴玉藻只好婉言谢绝了。这使他一直感到很遗憾。

1928年10月,巴玉藻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德国的柏林,他是来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第三届国际航空展览会的。世界各国都纷纷派了阵容庞大的代表团,而中国代表团却只有巴玉藻一个人,这还是经过他一番努力争取,才被政府当局批准的。一个人的代表团,人单力薄,受到列强的讥笑,但巴玉藻并不气馁,他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事了。展览会上各种新型飞机,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详细地绘图,还考察了各国海军的情况,又选购了急需的机器设备。他白天参观、考察,晚上整理记录和报告,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短短期间,他整理了厚厚的两大本资料。展览会闭幕后,他还抓住机会到英、法、比、瑞等国去考察了航空设备和飞机制造等。直到第二年3月8日才在马赛港登轮回国。

一到轮船上,他便天天留意收听无线中的新闻广播,了解国内形势。

“啊,中国人,有什么好消息吗?”

一个身着短衣长裤,头缠包头绸巾、满身珠光宝气的阿拉伯式的贵妇人走了过来。

巴玉藻回头看了她一眼,他发现这是个故意打扮成东方人的欧洲少妇。巴玉藻很有礼貌地回答道:“啊,好消息很多,夫人指的是哪方面的?”

“哦,我说的是中国,堂堂的东方大国……”贵妇人无不奉承地说。

他们便这样地攀谈起来。

十几天的旅途中,巴玉藻几乎无处不碰见这个贵妇人。她总是十分殷勤地走过来攀谈,有时还邀请巴玉藻一起喝点什么。他们还一起参加过轮船上举行的化妆舞会,两个人都以各自的东方妆束获了奖。

巴玉藻满以为中国的局势比较安定,计划着一回祖国就把他在考察中所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设计,尽快地制造出更新型的飞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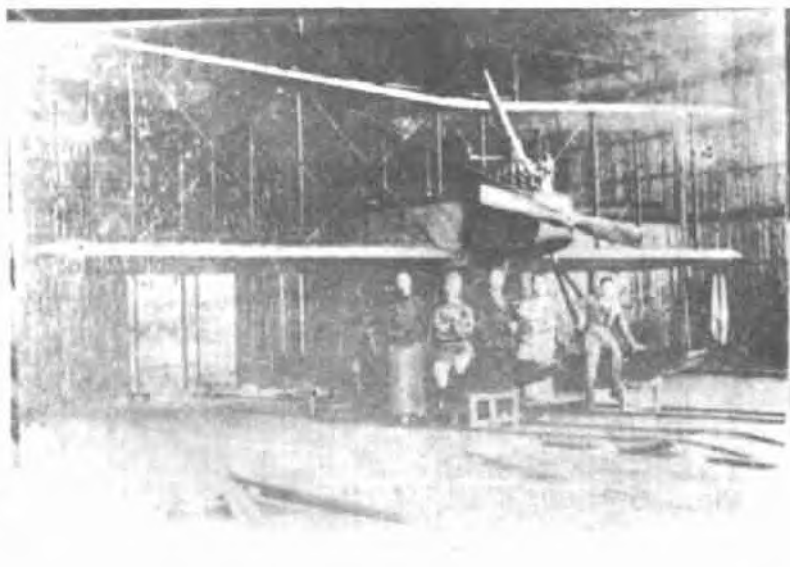
不料轮船刚到香港,看到了中国报纸,巴玉藻才知道他在国外的大半年时间里,国内仍然是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他的心像掉进冰窟窿,一下降到冰点。他眺望迷蒙海

▽甲型一号飞机在库中,中间一人为巴玉藻

空,顿感前途茫茫。他预感到自己千辛万苦所得的一切航空设备、飞机制造的资料都将成为泡影。

1929年4月12日,巴玉藻回到了上海。不想一上岸就感到头晕眼花,口吐白沫,面部也浮肿。他以为是远涉重洋劳累所致,没有放在心上。他立即赶去见海军部的一位负责人,向他汇报了这次考察的结果。这位负责人听了以后,向他转达了海军部为了勉励他这次远涉重洋进行考察的功绩,特地要为他增加薪俸。巴玉藻婉言谢绝了,说:“制造飞机,非玉藻一人功劳,玉藻薪俸已足够赡养全家,焉敢再受国家增薪之恩?我倒觉得应该给全厂的工人和职员们加薪一级以资勉励,使他们免遭生活贫困之苦,更能竭尽全力,制造出更多更好的飞机来……”

海军当局听了巴玉藻这段无私的陈词,采纳他的建议,给飞机制造工厂的全体工人、职员们增加一级工薪。巴玉藻对此非常感动,接着便呈上自己考察以来经过日夜设计的飞机图样,请求当局批准他按照新设计的图纸再制造两架飞机。因为造飞机需要大笔款项,海军部当局





△甲图一号飞机在水上

十分犹豫，经过巴玉藻不遗余力的争取，当局被他的至诚感动了，批准了他的添制两架飞机的计划。巴玉藻高兴极了。

回到马尾后，他立即着手飞机的设计工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6月9日这天，他忽然感到浑身酸痛，发起高烧来，体温高达华氏103度。

21日立即请来马尾、福州的名医——美籍名医方济霖和日本博爱医院院长小林进行诊治。美医认为是小肠炎，而日医则疑为肾病，但经过化验，两医又无法确诊，便又赶忙请来著名中医王子俊。这时巴玉藻已出现头疼、迷糊的症状，说明病毒已侵入脑部，王子俊也束手无策。立即又派军舰以重金从上海请来法国名医谢壁，谢壁赶到马尾，在经过检

查以后，又了解了巴的全部活动过程，十分郑重地说：“这是中毒症状，现在毒素已侵入脑部，已经无法挽救！”

“请问先生，中的是什么毒？毒从何处而来？”大家急着问。

谢壁摇摇头，欲言又止，最后摆摆手说“这个，我也无法断定……”

巴玉藻这时已经料定自己的生命为时不多了。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为祖国兴办飞机制造的事业未能实现，最后连试制的两架飞机的计划也未能实行。

这时，从他的口中，吐出两个形似口香糖又似树叶的绿色东西，巴玉藻自知是中毒所致。可是这毒从何而来呢？

他回想在国外和归途中所经历的一切。他想到那个在轮船上偶然

认识的贵夫人。这时他才感到这个女人经常借故接近他，而且常请他喝咖啡、喝酒，十分蹊跷，这毒是不是她在他不注意时，悄悄放在饮食中的呢？他把自己的怀疑向他的夫人白绍宽说了。

夫人说：“我看事情是明显的，你要兴办中国飞机制造业，那些帝国主义强国能让你成功吗？你在柏林的演讲中，又刺痛了他们，他们看你是个祸害，就买通了这个女人下了毒手……”

巴玉藻点点头，同意夫人的看法。那时中国已经成为列强口中的一块肥肉，他们怎能允许你自己制造飞机，振兴国家？怎能允许我们拥有卓越的科学家？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弱国，又怎能保护住自己的优秀科技人材？又有谁来关心爱护国家的优秀人材？

1929年6月30日下午，巴玉藻终于因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了，年仅37岁。

为中国制造第一架飞机的卓越的青年科学家巴玉藻先生，在他英才刚展的时候，怀着有志未酬的遗恨，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责任编辑：仲文)



# 骆明先生的眼光

● 黄浪花



1989年冬天，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先生专程送稿来京，并与我们中国华侨出版社签订了编辑出版大型丛书《新加坡华文文学大系》的协议。这套《新加坡华文文学大系》大型丛书，分小说卷、散文卷和诗歌卷，共计一百余万字，是活跃在当今新加坡文坛上的二百多名华文作家代表的选集。从协议签订之日起，骆明先生与文艺协会的同行人就马不停蹄地工作，向报界发布征稿启事，征集作品、作家小传与照片，精选精编，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把稿子交到了我们出版社。这速度在中国大陆是很难想象的。我捧着交来的这一摞沉甸甸的书稿，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这是中新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一页新篇章！

我们用了半年时间，抢出了这四大本精美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大系》。1991年10月，我与孙勇民先生带着这套凝聚着中新两国人民心血的图书，应邀飞往新加坡举行首发式。

我们是深夜一点多钟到达新加坡的，骆明先生把我们送到YMCA饭店安顿后已是三点钟了。早餐后，骆明

先生就驾小军送我们去拜访新加坡的三大报纸——《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这三家华文报纸对我们与新加坡文艺协会协作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大加赞赏，发表多篇文章评介。《新明日报》更以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该报记者对我与孙勇民先生的采访记，扩大了这套丛书在新加坡的影响。中午，骆明先生又带我们直奔新加坡国立大学，并安排我们与中文系的教授们座谈，共同探讨了华侨华人史的研究与出版问题。

接连几天我们就同新加坡文艺协会的理事们、新加坡作家协会的领导，一起座谈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现状与前景；同新加坡新亚出版社、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商议联合出版与发行事宜，还拜会了尤今、孙爱玲、怀鹰、杜诚、李龙、寒川、流军、王润华、田流等新加坡知名的华文作家。不仅如此，骆明先生还从吉隆坡邀请马来西亚文艺协会的同行人来新与我们会面。因此，我们有幸会见了马来西亚著名的华文作家孟沙、甄供和彼岸，并与他们商谈了共同编辑出版《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大系》大型丛书的事宜。在骆明先生的引荐下，我们还会见了在新加坡访问的印尼知名华文作家罗密欧·郑，了解了印尼华文文学的处境。骆明先生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他把我们带到哪里，哪里的友谊就升腾起炽热的火焰。

首发式在新加坡著名的饭店——半岛大酒家举行。来宾中，除了新加坡华文作家外，还有马来西亚、印尼的华文作家。新加坡三家华文报社以及英文版《海峡时报》、新加坡广播电台也派来了记者。非常荣幸，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高级次长何家良先生，也光临了大会。据说，这么多华文作家济济一堂，在新加坡文艺活动史上还不多见。要不是骆明先生登高一呼，焉能如此。

何家良先生在致词中说：“这是一部有分量的文艺书籍，在一片走向世界的呼声中，希望在未来能看到更多的三地作家的作品，能在中国和其他有华人的地方发表或出版。华文文学要走向世界，这是三千万华侨、华人的共同心声！”何先生的一席话，使我一下子触摸到了骆明先生那颗拳拳的赤子之心！

骆明先生说得好：如果把新加坡华文文学比作涓涓细流，那么，包括拥有十一亿人口的中国在内的世界华文文学就是一个汪洋大海。涓涓细流只有汇入汪洋大海中，才能掀起排山倒海的巨浪。正是为了这个“汇入”，骆明先生在新加坡华文文坛上默默地耕耘了大半生。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先后就主办过《南洋教育》、《新加坡青年》、《新加坡文艺》等刊物，大力扶植新加坡华文文学。因此，曾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的投稿。骆明先生当时还主编了一套“中教文艺小丛书”，均为袖珍本，作为中学中文教育的辅助读物，很受青年学生的喜爱。

1988年，在骆明先生倡议下，新加坡文艺协会在新

文艺协会理事们开座谈会。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新加坡



加坡主办了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五国华文作家参加的国际性华文文学研讨会——第一届亚细亚华文文艺营。东盟五国的华文作家的代表，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华文文学的前途命运大事，这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骆明先生为华文文学走向世界，首立大功！

1990年，骆明先生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了编纂《新华作家研究丛书》的设想，为什么要编这套丛书？骆明先生说：“我们了解作家的生平生活、文学主张、从事文学的经历，不仅对阅读作品有帮助，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以及写作能力。同时对巩固提高国家意识、爱国观念是重要的。”多么深谋远虑阿！现在，由林锦先生主编的第一部研究丛书——《苗秀研究专集》已经出版。这是一部研究活跃于1932—1988年间，新加坡华文学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苗秀先生的研究论文集，它是研究新加坡华文学史的一种重要的文献资料。

1991年，骆明先生与新加坡文艺协会更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宏大的气魄，在新加坡华文文坛上设了一个国家级的文学大奖——新华文艺奖。大奖聘请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国家与地区的专家担任评委，有相当的权威性。活跃在新加坡华文文坛上的作家有好几百，但是，这文艺大奖只评出金奖一人，推荐奖两人。金奖的得主就是尤今。这位多产的女作家，至今已出版了近三十部著作，她的名字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并不陌生。推荐奖的得主，一位是著作等身，小说、话剧、相声、评论等十八般武艺皆精的老作家田流；一位是自学成材、有十多部诗集问世的中年作家怀鹰。他们堪为新加坡华文文坛中的精英！

骆明先生像一块大磁石，把许许多多的作家吸引在自己身旁，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一道披荆斩棘，一道耕耘收获。

(责任编辑：仲文)



△作者与新加坡作家李龙  
▽骆明先生在做报告。



△作者与女作家尤今

# 共患难的

## 二 YU

### 夫妇

——记著名外科专家虞颂庭  
和妇产科专家俞霭峰夫妇

● 罗网



△男 YU 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一位从鬼门关逃回的患者托我著文宣扬虞颂庭和俞霭峰夫妇。说他们不只是救活了他，还救活了许多许多人，还培养了许多许多好学生，还写了许多许多好书。那许许多多好学生和那许许多多好书，又救活了许多的危重病人和培养了许多的学生……我经不住他那“许许多多”，只得答应。可是，开头就碰到难题：他俩在一起行医和执教了半个多世纪，都是天津医学院的 YU 教授，是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的 YU 大夫 YU 主任。如何把他们分辨？直到听说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们称为

男 YU 女 YU，我才学到了最简便的区分法。

男 YU 于 1911 年 5 月出生于浙江慈溪，家道清贫。为日后生计，他中学毕业时忍痛抛开了对历史、农学、天文学的浓厚兴趣，立志学医。

女 YU 于 1910 年 8 月出生于浙江宁波。幼年丧父，少年丧母。16 岁就只身奔走异乡谋生求学。一个弱女子，别说找工作难，即便找到工作挣钱也有限。常常拼命工作一年也拿不够下一年的学费——何年才

读书，一块研讨，一块实习。相识，相助，相知，相爱。

女 YU 喜欢男 YU 英俊伟岸潇洒阔达，敬重他敦厚诚实，爱慕他才华横溢。他学习成绩多好！经常考第一，同学艳慕，导师称赞。与这样的男子在一起前程必然光辉灿烂！

男 YU 爱慕女 YU 俏丽秀秀，倾倒她的聪明心智和热烈神情，折服她的过人精力和果敢作风。和她在一起，觉得总有进取的力量而永不疲倦。

他俩就在这动人的和弦中起步，冲刺……

1939 年夏天，他们毕业了，并同时获得了博士学位。因为成绩格外优异，双双被留在协和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我们分手吧。”女 YU 突然对男 YU 说。

“为什么？”男 YU 惊愕地问。

“协和有规定，女医生结婚就要被解聘……”女 YU 痛苦地说。

“我们不分手，你也不会被解聘，我们不结婚就是啦。”男 YU 知道她对事业热爱的深度。不结婚也没有啥，我们的老师林巧稚不是没结婚么，可她生活得多么充实多么有意义啊。

“颂庭，你真好！”女 YU 动情地扑进男 YU 的怀里。

他们选定科研主攻方向，正准备精心孕育他们的医学娇儿，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一天，女 YU 正为一个病妇做着手术，日本鬼子就冲了进来并把枪口对准她的后背心。虽然，她无所畏惧地坚持做完手术救活了那个病人，但是，她无力改变协和从此成为侵略者伤兵医院的事实。

这时，男 YU 来了。他拒绝了友人要他在北平挂牌行医的劝告，决定到能为抗战效力的地方去。他来听取女 YU 的意见。

女 YU 当即决断：“去上海，我打前站。”她当天就登上了南去的列

能学成？于是只得找个学费低廉的学校——学医。

医学，使得男 YU 女 YU 在 1935 年夏天走到一起。呵呵，那天很是罗曼蒂克！他们永远忘不了协和医学院那位用英文字母排列名号座次的洋先生。洋先生给学生分班编组时发现了虞颂庭和俞霭峰的名字：“啊，好极了，男的 YU 女的 YU！”他手里铅笔一动，两个名字便亲密地连到一块。瞧那笔下的弧线多么有情多么美！弯弯的，活像月老的红绳儿。

从此，两人便在一块听课，一块

车。

不几天，男YU也到了上海。可是，这偌大的都市却没有这对诚实青年献身医学事业的立脚之地。

走！二YU抱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宗旨，继续着更为艰辛的历程。

杭州、金华、鹰潭、衡阳……路，这段通了，那段又断了，走走停停，火车马车牛车来回换，有时连毛驴车都找不到，一路上除车马劳顿徒步艰辛之外，空中有侵略者的飞机狂妄滥炸，地上有法西斯军队烧杀掠抢……常常险象环生，几遭危难。不过年余，他们的体格就由健壮变得羸弱。就这样，他们也没忘记自己是服务于劳苦大众的医生。车厢里，站台上，土路旁……曾为多少同胞解除了疾病痛苦。好不容易到了桂林。可桂林也没有适合他们工作的医院。

“不适合你也得留下，不然你会累垮。”男YU对女YU说，“这回我打前站，找地方再来接你。”

南宁、昆明、贵州……男YU周游列“省”，又是历时年余，沮丧而归。腐败的政治和野蛮的日寇一样，都不允许医学博士继续他们的事业。

“我们结婚吧，成家后流浪起来住宿或许方便些。”

成家！家成在哪儿！二YU苦笑着把目光移向城外。这里开门见山，山山有洞。家就安在山洞里好了，洞房洞房，以山洞作新房不是挺有诗情画意的么——黑色幽默！

蜜月，在为孕妇接生中欢度。第一个到来的孕妇是为了躲避空袭。因为受了惊吓和颠簸，敌机正在投弹，孕妇便临产了。于是，他们的洞房成了产房。母子平安，消息也在桂林市里传开，临产的孕妇都赶来了，忙得女YU不可开交。

母亲的欢笑声，婴儿的啼叫，使得“洞房”平添了许多情趣！

三年流离颠沛给二YU留下终

生难忘的痛苦记忆。可是丝毫没有磨损他们的进取意志。1946年，他们毅然双双辞掉了一家大医院主治医师的职务，奔赴美国深造。

男YU在芝加哥医学院担任泌尿外科名誉助教，一边教学一边师从著名外科专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赫金斯攻读泌尿外科专业。

女YU在费城一家妇产科医院工作半年多，积攒了一些生活费后立即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师从著名妇科专家戴维斯攻读妇科内分专业。

1948年秋，二YU以优异成绩

科主任、天津医学院教授、天医附院妇科主任。因为他们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很快得到了患者的爱戴和信任。他们的病人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农民工人。他们常常是上午在北京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诊治，下午就出现在天津医院的门诊部，出现在病房里，甚至出现在乡村农家炕头旁……不几年，他们就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男YU又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女YU荣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众多的社会职务和繁忙的政务活动并没有滞碍他们的科研步伐，



△二YU夫妇青年时代

提前完成了学业。美国医务界的朋友都劝他们留下，说，凭着你们是赫金斯和戴维的学生这两块金牌子，加上你们的渊博学识和高超医术，你们很快就会有大的建树，名利双收。

二YU不加思索地对他们说：“我们是属于中国的，中国更需要医学家。”他们踏上了归途，到天津定居。

新中国成立后，男YU先后担任天津总医院外科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助教、天津医学院教授、医疗系主任、天医附院外科主任、副院长。女YU先后担任天津总医院妇

科主任、天津医学院教授、天医附院妇科主任。这些成就簇拥着他们双双跻身于名人行列，使得男YU与吴阶平、熊汝成齐名，成为中国三位最有名望的泌尿外科专家之一；女YU与林巧稚、王素贞齐名，成为中国三位最有名望的妇科专家之一。

他们的著作等身。

他们的桃李遍天下。

他们的……

哦，他们的事迹成就不是几千字就能表述，正如那些要我写文章的患者所说，许许多多……

(责任编辑：仲文)

# 侯宝林

## 最后的一幕



△侯宝林在人大会上(1991年)

▽侯宝林病危还在玩扑克

相声大师侯宝林走过了苦乐交融的75年人生路,度过了呕心沥血的65个艺术春秋,在他的生命临近终点时,还孜孜不倦地研究相声艺术。

他患的是胃癌,做了胃全切,术后病复发,进食困难,整整五个月全靠静脉输液来维持生命。

在病床上,侯宝林完成了《毛主席听我说过的相声》的编纂工作;为中国名人丛书撰写了6000余字的《我的少儿时代》;和亲朋好友讨论了有关相声的几篇论文、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以及“笑话集”的出版事宜;每天都要与前来探视的亲人谈相声的历史、发展和表演技巧等问题;还让女儿侯珍为他借一本《古优解》,买一本《梁实秋·林语堂妙语





录》，临终前几天，他还认真看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班禅》、《伦敦在行动》等几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美国电影……

1月13日下午，侯宝林对前来探望他的吴晓铃教授说：“吴先生，请教您一个问题，十二月为什么叫‘腊月’？是什么出处？”还提到京剧《贩蜡庙》，问“‘贩蜡’究竟为何物”？吴教授回去就查阅了《礼记》，将有关词条抄录下来，寄给侯珍，嘱咐她收到后立即送到医院念给父亲听。

1月20日，侯宝林从昏睡中醒来，突然见到从外地匆匆赶回来的弟子马季，竟高兴地和他谈起相声艺术，认为最具有生命力，也是最难把握的至高境界，就是临场发挥（行话叫“现挂”），并列举了在他一生中最为满意的三次表演。他说：“只有那三十分钟（指在舞台上表演）我才最幸福。”

元旦前夕，侯宝林听说医院要开联欢会，他给护士口述了一小段相声，让他们在联欢会上表演。

为了使他进食，大夫在他的食管里放置一根金属管。手术后，他醒来却说：“以后我是不能坐飞机了，身体里放条金属管子，海关就通不过。”

他体重不到80斤，阴囊水肿得像皮球，在痛苦中笑话仍不离口：“我瘦了，它倒胖了，它胖了有什么用啊！”

临终前两天，侯宝林腹水增多，又发高烧，大脑严重缺氧，他还与亲朋玩扑克牌，大夫问他：“您怎么这么喜欢玩牌呢？”侯宝林以笑话作答：“脑子这东西，只开发了百分之十几，上帝赐给我，不经常用就糟贱了。”

侯宝林在垂危时仍然以他敏锐的思维和绝妙的语言，“抖”出了一连串的“包袱”。

著名漫画家方成来病房探望，侯宝林看到方成的牙不好，便对身旁的大夫说：“你给他看看吧，镶好



△侯宝林说笑话(1991年)

一点儿。这么大的名人，不能让他当‘无齿(耻)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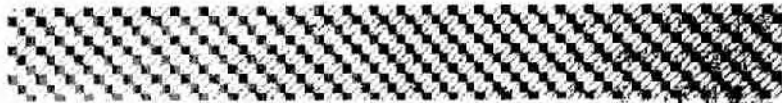
临终前两天，侯宝林看过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他神志已不清了，相声的基因又使他“抖”出最后一个“包袱”：“许仙的故事，是爱情故事，也是社会故事。你看见那个老道没有？太坏了……”旁边一位

大夫问他：“您看那个老道叫什么来着？”侯宝林一转脸，一眨眼，就像在舞台上说相声那副神气：“叫王八蛋！”

2月4日(是日立春)14时42分，这位相声艺术大师告别了人世。

他去了，留下永恒的畅笑。

(责任编辑：刘家驹)



# 用了“海豚”药 降压有奇效



## ——各地用户盛赞资寿尼群地平片

### 降压药中的佼佼者

资寿尼群地平片

●河北省医学院副研究员 袁湘生

我长期患高血压,并从事高血压病防治多年。不少新药如双氢克尿塞、胍酞嗪、可乐宁、胍乙啶、心得安、卡托普利等问世,我沾近水楼台先得“药”之光——有幸尝试,不仅自己吃,也开方给别人吃。多年来体会,只有资寿尼群地平片才算得真正佼佼者。原先我的血压总在 190/110mmHg 上下,有时还高。几年来服用此药后才获得稳定效果,保持在 140/85mmHg,症状消失,也无不适,自我感觉良好,且用其他药不是无效,就是副作用太大,还不如不吃,故深感有病还需良药治。我们曾对 309 例不同程度的高血压患者用资寿尼群地平片治疗,有效率 92%,血压愈高,疗效愈显。难怪瑞士高血压病专家 Buhler 教授预言它将会成为降压剂中的首选药。我也在拙作《高血压病的防治》一书中简单介绍。作为多年老高血压病号的我,愿与高血压病友共享此良药。

### 我妈妈的高血压有救了

●广西平果县太平乡卫生院 杨美明

我妈 50 岁后开始患高血压冠心病。我曾常规用药物利血平针、降压灵、脉通、脉舒静等进行治疗。但是去年病情再次复发、突然昏倒,还伴有恶心、呕吐、头痛、头晕、眼花、颈累、心率加快,在我万分心急的情况,《家庭医生》报刊登了石家庄市新华药厂资寿尼群地平片的消息,使我喜出望外。我立即汇款到药厂,十天后,收到了药厂邮寄来的资寿尼群地平片一瓶。按照说明开始服用。第一天服三次,每次二片。血压由上午的 198/124mmHg 降为下午的 168/110mmHg,真是药到病除!七天的疗程,我妈的血压一直稳定在 124/78mmHg。现在她感觉浑身有力,食欲良好,原来的四肢肿胀、头晕眼花已全部消失了,能做家务,能挑 80 斤左右的担子

### 试试看效果满意

●福建省福清卫校 余乃森

我患高血压已有二十多年,血压高达 180/120mmHg 以上,长期服用《复方降压片》,但副作用难忍,整天口干,多喝水,多尿,夜间多恶梦,记忆力减退。久病的人盼医心切,每天看报首先关心的是治疗高血压的广告。旁人教的一些办法,我都试验过,无满意效果。若恼之中,看到了“健康报”刊载石家庄市新华制药厂研制的高血压克星——资寿尼群地平片,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该厂邮购,收到药后,我按说明书服用,开始每天三次,每次一片,每天查二次血压,经服药四天,血压降至 140/100mmHg。从第五天起每天二次,每次一片,连服二天,血压降至 120/90mmHg。从第七天开始改为每天一次,每次一片连服三天。第十天起每二天一次,每次一片,至十四天后停药。至今两个多月,自觉症状良好,血压保持在 140/90mmHg。精力充沛,食欲正常,头昏眩晕消失,睡眠良好,无恶梦,性欲无影响,自觉身体有力轻松愉快,给我生活带来了乐趣、幸福!

海豚牌“四病克星”(指高血压克星——资寿尼群地平片;牙痛克星——寿堂牙痛安胶囊;感冒克星——寿堂效灵感冒胶囊;痛经克星——寿堂妇科万应膏)全国销售,如在当地买不到,请与石家庄市新华制药厂联系邮购,资料备索。邮政编码:050091

## 高血压患者的最佳选择

自 1990 年 2 月至 1991 年 8 月,我科采用石家庄新华制药厂生产的海豚牌“资寿尼群地平片”,治疗高血压病人 87 例,其中显效 74 例,约占 85.1%,有效 13 例,约占 14.9%,无效为零。通过 87 例临床观察,我们得出资寿尼群地平片具有以下优点:①起效迅速,效果恒定;一般服药 30 分钟左右血压开始下降,两至三小时降压效果最显著,未见明显反跳现象,且血压降至理想范围改

为小剂量后,仍持续有效。②用药方便,无明显毒副作用,经观察,患者普遍反映因用药剂量小而服用方便,未见明显不良反应,且部分伴有胸闷的患者,用药后胸闷症状明显减轻或缓解。我们由此认为:“资寿尼群”,是目前最理想的抗高血压首选药物,适用于各型高血压病人,也可用于其它降压药疗效不佳的高血压病人,因此,服用“资寿尼群”是高血压病人的最佳选择。

安徽中医学院附院内科 胡顺金 李平

泗洪水泥厂自1988年转包,先后获各种荣誉共23项

# 泗洪水泥厂

## ——苏北大地上的明星企业



厂长:卜登书

泗洪水泥厂建于1975年,1978年正式投产,10年中共产水泥10.25万吨,累计亏损173万元。企业濒临倒闭。1988年的第一轮承包中,三年生产水泥共11.27万吨,销售收入1781万元,实现利税300万元。1991年第二轮承包后,该厂进一步深化内部配套改革,以转换经营机制为核心,以增强活力提高效益为目的,在洪涝灾害造成经济损失92万元的情况下,全年仍完成水泥产量6.05万吨,实现利税152万元,先后获省市县各种奖励23项。1992年,被江苏省淮阴市授予明星企业,厂长卜登书获得市优秀企业家称号。泗洪水泥厂新产品425<sup>#</sup>、525<sup>#</sup>普通硅酸盐水泥,获市优质产品称号,在国内市场畅销不衰,供不应求。新年伊始,该厂已筹集资金2000万元,将扩建15万吨的生产线。

厂址:江苏泗洪县双沟镇 电话:(05274)20411 电挂3136 邮编:211011

统一刊号:CN11-2817 定价2.98元